

目 录

前 言.....	1
迷 恋.....	1
疑 虑.....	66
失 望.....	98
大概,我是最后一次谈斯大林	151
作者小传	173
译后记	175

迷 恋

(一)

英国的军事使团是来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第一个外国使团，它是1943年5月着陆的。苏联的军事使团是1944年2月，即九个月以后才来到这里的。

苏联军事使团来后不久，我们决定派一个南斯拉夫军事使团到莫斯科去，特别是因为我们已派去一个军事使团到英国同级的司令部。最高司令部，更确切些说，在司令部工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很想派使团到莫斯科去。我想，铁托把这件事告诉了苏联使团的考尔涅也夫团长，但毫无疑问，这件事最后是由苏联政府拍来的电报才决定下来了。

对于南斯拉夫人来说，派使团到莫斯科是具有多方面的意义的，和派使团到英国司令部相比，这件事情的性质和任务是大不相同的。

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反对占领军及其当地帮凶的游击队和起义运动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南共在残酷的武装斗争中解决自己民族问题的同时，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之一，和“社会主义祖国”苏联是不可分离的。

在整个战争期间，党的直接领导者政治局一直同莫斯科保持无线电联系。形式上这是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实质上是同苏联政府的联系。

革命运动的斗争和生存的特殊条件已不止一次引起我们同莫斯科之间的误会。

在这里我只谈几件最重要的事情。

莫斯科直到最后,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够懂得南斯拉夫革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南斯拉夫在反对占领军斗争的同时,国内的革命也在进行着。他们之所以不愿理解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政府担心西方盟国,首先是英国,会对苏联表示不满,说他通过自己的共产党伙伴利用被占领国家的战争灾难之机扩大革命范围和自己的影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斗争正如通常的其它新事物那样,冲破了陈旧的观念和苏联政府及国家的不容商榷的利益的范围。

莫斯科也并不了解南斯拉夫斗争的特殊性。南斯拉夫的斗争,虽然不仅鼓舞了为保卫俄罗斯民族传统不受纳粹德国的侵犯的士兵,而且也鼓舞了苏联的官方人士,但由于苏联总是和自己的游击运动及其斗争方法相比较,因此对南斯拉夫的斗争是估计不足的。对苏联来说游击队是红军的辅助的和次要的力量,始终没有成为正轨的战斗部队。苏联上层根据自己的这一经验,完全不明白,南斯拉夫游击队怎么能变成为正轨军和国家政权,并具有自己的有别于苏联的特性和利益,而这就意味着开始自己的独立的存在。

与此事有关的,发生一件对我来说具有相当大、甚至是决定性意义的事情:

在所谓的第四攻势期间(1943年3月),事态发展到最高司令部要同地方德国司令部举行谈判。谈判的导因是交换俘虏,而其实质在于德国人必须承认游击队作为交战对方的权利,谈判双方停止杀害伤员和俘虏。除此之外,最高司令部,革命军的主力 and 成千的伤员当时处在极端危险的境地,所以我们迫切

需要任何能够取得喘息的机会。关于这一切必须通知莫斯科。但是我们非常清楚：不能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莫斯科，这是因为铁托已很了解莫斯科，而我和兰科维奇^①则只是出于一种下意识。我们觉得只应该通知他们，我们正在和德国人进行关于交换俘虏的谈判。

然而，莫斯科根本没有设身处地地为我们着想，而是马上怀疑起我们，他们不顾我们已经血流成河的疲惫的处境，非常粗暴地对待我们。我记得，1943年2月在我们突破涅列特瓦河前夕，铁托在拉马河畔的磨坊里谈到此事：

“我们有责任首先照顾我们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人民。”

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第一次公开表示不同于莫斯科的意见。当时我第一次意识到——虽然不是直接受铁托话的影响，但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如果我们想在两个敌对世界的殊死斗争中能够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同莫斯科的完全一致是谈不上的。有关这件事我们再也没有通知莫斯科，而我化名和其它两个同志一起去德国司令部举行谈判。

1943年11月29日，在亚依茨召开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实际从法律上确认了南斯拉夫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秩序。与此同时，我们成立了民族委员会作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在这些决议起草过程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决定，在这些事情办成功之前，不要任何事都通知莫斯科。从我们前一时期同莫斯科打交道的

^① 亚力山大——马尔科·兰科维奇(1909—)。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7年参加党的塞尔维亚青年组织。地下工作时期坐过五年多的监狱，狱中结识了铁托和皮雅杰。1937年，南共进行整顿之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人之一，曾任内务部长，负责保卫工作。1966年7月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盟。——译者

经验中和从他们的宣传精神方面，我们得知，莫斯科是无法理解我们的做法的。果然，莫斯科对亚依茨决议的反映表现出如此否定的程度，以至于在苏联的专门为南斯拉夫起义运动而设立的“自由南斯拉夫广播电台”只播送了这次会议的一部分决议。可见，苏联政府连南斯拉夫革命最重要的步骤都不理解，而这一步骤能够将革命发展到建立起新的制度，从而进入国际舞台。可是直到已经清楚地看到，西方对亚依茨决议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莫斯科才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承认了既成事实。

尽管我们已得到如此使人痛心的经验，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直至1948年同莫斯科决裂后才完全明白了其中的深刻含义。尽管我们实践的方式如此不同，但我们当时认为，我们不仅在思想上同莫斯科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是莫斯科的最忠实的追随者。尽管革命和其它的实际情况越来越彻底地和不可调和地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莫斯科分开了，但是他们还是把自己的革命成果和莫斯科连在一起，归功于莫斯科所规定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对南斯拉夫人来说，莫斯科不仅是政治和精神的中心，而且是实现真正抽象的理想——“无阶级社会”的希望。这一理想不仅使他们的牺牲和灾难较容易地得以解释，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存在也变得更有意义了。

这个党正如苏联党一样是思想上一致的党，它把对苏联领导的忠诚看成是它的建设和发展的因素。斯大林不仅是不可争辩的和天才的领袖，而且是对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把斯大林个人神化和无条件地接受在苏联发生的一切事情已达到非常不合理的形式和规模。苏联政府的任何行动，如进攻芬兰，和苏联的一切消极方面，如镇压和清洗，都去进行解释，而更奇怪的是，共产党人还想办法说服自己，这一切措施是合理的、公正的，或者更简单地，把这一切不愉快的事实从自己

的记忆中排挤出去。

在我们共产党人中间有审美力和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也有文学和哲学知识很渊博的人，但尽管如此，我们所有的人被斯大林的观点及其阐明的“完美性”所陶醉。我本人在争论中曾经常常指出过斯大林文笔的简洁洗练，他的逻辑的不可摧毁性和他的思想的一贯性，把这些作为他崇高智慧的表现。然而，就在当时如果同样的东西出自另一些作者之笔的话，我会轻而易举地判断，这一切东西实际上是毫无特色和目光短浅，只是庸俗的新闻体裁和圣经式的杂乱无章的混合体。有时我们的迷信达到可笑的地步，如我们确实认为，战争会在1942年结束，因为斯大林是这样说的。当这话没有兑现时，这一预见也被遗忘了，而预见者本人的超人威力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身上所发生的上述情况在整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在其它人们的身上，他们都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命运服从于某个唯一的思想。他们不自觉地吧苏联和斯大林的形象描绘成为他们的斗争所需要和用以说明他们的行动的那个样子。

综上所述，南斯拉夫军事使团一方面是带着对苏维埃政权的理想化的看法，另一方面带着自己急待解决的问题的心情去莫斯科的。从表面上看，这个代表团同去英国的使团没有什么不同，但按它的组成和观点，它同时又代表着持相同政见的政治领导的非官方关系。简单说来，使团既应具有军事性质，又应具有党的性质。

(二)

因此，铁托把我作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同维利米尔·特尔

基奇将军一起列入使团的名单内,决不是偶然的,已有好几年,我一直参加党的最高领导班子。使团的其它成员也是按同样原则挑选的,都是党的或军事的领导干部,其中有一位是财政方面的专家。原子物理学家帕甫烈·萨维奇^①也参加了使团,实际上是为了在莫斯科继续进行他的科研工作。当然,我们都穿上了军装,我的军衔是将军。我想,选择我去莫斯科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俄文很好,我是在监狱学会俄文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苏联,因此我既没有参加过任何宗派的包袱,也没有什么倾向性的历史。使团的其他成员也都从来没有去过苏联,但他们当中也没有人会说俄语。

这正是1944年3月初的时候。

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集合使团成员和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我们原来穿的军服样式既旧又不统一,由于缺少合适的料子,我们穿上了从缴获的意大利军装改缝制过的新军装。还需要办好通过英国和美国占领区的护照手续。这些护照匆匆忙忙地被赶印出来,这是带着铁托亲笔签字的新的南斯拉夫国家的第一批护照。

几乎完全自发地产生了给斯大林送礼物的建议。送什么?从何处去弄?当时最高司令部所在地德瓦尔周围的村庄几乎全被焚毁或被抢劫一空,小城镇也被抢光。最后我们终于找到解决的办法:把一支1941年在乌日茨游击队工厂里制造的枪送给斯大林,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这一支枪。周围村庄也开始送来礼物:荷包、麻布巾、民族服装和鞋子。我们选了其中最好的礼物——一双用生皮做的便鞋,其它的东西都十分简

^① 帕甫烈·萨维奇(1909—)留学法国的南斯拉夫核物理学家,1939年入党。参加过解放战争,并曾被调进最高司令部工作。1949年因某一重要研究成果得奖。——译者

陋。这些东西都是人民心意的表示，所以我们决定都带去。

使团还有一项使命，就是尽一切努力取得苏联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全面援助。与此同时，铁托嘱咐我们，争取通过苏联政府或用其它什么途径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南斯拉夫解放区的援助。还要请求苏联政府给与二十万美元的贷款以补偿我们在西方国家的使团的开支费用。铁托强调并要求我们向苏联说明，这一笔贷款和用于药品和武器援助的费用，我们在解放后一定如数偿还。

使团还必须把最高司令部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和文件带过去。

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探明苏联政府承认民族委员会为临时的合法政府的可能性并通过莫斯科就此问题对西方盟国施加影响。

使团是通过驻南斯拉夫的苏联使团保持同最高司令部的联系，同时也还可以利用共产国际的旧关系。

除上述任务外，铁托在给我们送行时委托我向季米特罗夫或斯大林（如果我可能见到他）了解一下，他们是否对我们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

铁托的这一指示纯粹是从形式上强调一下，他是让我们在对与莫斯科的关系上要注意遵守纪律。当然，他自己深信，南斯拉夫共产党、而且只有这个党是单独地、出色地经受了考验。我们也谈到南斯拉夫流亡国外的政治侨民^①问题。铁托的态度是：我们彼此不要互相指责，特别是如果问题涉及苏联党的机关和苏联领导人的时候。同时铁托还强调，要提防女秘书，因为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不仅要保持已成

① 指战前流亡到苏联的南共党员。——译者

为传统的游击队的道德面貌，而且应该警惕一切可能损害南斯拉夫党和党员个人的威信和优秀传统的事情发生。

我非常激动，高兴得心都颤抖了。我期待着尽快看见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家。我的信念比岩石还要坚强，这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幻想家、战士和受苦受难的人的信念，为了这一信念我在监狱里受过折磨和拷打，为了这一信念我憎恨邪恶，我流过鲜血，甚至不惜我自己的弟兄们去流血牺牲。

然而，我也有悲伤，这是因为当我要离开同志们时，这里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战斗，我们的国土还处在你死我活的激战之中，依然是战火纷飞的战场。

我比平常更热情地和苏联军事使团告了别，觉得比平时见面时更加亲切，我拥抱了我的朋友，他们和我一样也很难过，并送我们去波桑斯基·彼得罗维茨附近的野战机场。在这里我们停留了一整天，视察了机场，同那里的已具备相当专业的专业作风和习惯的工作人员谈了话，还同当地的农民谈了话，他们已习惯于新政权，并相信这个政权必然会取得胜利。

近来，英国飞机定期夜间在这里着陆，但不经常来，最多是选择某个夜晚，飞来一、两架把伤员及个别的来客运走，飞机上带来的物品多半是药品及卫生医疗用品。最近来了一架飞机运来了一辆吉普车，这辆车是英国司令部送给铁托的礼品。一个月以前一天中午，苏联军事使团乘坐一架装着滑雪板的飞机在这里着陆。如果考虑到这地区的地形和其它条件，这次降落实在是立了一次奇功，同时这又是一次颇为特别的检阅，因为有相当多数量的英国战斗机，为这架飞机护航。

我们这一架飞机的降落和起飞也被我看成是立了一次大功，因为先要降落到狭窄而不平坦的谷地里，然后又要擦着悬

崖峭壁，飞出这块狭谷。

然而，在黑暗中消失的我的国土是多么的悲惨！披着皑皑白雪而失去了本来色彩的山峦在黑暗中只能看到断裂的岩缝，山谷在漆黑一片里消失了，一直到海边都一丝光亮都看不见。下面是残酷的战争，甚至对这一块早已习惯于进行各种行军、战役和起义的土地来说，现在进行的也是最残酷的战争。人民同侵略者进行搏斗，但是自己的弟兄之间彼此的厮杀则更为残酷。什么时候在我的土地上、城镇和村庄会重新点起灯光过上正常的生活呢？它在一切仇恨和死亡之后还能获得欢乐和安定吗？

我们首先是在意大利的巴利停留下来，那里有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相当大的基地：医院、粮库和仓库。从那里我们飞往突尼斯——由于德国在克里特岛和希腊有基地，我们绕道飞行。然后我们作为英国司令员的客人在马耳他岛稍事停留，又在多布鲁克休息了片刻，在飞机向下俯望，我们看见从赤色岩石的沙漠里冲出了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火，大火映红了整个天空，景色十分奇特。

第二天我们到了开罗。英国人把我们安排到一家饭店里并给我们提供了一辆轿车。商人和服务员看到我们的五角星帽徽，所以把我们当成俄国人。可是当我们急忙向他们解释我们是南斯拉夫人并说出铁托的名字时，他们向我们表示他们了解我们斗争的情况，我们听了非常高兴。在一个店铺里我们听到一位女售货员用南斯拉夫粗野的话和我们打招呼，她们并不知道这些是不好听的话，这些话她们是从流亡的南斯拉夫的军官那里学来的。这批军官也在那里，他们表示支持铁托，渴望参加战斗，怀念自己的多灾多难的祖国。

当我听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列曼也在开罗时，我就

请求苏联大使陪我去见见他，利用这个机会我打算向他提出我们的要求。这位美国人马上接见了我们，但是态度很冷淡，他说将在下一次总署会议上讨论我们的要求，但他表示总署在原则上只是同合法政府进行合作。

不管怎样，我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怀有原始而教条主义的看法，认为它是一切进步以及弱小和被奴役民族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我的这种看法，当我同他们的代表第一次见面时就被证实了，因为列曼先生是躺着接待我们的。他的腿部上了石膏，我把他由于伤痛和炎热而显出的烦恼看成是对我们来访的不满。加上他的那位俄文翻译，活象一个长头发的强盗，简直就是描写北美牧民的影片中的那些典型的土匪。

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理由埋怨列曼，因为我们的要求被听取了，他答应我们予以考虑。

当然，我们充分利用了在开罗的三天时间，参观了名胜古迹，访问了驻南斯拉夫的英国使团第一任团长狄金少校，他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小型的午宴。

从开罗我们飞往大马士革附近的英国基地哈巴尼亚。英国司令部的代表不愿送我们到大马士革，说那个地方不太安全。我们把这个措施看成是他们为了掩饰他们的殖民地恐怖行为，因为我们认为在那里的殖民地恐怖行动按其残忍程度并不亚于在我们国家的德国侵略者的所作所为。英国人虽然拒绝了我们大马士革之行，却请我们观看他们的士兵运动会，我们的座位在司令员旁边。我们扎紧了腰带，所有的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这样一来，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可笑，那些彬彬有礼但并不拘束的英国人看起来，大概会更觉得可笑吧。

陪同我们的是一位少校，他是一位愉快而善良的老伯伯，他总是因为他的俄文说得不好而向我们道歉。他甚至忘记他是

十月革命后参加干涉军时在阿尔罕格尔学会说俄语的。他对俄国人赞叹不已（俄国人的代表团也曾在哈巴尼亚逗留过），但他赞扬的不是他们的社会制度，而是他们的纯朴和气魄，因为他们“为斯大林和丘吉尔”干杯时能一口气把一大杯伏特加或威士忌喝下去。

少校从容自若而颇为自豪地大谈他们如何同被德国间谍煽动起来的当地起义的人进行的斗争。我们看到，飞机库确实被子弹打穿了许多处。

按照我们的理论原则的观点，我们认为，“为帝国主义”而牺牲自己是不可理解的，是非常不明智的，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看待西方国家的斗争的。但在内心里我们对英国人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精神也是赞叹不已的。他们在人员少而且在不能指望得到增援的情况下，在遥远的炎热的亚细亚沙漠里坚持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如果说当时我不能从这里作出更深刻的总结，但是这一切都影响了我，后来帮助我形成了一种信念：即在我们地球上有着无数的人类生活制度的星座，并不是只有一个唯一存在的理想。

我们不相信英国人，因而不敢接近他们。我们觉得最可怕的是他们的谍报机关，在我们头脑中对它的认识还极其肤浅，所以把它神秘化了，这在我们的态度里，有着书呆子气的简单化、惊险小说的影响以及阅历浅薄的人进入一个另外的世界时的那种惶恐不安的情绪，这一切都混合在一起了。

当然，如果我随身没有带那几包最高司令部的档案的话，我们也许不至于那么紧张，因为档案中有我们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而且英国军事当局对我们携带的这几个袋子一点不注意，仿佛里面装的是皮靴或罐头之类的东西，这就使我们更加觉得可疑，因而也就越加提高了警惕性。我虽然在整个路途中

总是守着这些档案,夜里也不一个人睡在单间房里。马尔柯·彼佩尔总是和我睡在一起,他是战前就入了党的门的内哥罗人,为人朴实、忠诚,又是个勇敢无畏的人。

一天夜里在哈巴尼亚有一个人轻轻地打开了我的房门。他开门时没有声音,我却感觉到有人进来了,在月光下我看见了一个本地土人,因为我被蚊帐缠住了,一下子出不来,就大叫起来,伸手从枕头下面掏出手枪。马尔柯马上跳下了床——他总是穿着衣服睡觉——但那个土人已逃得不知去向了。

土人可能是迷了路或想偷东西。而我们当然认为这件事情是出自英国间谍之手,因而更进一步加强了我本来已经相当高的警惕性。第二天,英国人给我们提供一架飞机,送我们去德黑兰,当时我们感到非常幸福。

在德黑兰从苏军司令部到苏联大使馆这一地区——这是我们在德黑兰活动的地段——我们觉得这里已经是苏联的一部分了。苏联军官待我们很真诚,这即体现出俄罗斯人的殷勤好客的传统,又表示出世界两个不同地区的战友为共同的理想而斗争所形成的团结一致精神。在苏联大使馆里我们看到德黑兰会议期间使用过的圆桌,还看见了罗斯福所住过的位于一层楼的那个小房间,当时这一房间没有人住,一切都保留了罗斯福在时的样子。

最后,苏联飞机终于把我们送到了苏联——它是我们的梦想和希望的化身。我们越深入到苏联的蓝灰色的辽阔天际,我们就越益被一种新的、当时还是模糊的感受到了的心情所支配——我似乎回到了古老的、陌生的,但是自己的故土。

我从来对任何泛斯拉夫主义情绪都很反感。我把当时莫斯科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甚至于仅仅看成是能够把保守力量都能动员起来反对德国侵略的手段而已。我那时的情绪和泛斯拉夫

主义没有什么共同点，我的认识要深刻得多，甚至于不是我的共产主义的信念所能容纳进去的一种思想。我模模糊糊地回想起，三百年来，南斯拉夫的幻想家和斗士，国务活动家和君主特别是灾难深重的门的内哥罗的君主，都到俄罗斯去朝圣，他们希望在那里取得谅解和拯救。我现在是否也在走他们走过的路呢？这里难道不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被某种不知名的力量抛到风雨飘摇、多事之秋的巴尔干半岛上来了——的祖国吗？我在想：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从来不会去了解南斯拉夫人以及他们的愿望。但是，当时我坚信：莫斯科和其它国家的冲突和不睦的社会原因以及其它因素，终于从根子上被拔除了。我当时把这看成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类博爱关系的实现以及我们史前时期存在过的斯拉夫大家族的统一。

这不仅是我们祖先的祖国，而且是那些为真正的世界大同以及人类长期为征服自然而牺牲的战士们的祖国。

我和伏尔加河流域，和无边无际的灰漫漫大草原融合在一起了，如同发现了原来的自我——这是一种我自己原来也不了解的心灵的活动。我甚至想当我踏上苏维埃俄罗斯的土地时，我要去吻这块土地，如果这不被看成是一种宗教仪式或更糟糕地被看成是戏剧性场面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做的。

在巴库迎接我们的是城防司令员，他这个人话不多，又因长期过着兵营生活，参战和在军队服务，所以他身体粗壮、高大，他是一名将官。在我们看来，他是这个伟大国家为反对妄想横扫一切的侵略行为的残酷斗争的化身。他是个粗犷但又很热情的人，对我们这些又羞怯又克制的人们感到惊奇：

“这是些什么人？！又不喝又不吃！我们俄罗斯人会吃，更会喝，而最会的是打仗！”

莫斯科的色调阴暗，情绪也很低沉，而我们觉得奇怪的

是：这里大量的建筑物都是低层的。

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和对我们的接待（按等级加以区分的礼遇）和我们的热情（表现出来的热情是故意有所克制的，因为我们的斗争都具有共同的共产主义的性质）又怎么能相比呢？我们把这次战争看成是人类最后的伟大考验，把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命运都寄希望于其中。苏联这个国家，它已成为我们的以及全人类的国家，这已经是既成的现实。这里恶梦已化成宁静与欢乐，除此以外，其它的一切不都变得暗淡，失去了它的光彩和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三）

我们被安置在接待苏联军官的红军中央大厦里。这里的伙食和一切接待条件都很好。还为我们提供了一辆专车，司机叫巴诺夫，是一位中年人，他善于独立思考，但有时脾气很怪。我们通过联络官，一位长得很漂亮的青年科佐夫斯基上尉可以随时得到戏票、电影票和一切我们想得到的东西，科佐夫斯基常常以他哥萨克出身而自豪，何况哥萨克在这次战争中已经把他们反革命的过去“洗刷”干净了。

然而，我们还没有机会能够同苏联领导进行较重要的接触，尽管我到此以后马上请求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①接见我，如果可能的话，希望约·维·斯大林接见我

^① 维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1980）1906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工作专家，为斯大林信任的助手，有一段时间，曾为仅次于斯大林的领导人。从1926年起进入政治局，为政治局委员，并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整个三十年代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以后的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以前任副主席。他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后称外交部长），曾为世界闻名。苏共党内斗争中一直站在斯大林一边。1957年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作为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剥夺了权力。从此以后只担任过比较次要的驻外职务。以后成为领取养老金为生的人。——译者

们，斯大林当时是政府的首脑及武装力量的总统帅。我们力图用迂回的办法把我们的愿望和需要告诉苏联当局，但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

形式上还属于王国的南斯拉夫大使馆最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尽管希米奇大使和为数不多的大使馆职员已表示皈顺铁托。他们虽然从表面上还是受到驻在国的尊重，但实际上比我们更无能为力。

我想通过南斯拉夫侨居苏联的党员达到我们的目的，但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流亡苏联的南共党员的这支队伍因几次清洗而为数不多了，其中最出名的人物是维利柯·弗拉霍维奇。我同他是同龄人，又都是门的内哥罗的同乡，我们两人又都在反对亚历山大国王独裁统治时期参加过大学生革命运动的战友。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受伤致残，而我又是从更严峻的战场来到这里的。他有着高尚的道德品质，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人很聪明，但是过分地守纪律，不能独立思考。他领导着“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工作，同他建立合作关系是很有益处的。但是与他有接触的关系，最高级的只有格奥尔基·季米特罗夫，因为共产国际已被解散，当时，季米特罗夫和曼努伊里斯基^①一起领导苏共中央同外国共产党进行联系的对外联络部。

我们吃得很好，受到热情的接待，但在我们所关心和需要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还想强调一

^① 季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里斯基（1888—1959），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外交家。1903年入党，地下工作时期，曾被捕和流放。十月革命之后，大部分时间在乌克兰担任各项职务，他是乌克兰人。他主要从事的活动是在共产国际。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第二次大战期间，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1945年至1952年任乌克兰外交部长，1952年任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1953年退休。——译者

下，在其它方面我们受到了异常周到殷勤的款待。但是，过了一个月，我同特尔基奇将军被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之后，我们被接见的消息马上在报纸上发表了，这时我们才有了可能进入苏联臃肿的行政机构和接触苏联社会的最高阶层的机会，所有的门如同魔术一样在我们面前打开了。

在战争期间成立的泛斯拉夫委员会最先为我们举行了宴会和会见。然而，不但共产党人，任何人都会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个委员会不仅是有意安排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组织。因为该委员会不过是一个牌子而已，完全是为宣传服务的，就是在这方面它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委员会的宗旨本身也不甚清楚，因为参加委员会的人多半是流亡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国家的共产党人，泛斯拉夫主义的团结思想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不用说所有的人都明白，必须把某种已成为过去的东西恢复起来或者如果就是不能把斯拉夫人团结在共产党俄国的周围的话，那么，那怕是能够麻痹反苏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潮，也是好的。

委员会的领导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主席是龚多罗夫将军，他是一个未老先衰，而且思想狭隘的人，同他就连极其表面的斯拉夫人团结问题也不能认真地谈一谈。委员会的秘书长是莫恰洛夫，因为他接近保安机构，因此，他更有权力，是个权威人物。他喜欢吹牛，说大话，他无法掩饰他是很有来头的人。龚多罗夫和莫恰洛夫都是红军军官，但都属于不适于在前线打仗的人，所以从两个人的情绪上可以发现那种被降职去做那些非本行工作的人们具有的隐藏在内心的压抑的心情。只有秘书娜扎罗娃（她是个过分殷勤的牙齿缝很宽的女人），表现出对斯拉夫人的好感，她的一切活动虽然都受着苏联侦探机构的指挥（这点我们后来在南斯拉夫才搞清楚的），但她仿佛对斯拉夫人真有感情，对他们遭受的苦难还是深表同情似的。

在泛斯拉夫委员会里吃的东西不少，喝的更多，而最多的是聊天和讲话。宴席间的讲话都是长篇大论，然而却空洞无物，这些祝酒的内容颇似沙皇时代，但当然不及沙皇时代那么词藻华丽、端庄。说实话，我当时对缺乏任何新鲜内容的泛斯拉夫思想感到奇怪。委员会所在地的建筑物也和委员会的思想一样，是一幢在现代化城市中类似巴罗克式^①的一类的建筑。

委员会是一种临时的、肤浅的，并非以无私的斯拉夫的团结政策为目的的产物。

为了使读者正确地理解我，我想在这里做一点补充说明，当时许多事情我都十分清楚，因此我丝毫不感觉奇怪和恐惧。该委员会是为了影响国外斯拉夫民族的落后阶层的苏联政府的驯服工具，它的工作人员同政府的公开和秘密的代表保持着联系——这一切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委员会的软弱无能和不严肃的态度，特别是它不能设法帮助我们找到通向苏联政府的道路，用以满足南斯拉夫的迫切需要。因为我当时象每个共产党员一样，受过党的教育，怀有一种深信不疑的思想：即在苏联和任何其它国家的人民之间不会有什么分歧，更不用说象南斯拉夫这样的革命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党了。虽然我把泛斯拉夫委员会看成是一个太陈腐，和争取共产主义的目标完全不适应的工具，但我还是愿意接受这个思想，主要是因为苏联领导坚持要建立这样的组织。至于委员会同保安机构的联系问题，我也和大家一样，几乎把保安机构看成是革命的神圣捍卫者——“党手中的利剑”。

我坚持苏联上层接见我这件事的性质，也有必要解释一下。我虽然很着急，但并没有去纠缠不休，而且对苏联政府根

^① 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一种建筑风格，如柏林市的建筑风格，强调力，如门柱等用雕塑的大力士顶住建筑物的压力。——译者

本没有产生任何埋怨情绪。我已习惯把苏联看成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甚至比我们党的领导和我们的革命更加崇高的力量。我从铁托和其它人那里听说过：对外国共产党人来说，长期的等待显然是莫斯科的某种风气。而我感到不安和不耐烦的只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了解我们南斯拉夫革命的急待解决的事情。

虽然任何人，甚至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自己并没有明确提出“革命”二字，但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情是真正的革命。关于这些事情西方已到处大写特写了。可是莫斯科恰恰是充耳不闻，不愿看到这样的事实，甚至于那些承认这些事实是属于他职权范围的人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有的人只是不断地谈论我们如何进行反对德寇的斗争，更加顽固地强调我们斗争的纯粹爱国主义性质，并喋喋不休地提什么苏联在这一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我在思想上根本没有想到过去否认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和红军在反希特勒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在我国的土地上，在我们特有的条件下，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全世界面前进行了并不以红军暂时胜利或失败为转移的战争，而这一战争同时在改变着我们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国内外，南斯拉夫革命已经超出了苏联政府对外政策方面的需要和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这是当时每当我遇到阻挠和误会时为自己作出的解释。

我最奇怪的是，一些应该理解这些问题的人也都保持沉默或假装自己什么也不懂。我当时还不知道：在莫斯科不应急于表态，特别是在政治观点方面，要等待斯大林或至少莫洛托夫表过什么态之后，再考虑自己的观点。这点甚至象对原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共产国际的书记曼努伊里斯基和季米特罗夫来说也都成了法律。

铁托、卡德尔及其它到过莫斯科的人都曾经讲过，曼努伊里斯基对南斯拉夫人特别友好。在1936——1937年大清洗期间整个流亡苏联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几乎全部在大清洗中死去。曼努伊里斯基的友好态度使他受了连累。但是现在当南斯拉夫人也起来反对纳粹时，他当时对南斯拉夫的同情心可以解释为他是具有远见的人。不管怎样，当曼努伊里斯基表示对南斯拉夫斗争的钦佩时，他流露出某种自豪感，虽然他并不认识任何一位南斯拉夫的新的领导人，或许他认识铁托，也不过是一面之交而已。

我同他是在某一天的晚上会见的。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当时著名的苏联哲学家格·费·亚历山大罗夫^①，更重要的是他当时是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部长。

亚历山大罗夫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突出的印象，他这个人观点模糊、毫无特色或者说是一个没有什么个性的人，这就是他的主要特点。他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秃头，他的脸色苍白，身体肥胖，说明他很少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会见时他只谈一般的客套话，除了总是和气地微笑外，一句话也没有涉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起义的性质和前景，尽管我仿佛无意中偶然地提到这些问题。显然，中央委员会还没有表示自己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所以苏联宣传机器仍然只谈反对占领者的斗争，而对南斯拉夫国内及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则保持沉默。

曼努伊里斯基也没有表示自己的鲜明立场，但他以激动而

^① 格奥尔基·费多罗维奇·亚历山大罗夫（1908—1961）苏联哲学家，1928年加入共产党。从1934年起在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工作，1939至1947年为该部负责人。他的《十九世纪西欧哲学史》一书，于1944年出版，该书受到日丹诺夫的公开批判。1950年他曾为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文章的哲学部分进行注释。1954—1955年任苏联文化部长，后任白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译者

热烈的心情表示对南斯拉夫的问题很感兴趣。我早就知道他很有演讲才能，这点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讲话时生动活泼、形象呼之欲出、而且逻辑性又很强、思想清晰、完整。他是位个子矮小背有些驼的老年人，黑黑的肤色，留着一撮小胡须。他说话时S和Sh不分，却十分柔和，更奇怪的是显得无精打采似的。在一切方面都十分殷勤、周到，遵守礼节到令人觉得难以为情的程度，他的举止留有明显的上层社交界的气质。

我在谈到南斯拉夫起义发展过程时说，在南斯拉夫以新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按其实质来说是和苏维埃一样的政权。我特别强调的是农民的新的革命作用：我把南斯拉夫起义几乎看成是农民起义与共产党先锋队相结合的产物。曼努伊里斯基和亚历山大罗夫虽然没有反对我的看法，但也没有赞成这一看法的任何表示。

虽然当时我认为斯大林在一切问题上起主要作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我仍然希望曼努伊里斯基能在观点和思考问题方面会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和主动精神。他的活跃和对南斯拉夫斗争的赞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使我十分感动，但这次会见告诉我，曼努伊里斯基在制定莫斯科政策（包括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中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

他在谈到斯大林时，总是力图把自己恭维的话语给以“科学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例如他说：

“要知道，完全不可理解，一个人能够在决定命运的战争时刻起如此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人身上竟然能够集中了那么多的才能——他是国务活动家、思想家，又是军人！”

我关于曼努伊里斯基不起什么作用的想法后来完全得到了证实。他后来被任命为乌克兰的外交部副部长（他是乌克兰的

犹太人),而这意味着他已彻底离开了一切真正的政治活动。不过,作为共产国际的书记,他一直是斯大林手中的驯服工具,这还因为他过去不完全是布尔什维克,他曾经是托洛茨基领导的所谓“区域派”^①小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1949年我在联合国大会上见到过曼努伊里斯基,他是代表乌克兰在大会上发言,反对“帝国主义者”和“铁托法西斯集团”。他的讲演的才能只剩下肆无忌惮的胡说,他的思想的洞察力只剩下连篇的空话。这已经是一个完全无用的衰老不堪的老头子——不久他就从苏联特权等级的阶梯上滑了下来,以后就再也无人知道他的下落了。

季米特罗夫的情况不同。

那次我在苏联逗留期间我曾见到他三次,两次是在苏联政府医院里,一次是在他的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

每次他给我的印象都是他的疾病缠身的样子。他有哮喘病,呼吸困难,皮肤颜色很不健康,一块红,一块白的,完全是病态现象。耳朵后边的皮肤干巴巴的,象得了皮癣似的。头发脱落了,稀少得露出了他那枯萎了的黄色的头皮。

然而,他的思想活跃、敏锐而新颖,和他的缓慢而疲倦的动作恰好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未老先衰的、体力已完全衰竭的人,还在发射着强大的智慧和热情。他的面貌也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他鼓溜溜的蓝眼睛发射出那紧张思考的光辉,那高

^① “区域派”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参加的人有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及大部分是从布尔什维克分裂出来的列宁格勒“前进派”小组成员,他们企图劝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和解,组成统一的党。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他们和孟什维克决裂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批准“区域派”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译者

高的大鼻子和突出的下巴。他虽然没有能够讲出他所考虑着的一切，但他谈吐坦率，思想坚定不移。他当然了解南斯拉夫事件的实质，但也认为考虑到苏联同西方的关系，不必过早地涉及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真正共产主义性质。我也和他一样，认为在宣传中首先要强调反占领者的斗争，不要涉及这一斗争的共产主义本质。但同时我想让苏联的领导层和季米特洛夫本人明白，至少在南斯拉夫没有必要强制要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行动，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次战争和国内战争都已证明，共产党是国内的唯一现实的政治力量。我这一观点的意思是不承认南斯拉夫的流亡王国政府，总之，实际上不再承认君主政体本身。

我同季米特洛夫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把南斯拉夫国内发生的事件和形势全都告诉了他。

季米特洛夫坦率地承认，他没有想到，南斯拉夫成了最有战斗力最善战最机智的党，原来他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法国党身上。他回忆起，铁托在1939年底离开莫斯科时曾发誓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将会洗刷各种宗派分子留下的污点，并证明他们是无愧于自己的光荣称号的党。季米特洛夫当时劝铁托不要发誓，而是要机智和勇敢地行动起来。他告诉我说：

“您知道吗，当提出要任命南斯拉夫党的书记问题时发生了分歧，我同意瓦尔特^①任书记，他是工人，坚定而严肃。我很高兴，因为没有看错人。”

季米特洛夫似乎颇带歉意地提到，苏联政府没有能够在南斯拉夫游击队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他曾把南斯拉夫的情况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也很关心这件事。这是真的，因为

^① 瓦尔特是约瑟普·铁托在共产国际用的化名，在采用铁托这个名字以前，他一直用这个化名。——译者

1941—1942年苏联飞行员确实企图打通到南斯拉夫游击队基地的道路，但是没有成功，而一些被派出去的流亡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党员也都给冻坏了。

季米特洛夫也回想起我们就交换俘虏同德国人进行的谈判，他说：“当时我们为你们担心，幸好一切都顺利地结束了。”

我没有说什么，不想把谈的话超过他提出的范围。如果他提出要了解一些细节的话，我也不会再多讲了。但是我担心他会问我不好回答的问题，这个想法是多余的——因为在政治上那些已经取得了良好结果的事情，是很快就会被忘记的。

季米特洛夫确实什么也没有坚持，因为共产国际在事实上已经解散了，他本人的工作任务是搜集各国共产党的情报以及需要时向苏联政府和党提出建议。

他还告诉我，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想法最初是怎样产生的：这件事是苏联与波罗的海国家合并的时候发生的。就在那时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传播共产主义的主力是苏联，所以一切力量应该直接在苏联的周围团结起来。然而，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解散之事被搁置下来了，主要是担心别人会怀疑：这一定是在德国人的压力下作出的，因为当时苏联和德国人的关系并不坏。

季米特洛夫是得到斯大林尊重和在他面前享有威信的人。他是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当然领袖，当然这点并不太重要。

这个问题在我同季米特洛夫以后两次会见中被证实了。第一次会见时我把南斯拉夫的形势告诉了保加利亚党中央的成员，第二次会见时我们谈到保南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以及保加利亚的斗争情况。

在同保加利亚中央会见时，除了季米特洛夫外，参加会见的还有科拉罗夫^①、契尔文科夫^②等人。

我第一次去拜会时就见到了契尔文科夫，但他没有参加谈话，所以我当时以为他是季米特洛夫的私人秘书。第二次会见时，他还是沉默着，态度克制，可是后来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改变了。我从费拉霍维奇^③和其它人那里得知，契尔文科夫是季米特洛夫的妹婿，在大清洗时他已被列为逮捕对象。在他当教员的政治学校里已发出关于“揭发”他的通知，可是他躲到季米特洛夫家里来，季米特洛夫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把这件事情处理了，他才幸免于难。

在清洗期间，受害最深的是那些地下党的流亡在苏联的共产党员，因为没有人保护他们。保加利亚的党员很幸运，因为季米特罗夫是共产国际的书记，是很有威望的人物，他拯救了

① 瓦西里·科拉罗夫(1877—1950)保加利亚共产党员，1949年继季米特罗夫之后任总理。他也是共产国际的老战士，1922年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保加利亚，历任保加利亚临时主席(1946年)、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1949年)等职务。——译者

② 伏尔科·契尔文科夫(1900—1980)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1919年入党。1925年因参与密谋索非亚大教爆炸案，与其妻子(季米特罗夫的妹妹)一起逃往苏联。在苏联列宁党校毕业后，参加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工作。1937年苏联大清洗运动期间，任列宁党校校长，直至该校于1941年停办为止。第二次大战期间，领导对保加利亚进行广播的苏联“赫里斯托·鲍泰夫”广播电台的工作。1944年9月9日回到保加利亚接受共产党书记处的工作。1950年1月继科拉罗夫之后任总理。同年11月任党的总书记。斯大林死后，辞去总理工作，任文化部长，后来又恢复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苏共22大以后，保共于同年十一月召开了全会，将他开除了政治局。——译者

③ 维利科·费拉霍维奇(1914——)1935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门的内哥罗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在组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方面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1944年底回国任南共党《战斗报》主编和外交部副部长。是南斯拉夫出名的理论家，杰拉斯离开领导职务之后，他和卡达尔都是理论界享有盛名的权威人士。——译者

许多人。流亡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党员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保护，或者勿宁说互相间又争权夺利、想方设法要证明自己对斯大林和列宁主义的忠诚，实际上他们为自己掘了坟墓。

科拉罗夫是个七十高龄的老人，已经老态龙钟，而更重要的是从他身上可以看得出多年来他已不从事政治活动了。他很象是“紧密派”^①时代和保加利亚党起义年代的遗老。科拉罗夫的大脑袋如其说象斯拉夫人的头型，还不如说象土耳其人的头型。他的五官都很粗犷，鼻子高高的，嘴唇厚厚的。他的头脑全都是已经流逝的往事，和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而且言谈中颇带有几分恶意。

在叙述中，我并没有只限于分析，我还描绘了我们国内被烧杀的恐怖景象；我告诉他们战前入党的一万人中如果幸存下来的有两千人，就很不错了，我当时估计我们的战士和居民大约牺牲了一百二十万。我讲完后，科拉罗夫只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在您看来，马其顿人讲的话更近似保加利亚语还是塞尔维亚语？”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已同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生过几次严重的摩擦，因为后者认为，既然保加利亚占领了马其顿，那么当地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也应该转归他们来领导。共产国际的表态终于结束了这一争执，他们同意了南斯拉夫的观点，但这时德国已进攻苏联了。以后，随着德国（也包括保加利亚）必然失败形势的来临，围绕着马其顿及起义问题的摩擦也越来越尖锐了。费拉霍维奇在莫斯科也指出过：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提出了对南斯拉夫马其顿的领土要求。诚然，在

^① “紧密派”是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左翼，后来发展成共产党。1923年保加利亚共产党进行了反对赞科夫将军军人集团的武装斗争，该集团不久前发动了政变并杀害了农民领袖亚历山大·斯坦波利斯基。——译者

这个问题上，季米特洛夫的态度和其它人的态度有些不同，他把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摆在首位。但是我想，连他也没有认为马其顿人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尽管他的母亲是马其顿人，而他又对马其顿人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在回答科拉洛夫的问题时，也许颇有不敬之意，我说：“我不知道马其顿人的语言是近似保加利亚语还是塞尔维亚语，但是我知道马其顿人不是保加利亚人，马其顿地区也不属于保加利亚。”

季米特洛夫听了我这样说很不舒服，他的脸红了并摆手说：“这并不重要！”，并把话题转到另一个问题上去了。

我已不记得，当我和季米特洛夫第三次会见时，有谁在场，不过契尔文科夫多半是参加了会见的。这次会见是1944年6月初在我即将回南斯拉夫之前进行的。我们谈的是有关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然而，当时谈这一问题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当时保加利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游击队。

我坚持，保加利亚应该建立自己的游击队，把武装行动开展起来，我说，等待保加利亚皇家军队发生倒戈的事，那只是幻想而已。我所依据的是南斯拉夫的经验：只可能有个别的军官从旧的王国军队中转到游击队方面来，所以共产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经历千辛万苦，从小到大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显然，季米特洛夫尽管认为应该更加主动地开始组织游击队，但是他也抱有上述幻想。

但看得出来，他是了解我们不能了解到的情况的。当我指出，南斯拉夫与德国占领时期已经粉碎旧的国家机器，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扫除它的残余势力。此刻，季米特罗夫说了这样一句话：“再过三、四个月，保加利亚自然会发生巨大转变——红军不久就要开到保加利亚边界了！”

保加利亚和苏联虽然没有处于交战国的状态，当时我已经看得很清楚：季米特洛夫指出红军是解救保加利亚的决定性因素。他当然没有明确地讲出来，红军将要进入保加利亚，但显然，他当时已了解这种形势即将发生，并向我作了暗示。

由于季米特洛夫的这种看法和打算，使我强调游击活动的看法失去了实际意义。所以我们的谈话转到相互交换对其它一些问题的看法，然后他表示向铁托及南斯拉夫战友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我想应该提一下季米特洛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问题。他同大家一样，对斯大林是尊重和钦佩的，在他的态度中没有明显的奉承和崇拜。他对斯大林的关系是一个服从领袖、遵守纪律、而又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革命者的态度。他特别强调的是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作用。

对我描述了当时的苏联的情景，他说：“当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人们普遍失去了信心，产生了混乱不知所措的情绪。苏联政府搬到古比雪夫市去了。可是斯大林还留在莫斯科。我当时到克里姆林宫去见他，看到克里姆林宫的档案正在转移。我建议斯大林，要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一个给德国士兵的宣言。他虽然认为这个作法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同意了我的建议。不久我被迫离开莫斯科。可是斯大林仍留在莫斯科，并决定保卫莫斯科。在这悲惨的日子里，在庆祝十月革命节时，他在莫斯科红场上检阅了军队，部队接受了他的检阅，从他的身旁走过直接开往前线。当苏联人们知道了斯大林还坐镇莫斯科并且听到莫斯科的讲话时，他们所受到的巨大鼓舞是难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为此他们恢复了自己的信念，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而这一点比拥有一支好的部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

在这次的会见中，我认识了季米特洛夫的夫人，她是苏台

德区的德国人。此事大家都讳莫如深，因为当时大家对德国人都自发地怀着深仇大恨，对这些事他们比对反法西斯的宣传更容易接受。

季米特洛夫的别墅非常豪华，那里应有尽有，缺乏的只是欢乐。季米特洛夫的独生子已经夭折了，一个弱小男孩的像片挂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季米特洛夫作为战士还能经受得起失败和享受胜利的喜悦，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已是精疲力竭的老人，他只能对向他表示同情关切的周围的环境用沉默表示感谢。

(四)

在我们到达莫斯科前几个月，苏联宣布在苏联境内成立了一个南斯拉夫旅。前此不久，还建立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队伍。在南斯拉夫时，我们总是不明白，苏联境内怎么会有那么多南斯拉夫人，就是偶然来到苏联的少数政治流亡者也都在清洗时失踪了。

到莫斯科后我才弄明白了，原来所谓南斯拉夫旅的主力是克罗地亚卖国贼巴维里奇派往苏联前线德军那里去的一个团，用以作为和德国人合作的象征而派出的。然而巴维里奇的部队在那里运气不好，这个团在斯大林格勒被击溃了，全团官兵被俘。在经过一般的清洗之后，改编了这个团，组建了以该团团长麦西奇为首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旅。以后，又从各处招来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政治流亡分子，把他们作为政治干部派到这个队伍里去工作，苏联军官——军事专家和保安工作人员——负责培训和审查人员的工作。

苏联代表一开始想让这个旅的军衔和配带的军徽和南斯拉夫皇家军队一样，但是弗拉霍维奇坚决反对，所以他们同意采

用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用电报往返的形式商谈妥军衔和帽徽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弗拉霍维奇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帽徽和各种徽章变成了幻想和妥协的混合体。最后这一问题还是由于我们的坚持终于解决了。

在南斯拉夫旅问题上,没有发生其它实质性的分歧,当然如果不把我们对保留老团长领导该旅表示不满计算在内的话。俄国人保护了他,他们认为,他已经表示悔改,而且这样做,对团结下级能起良好的作用。麦西奇给我的印象是,他已完全没有斗志,和其它许多人一样,他之所以改变态度,只是因为怕被送到俘虏营去。他本人对自己的地位也不满意,因为大家都明白,麦西奇在旅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只是走走形式,当作摆设而已。

这个旅驻扎在克洛姆纳附近的森林里。就住在地下工事里面,他们冒着俄罗斯冬日的严寒进行训练。

起初我对旅内实行的严酷的纪律表示惊讶,我总感到对这个军队提出来的目标,与向这些人员灌输这一目标,使之相信这一目标的方法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在我们游击队里只有同志间的友爱和团结,只有当发生抢劫和违法乱纪行为时才采用严厉的惩罚措施。在这里一切都建立在盲目服从的基础上,就连腓特烈一世时代的普鲁士人也在他们面前大为逊色。我们在南斯拉夫已经学会和教育了其它人的那种自觉纪律在这个旅里连个影子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旅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无论对苏联教官的过分严厉,或者对昨天还站在德国人一边和我们作战的士兵,我们都毫无办法。我们进行了一次视察,讲了话,马马虎虎地讨论了一些问题,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能够改变。同军官们的例行设宴招待当然是少不了的,他们不停地为铁托和斯大林举杯,还为斯拉夫人的兄弟友情互相拥

抱，但很快都喝得酩酊大醉，一无所剩了。

我们这次还有一个附带的任务——研制第一批新南斯拉夫的勋章。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如果说勋章、特别是“1941年纪念章”质量不高的话，这不是苏联工厂的罪过，而是因为我们从南斯拉夫带来的图案太一般、太差了。

那时监督外国人部队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茹科夫将军。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生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他年纪不大，很机灵，幽默而善于开一些不太伤大雅的玩笑——他的这些品质在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中并不少见。关于南斯拉夫旅，他告诉我说：“如果考虑到我们所接受下来的是些什么货色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旅是相当不错的。”

的确如此。后来在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这个旅表现得并不怎么样，虽然他们的损失是巨大的，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军队指战员的素质差，更不是因为从组织上看它是一支畸形的队伍，以及军官完全缺乏与自己不同的军队配合作战的经验，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这里的作战方式完全和东线的作战的方式不同。

茹科夫将军也为我举行了宴会。墨西哥的武官在同我说话时表示愿意援助南斯拉夫，但遗憾的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援助怎样能够运到南斯拉夫的国土上。

离开莫斯科前夕我出席了茹科夫将军的午宴。他同他的妻子住在两个起居室一套的房间里。房间舒适，但很朴素，当然在莫斯科的条件下，又是战时，这样的房子已经显得够豪华了。茹科夫是很忠诚的干部，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在实现共产主义方法的问题上，他崇尚暴力胜于主义。我们之间的关系多少可算是亲密的，但是彼此都很克制，这是因为任何因素都不能排除我们之间的习惯和观点方面的差别，因为只有在每个人

保留了自己特点的时候，政治友谊才是宝贵的。

告别时茹科夫赠给我一支军官用的自动步枪，一件朴实的但在战时很适宜的礼物。

那时，我也有过性质完全不同的会晤——同苏联侦探机关的会晤。我在红军司令部招待所里通过科佐夫斯基上尉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衣着朴素的小人物，他并不隐瞒自己是以国家保安机关的名义同我打交道的。我们约会第二天见面，而且使用的秘密接头的方法之多，使我这个多年的老地下工作者都认为这一切都是多余的、老一套的、故弄玄虚的复杂方式。在我住处不远的胡同里有一辆小轿车等我上车，然后我们在城里兜圈子，我们换了一辆，又在一条街上下了车，步行到另一条街上，在这里从一座大楼的窗户里给我们扔出了一把钥匙，我们用这把钥匙把三层楼上的一套豪华住宅的房门打开了。

住所的女主人（如果她是女主人的话）是一个金发的北方人，她生有一对明亮的眼睛，是一个漂亮、身体强壮而丰满的女人。她丰满的体态使她更增加了姿色。在我们见面时，她的美丽和魅力，看起来并不起什么特殊的作用。她比带我来这里的人级别更高，因为她向我提出各种问题，而带我来的那个人却在作记录。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的情况如何，而对南斯拉夫其它政党的兴趣并不怎么大。我感到厌恶，因为这很象是警察局的审问，但我知道作为共产党人，我有责任回答她所提出的问题。如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个成员要召见我，我也不会产生怀疑。然而，为什么这些人需要了解有关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情况呢？这些特工人员的责任不正是要同苏联的敌人及各共产党内可能出现的奸细作斗争的吗？尽管我有这样的疑问，我还是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不过，我回避答复任何具体的问题，不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特

别回避谈论涉及党内摩擦的问题。我回答时感到一种厌恶情绪在支配着自己，因为从道义上我实在不能背着我的同志谈论他们的任何情况，我从内心里不愿意在无权了解我们党内部情况的人的面前，讲我们党内的情况和我个人对他们的评价。我这种厌恶情绪当然使我的主人感觉出来了，谈正题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边喝茶吃点心，边进行不太紧张的同志式的谈话。

可是，我同苏联社会活动家的会面更多一些，也更亲切一些。

那时，在苏联与同盟国的外国人之间接触并没有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战争正在进行着，而我们是唯一发动反希特勒起义的党和民族的代表，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心。寻找新思想、新题材的作家，寻找有趣故事情节的电影工作者，想得到写文章的新资料和情报的记者，请求作为志愿者去南斯拉夫作战的青年男女，都来找我们。

苏联最大的报纸《真理报》约我写关于南斯拉夫斗争情况的文章，《新时代》杂志要我写关于铁托的文章。

无论写第一类或第二类的文章，在编辑部我都遇到了困难。

《真理报》把有关我们斗争的性质及其政治后果的部分基本上删掉了。在我们党内，我们把一些文章的内容纳入与党的路线相吻合的轨道的事也是有的，但这只是在文章偏离党的路线太明显，或者当有人提出了十分微妙的问题的时候。然而《真理报》却把一切涉及我们斗争的实质性内容——新政权和社会变革——全部删掉了。不仅如此，它还企图改变我的文风，把每一个具有特色的提法都给删掉、缩短了句子，改变了我的语气。我的文章变得枯燥无味。在我同一个工作人员争吵了一阵之后，我只好同意他们歪曲我的文章，因为我意识到没有

必要为此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登载这样的文章还不如什么文章都不登。

同《新时代》杂志的争论就更加厉害。在这个杂志社对我的风格和热情改动得比前一篇少一些，但是凡是谈到铁托个人的特殊和突出作用的几乎所有的地方或者被抹去棱角或者被删掉。在我同《新时代》某一工作人员第一次见面时，我同意改变某些非原则性的小问题。当我第二次和他见面时，我已经懂得在苏联除了斯大林之外不能称赞任何人，因此我才同意作了其它的改动，当时《新时代》的工作人员毫不掩饰地告诉我：

“由于斯大林同志的原因，这样做是不恰当的，这就是我们这里的规矩！”我还想指出，我之同意作某些改动，是因为我的文章从总的方面看，还保留了其实质和风格。

对我和其它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来说，斯大林的领导作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能也提高其它的共产党领袖的地位，具体来说，例如铁托这样的人，从共产主义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有功劳的。

需要补充一下，铁托本人对这篇文章很满意，因为据我所知，在苏联报刊中，还没有对任何在世的活动家给予过如此高的评价。

（五）

其中的原因在于，苏联的舆论界——当然是共产党舆论界，因为在苏联不存在其它的积极而公开的舆论——当时对南斯拉夫斗争很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战争的进程改变了苏联社会的气氛。

回顾过去，我可以说：当时很自然会产生这样的信念，战争期间苏联人民再一次表明了自己对祖国和革命基本原理的忠

诚，因此战后不需要各种政治上的限制，也不需要一小批领袖或者至少是一个领袖在意识形态及其它方面的垄断。在苏联人民眼前，世界发生了变化。显而易见，苏联不会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领袖和革命理论家正在出现。

那时，这种气氛和情绪不仅没有影响苏联领导的威望，相反，帮助了他进行战争。况且还有许多原因，使苏联领导也支持了这种幻想。此外，铁托，更确切些说是南斯拉夫的斗争改变了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力量的对比，而丝毫没有威胁苏联的阵地，相反，巩固了这一阵地，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宣传和支持这一斗争。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情况。苏联政权，更确切些说是苏联共产党，虽然同西方民主国家结成了联盟，但是在斗争中它感到自己是孤立的，因为只有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为保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而战斗。由于第二战线还没有开辟，更确切些说，当俄国人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第二战线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役，因此每个普通俄国人，普通战士都感到自己很孤立。南斯拉夫起义使苏联的领导和人民都消除了这种孤立感。

我作为共产党员和南斯拉夫人对处处受到的爱戴和尊重、特别是在红军中所受到的热爱和尊敬而深受感动。在一个被缴获的德军武器展览会上，我心安理得地在签名簿上写道：“我为在这里没有南斯拉夫武器而自豪！”，在这个展览会上可以看到欧洲各国的武器。

我们被邀去参观西南战线，这里是伊·斯·科涅夫^①元帅

① 伊凡·斯切潘诺维奇·科涅夫（1897—1973）苏联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解放哈尔科夫（1943年）和基洛夫格勒（1944年）战役中赢得了空前的盛誉。战后出任维也纳盟国管制委员会苏方代表。1946年至1955年任陆军总司令。从1955年起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华沙条约国武装部队总司令。1960年因病辞职。他是1953年处决贝利亚的特别法庭庭长。——译者

指挥的第二乌克兰战线。

我们的飞机在乌克兰的一个小城镇乌曼降落了，这里，战争和无限的人类仇恨所带来的破坏和创伤到处可见。

当地的政府为我们举行了晚宴和安排了我们同本城社会活动分子的会见。在这破烂不堪的楼房内所举行的晚宴是不会愉快的，而乌曼市的主教和市委书记就是当着外国人的面也无法掩盖他们之间的互相恶感，而他们各自按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反德国人的斗争。

我已从苏联的党的工作人员那里知道，战争一爆发，俄罗斯大主教就不经过政府允许开始散发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油印通谕，而这些通谕不仅在大主教所属的宗教界中，而且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了响应。这些呼吁书从形式上也是吸引人的，它们和千篇一律的苏维埃宣传材料不同，它们给人以一种古老而虔诚的爱国主义的新鲜感。苏维埃政权很快随机应变并开始依靠教堂的支持，尽管还继续认为这是旧社会的残余。在战争灾难降临期间，宗教感情活跃起来并开始在苏联扩散。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使团团团长科尔涅也夫将军告诉我们，许多人、甚至是很多负责的同志在面对德寇的生死存亡时刻都曾经想去信仰东正教，认为这是更加长期起作用的精神刺激因素。他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东正教去拯救俄国！”

今天，那些不能想象当时落在俄国人民头上的打击是如何沉重的人，不懂得当时每个人类社会所能接受和发展的思想只是如何能保存和改善社会生存条件的人，他们对上述的思想状态是无法理解的。科尔涅也夫将军虽然是一个酗酒成性的人，但他并不愚蠢，而且对苏维埃制度和共产主义是忠贞不渝的。我是在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而革命运动是靠自己思想的纯洁性为自己生存而斗争的，所以科尔涅夫将军当时的假设在

在我看来是可笑的。然而，当乌曼市的主教为斯大林举杯，把他称之为“俄罗斯国土的统一者”时，我并不觉得奇怪，这证明俄国人的爱国主义，也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是多么强烈呵。斯大林本能地明白了，如果不求助于俄国人民的传统愿望和民族精神的话，那么无论社会制度还是政权都经不住德国侵略军的打击。

但主教巧妙地但好象是随便地强调教会作用的时候，乌曼市委书记简直无法掩饰自己的恼火。而最使书记恼火的是居民的消极情绪——他在占领时期所领导的游击队人数少到不足以对付亲德的乌克兰警察。

确实如此，乌克兰对战争和苏联胜利的消极态度是无法掩盖的。当地居民给人的印象是忧郁和沉默，他们对我们丝毫兴趣都没有。我们唯一接触的人是军官，他们对乌克兰人民的情绪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用过分乐观的调子谈论他们，可是我们的俄国司机骂他们没有好好作战，现在还要俄国人解放他们。

第二天，我们顺着红军胜利前进的道路踏着乌克兰春天的泥泞出发了。我们到处看到被炸毁的东倒西歪的德国人的装备，这更加衬托了红军的英勇善战和强大的威力。但是，我们更加佩服的是俄国士兵的能吃苦、有毅力和谦虚的美德，他们能一连几天、几星期在齐腰深的泥水中不吃不睡，坚持打退德国人的猖狂进攻。

今天，如果放弃我当时的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心情，我仍然和过去一样，对红军，尤其是对他们的核心——俄罗斯士兵，给以极高的评价。

苏联的军官，特别是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政治上受到的是片面教育，尽管如此，在其它方面他们具有积极主动性，广阔的文化知识和认识水平。严厉的和无条件的（但不是没有意义

的) 纪律, 自觉服从于主要目标和任务。苏联军官不仅具备很好的专业知识, 他们同时还是属于苏联知识分子中最有才干和胆略的那一部分。他们的报酬虽然相对而言是很不错的, 但是他们并不组成一个隔绝于外界的特权阶层; 上级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求不高, 首先要求他们勇敢指挥, 亲临战场。例如: 在雅斯地区的军团长的指挥部离德军前线只有三公里。斯大林虽然在军队中搞了大清洗, 特别是在高级指挥系统中, 但是这点所带来的危害并不象人们所估计得那样严重, 因为他同时毫不动摇地提拔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军官——忠于他的每个军官都明白, 他们的风发的志向会得到支持。斯大林在战争期间, 对高级指挥体系所进行的调动和安排如此迅速和果断, 使人们看到, 他真是精明强干并愿意给最有才干的人提供晋升的机会。他同时做两件事情: 一方面, 在军队里培养绝对服从政府、党和他个人的精神, 为加强军队战斗力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惜一切; 另一方面, 迅速提拔最有才能的人才。

在红军里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军长讲的、当时使我感到十分奇怪、但确是很勇敢的提法, 他说: “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时, 战争将是极端残酷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 战争仅仅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因此共产主义必须消灭阶级, 到消灭了阶级的时候人类就没有进行战争的必要了, ——这点苏联指挥员和我一样都是很清楚的。但是, 这位将军象其它许多俄国士兵和我一样, 在残酷的战斗中通过战争的痛苦历程, 感觉到以后还会出现另一个遥远的真理: 即正是在全人类都处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时, 人和人之间的斗争才会达到最残酷的程度。这是因为制度不可能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 各种不同的宗派为了人类的“幸福”, 将会惨无人道地消灭人类。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苏联军官们虽然把这一

思想深藏在他们的心中，可是我没有忘记，而且当时也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即使他们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保卫的社会里也存在着深刻的对抗性分歧时，但他们无疑已模模糊糊地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人虽然不能在某个特定社会和在某种特定意识下生活，然而他的生活还从属于某些其它的、同样重要的、不可动摇的法则。

在苏联，我们已对许多事物逐渐习惯了。可是当我们离开前线的前夕，科涅夫元帅司令部在一个比萨拉比亚村庄为我们举行的酒会，使我们这些坚信只有通过苦行僧的禁欲主义才能取得并已取得了人民信任的党和革命的儿子感到十分惊讶！

一些对服务员来说长得太漂亮、打扮得太妖艳的少女，不断端来大量的精美食品——鱼子酱、干鱼脊肉、鲑鱼、鲜黄瓜、腌蕃茄、火腿、烤仔猪和辣干酪，接着又端来红果汤、热热的肉饼，最后是足有几寸厚的蛋糕和一盘盘南方水果。这一大堆东西简直要把桌子压弯了。

可以感觉出来，苏联军官在酒会以前就已经望眼欲穿，要在酒会上大吃大喝一阵。但对南斯拉夫人来说，这是一次大考验，因为他们也必须喝酒，尽管这和他们的“共产主义道德观”，他们军队和党的传统是不相吻合的。在酒会上，他们都表现很好，尤其是如果想到他们不习惯喝酒，他们借助于精神高度集中和毅力才帮助他们经受住了无数次的“干杯”，而没有醉倒。

我和往常一样喝得很少而又谨慎，我的借口是头痛，当时我也确实患有头痛症。而我们的捷尔基奇将军太惨了，他本不会喝酒，但是他应付不了俄国兄弟们，特别是他们举杯要为斯大林干杯，而且又是在他们刚刚为铁托干完杯的时候。

陪同我们的苏联总参谋部的上校最可怜了。因为他是“后

方兵”，元帅和他的将军们利用自己比他军衔高这一有利地位拼命地冲击他。科涅夫元帅完全不顾上校体弱多病这点，他正是因为在前线多次受伤才调到总参谋部工作的。元帅直截了当地命令上校说：“上校，为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胜利干一百克酒吧！”

大家沉默无言，都在看着这位上校，我本想替上校说几句好话，但是他却站起来，立正后把酒喝下去了，不久我们就看见在他那高高的、苍白的前额上冒出了一颗颗的大汗珠子。

负责同前方保持联络的军官，前方指挥部的军官都不能喝酒，除非前方确实平安无事。据说，在同芬兰打仗时，日丹诺夫建议斯大林，为对付严冬每天发给士兵一百克白酒，从那时起，红军的这一习惯保留下来。在进攻前夕还加一倍。别人告诉我：“这样可以使士兵更感到无忧无虑，奋不顾身了。”

科涅夫元帅也不喝酒，因为医生发现他肝脏有病不让他喝酒，当场也没有比他军衔高的军官，所以没有人命令他喝酒。

科涅夫元帅，五十岁，身材高大，一头金发，他的脸虽然消瘦但很精神。他因为同意公认的“哲学逻辑”——“应该让人们时常有娱乐的机会”，所以鼓励大家大吃大喝，但是他有卓见，对自己和下级具有充分的信心，和别人不同。

随同我们去前方的《真理报》记者——作家波列沃依，在我们面前常常过分夸耀他的国家的英雄气概和其它长处，他也向我们讲了不少说明科涅夫的超人毅力和勇敢的轶事。有一次，当科涅夫所在的瞭望哨遭到德军迫击炮的猛烈攻击时，他假装用望远镜进行观察，但实际上却斜着眼睛看他的军官表现如何。每个军官明白，如果他表现出丝毫动摇的话，他就立刻会被撤职，因此他们都不敢警告科涅夫，说他的生命正在受到多么大的威胁。周围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但是科涅夫本人在他

的观察全部结束后才离开瞭望哨。还有一次，弹片打中了他的腿，他仍然继续留在前方。

科涅夫是一位斯大林式的新型指挥员，尽管他提升并不象罗柯索夫斯基那样迅速和轰轰烈烈。他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即参加了红军，那时他是一位青年工人，后来他几度在军校学习，一步一步地得到提升。他是经过战斗洗礼提拔起来的将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军队骨干的特点。

沉默寡言的科涅夫只用几句话向我讲述了刚刚结束的科尔松——谢甫琴柯战役的情况。在苏联，大家是把这次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提并论的。当谈到德军最后惨败的景象时，他显得洋洋得意，他说：拒绝投降的八万、也许是十万德军被逼到一块小小的地段，然后用坦克击溃了他们的重型装备和机关枪基地，最后哥萨克骑兵把他们全部消灭了。

元帅笑着说：“我们允许哥萨克骑兵尽情地砍杀敌人，甚至连举手投降的敌人的手，他们也都给砍掉了！”

应该承认，当时我也为德军这样的下场而高兴，因为纳粹分子自称他们是优秀种族也把战争强加给我的祖国。在这一场战争中丧失了一切传统的人道主义原则。与此同时，一种恐怖感控制了我，因为一切确实也只能如此，而又不能是另一个样子。

我当时坐在这非凡人物的右侧，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提了一些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第一，苏联在战争开始时的那些高级将领：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人，为什么被调离他们的岗位？

科涅夫回答说：“伏罗希洛夫是一个大无畏的人，但是他没有掌握现代化战争的方法。过去他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赢得胜利。伏罗希洛夫曾经指挥过军事活动的国内战

争期间，空军和坦克实际上并没有起作用，而在现代化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飞机和坦克。布琼尼从来没有掌握很多知识，以后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所以他简直是没有用处的人，他犯了很大的错误。沙波什尼科夫从来都是参谋部的专家。”

“斯大林呢？”我问道。

科涅夫假装不感到惊奇，稍考虑片刻，然后谨慎地答道：

“斯大林是全才，他出色地掌握了整个战争的特点，所以能够保证顺利地指挥战争。”

他没有多讲，也没有讲什么吹捧斯大林的那些老调子。至于斯大林在纯军事战役方面有那些领导才干，他也没有谈什么。科涅夫是异常忠于党和政府的老共产党员，但在我看来，他在军事方面的观点是相当固执的。

科涅夫也送了礼：他把他自己的望远镜送给了铁托，赠给我的是手枪。这支手枪我一直保留到1956年，那年我被捕时被没收了。

在前方，普通士兵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及主动精神是到处可以见到的。遭受灾难的俄国在极端紧张的形势下全力以赴地争取最后胜利。在那些日子里，整个莫斯科，包括我们在内，象孩子一样为“礼炮”，即欢庆胜利的烟火而兴高采烈，因为这胜利是用多少大火和死亡，希望和痛苦换来的。对南斯拉夫战士来说，这也是他们祖国所遭受到的灾祸中的欢乐。那时，苏联似乎除了这辽阔无际的国家亿万人民的忘我紧张精神以外，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我只看到了这些，主观地在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划了等号，因为我也渴望这个制度，正为它而奋斗。

(六)

下午五点钟，我在泛斯拉夫委员会刚刚讲完话正开始解答问题时，有人轻轻在我耳边告诉我得赶紧结束报告，因为有一件重要的、紧急的事情要办。我这次作报告，不仅引起我们南斯拉夫的干部、而且引起了苏联人的重视，莫洛托夫的助手 A·洛佐夫斯基把我介绍给经过挑选的听众。南斯拉夫问题对盟国也成了越来越密切关注的问题。

我向听众道了歉，也许是别人替我道了歉，我还没有讲完我的想法，就同捷尔基奇将军一起被领进街上的一辆比较陈旧的轿车里。汽车开动后，一位不认识的公安上校告诉我们，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要接见我们。那时，我们的军事使团已住到莫斯科银松村郊区的别墅。我想起我们要送给斯大林的礼物，因此很不安，怕我们如果去取礼物的话，那么就一定会迟到了。可是什么都考虑到了的国家保安机构连这点都想到了——我们的礼物已放在汽车里上校旁边。因此，一切都已就绪，连我们的服装也都准备好了，因为十天以前我们就穿上了苏联服装厂给我们做好的新衣服。现在的任务是不要着急，慢慢听上校讲些什么，尽可能少提问题。

少提问题这点我已经习惯了，但是我无法控制我的激动心情，这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感情，这时我感到我的脸色苍白，高兴得使我心慌意乱了。

对一个来自战场，来自革命前方的共产党员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更激动人心的事情吗？

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这是对我们游击队战士以及我们人民的英雄主义及艰苦奋斗的最高的承认。对于那些经过监牢，

参加过战场厮杀，经受过精神上极痛苦的转折和进行过反对国内外共产主义敌人的斗争的人来说，斯大林的形象甚至比斗争中自己的领袖形象还要高。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脑子里，他是理想的化身，是最崇高理想的化身，所以是某种完美无缺的、永远正确的人。斯大林是今天斗争胜利和未来人类大同的化身。我知道，只是因为偶然巧合，我才成为他所接见的第一个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我是那样感到自豪和兴奋，因为我可以把会见的情况告诉自己的同志，把一些情况告诉我的南斯拉夫战士。

一瞬间，苏联的一切阴暗的东西都消失了，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一切矛盾也没有意义了或没有分量了，似乎这一切都未曾发生过。这一切使人不愉快的东西，在我此刻内心中产生的一切庄严而美好的思想面前消失了。和斗争的规模比较，我个人的命运算得了什么？在未来所实现的理想面前，我们的矛盾又算得了什么？

读者应该了解，我当时相信，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党的其它反对派确实是间谍和暗害者，所以对他们所采取的残酷无情的手段是罪有应得，正如对所有其它阶级敌人那样。如果说，我也曾发现一些从苏联回来的人在谈到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总是吱吱唔唔不敢说什么，我当时认为，这只涉及一些枝节问题或过失行为，等于是健康的机体上面为了毫不保留地挖出坏肉时而碰了一下好肉，这是季米特罗夫告诉铁托的话，铁托曾把他的话转告过我们。所以我把斯大林的残酷无情的做法，正如宣传中所讲的那样，看成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措施。在我们眼里，斯大林的形象和他的历史地位一样更加提高了。我至今还不敢断定，如果我了解到审讯和清洗的全部真相的话，我会怎样行动。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良心会经受严重的危

机，但我还是会继续当共产党员——相信有一个比实际存在的更完备的共产主义存在着。因为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来说，更重要的不是手段，而是我们为之奋斗要达到的目标。此外，在我们这个分崩离析和多灾多难的祖国，对盼望摆脱百年奴役和落后，超越现实的我和我的同胞来说，共产主义是最明智的和最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

我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我们的汽车已经到了克里姆林宫门口。在这里换了另一个军官给我们，汽车继续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冷冷清清的广场上奔驰，这里周围除了长得细细的、还没有发出嫩芽的小树外，此外就没有其它的植物和有生命的东西了。军官给我们指了一下炮王和钟王，这些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炮和没有响过的钟是大俄罗斯的谎诞的象征。我们看见左边是伊万大帝的纪念钟楼，然后是一大排古老的炮。又过一会儿，我们到了一座不高的长方形的楼前，十九世纪中叶，这样的房子是为做办公室和医院建筑的。又有一名军官在这里等候我们，他把我们带进去了。在楼梯旁我们脱下了军大衣，在镜子前面梳了梳头发，然后上了电梯，我们到了第二层，这是铺着红地毯的长长的走廊。

在每一个拐弯处都有一名军官向我们行军礼，他们都是年轻而漂亮的小伙子，头上戴着克里姆林宫内部警卫用的浅蓝色帽子，笔直地站在那里。当时以及以后的许多岁月，我都为这里无比的整洁而惊奇不已，因为整洁到了不敢相信在这里还有人生活和工作的程度——地毯上铺着的白布上^①看不到一根毛发，铜把手上没有一个污点。

① 在国外，楼房走廊、过道楼梯等处的地毯上都铺着白色的布，经常换洗，以保护地毯并给人以异常清洁之感。——译者

最后，我们被带到一个不大的办公室，朱可夫将军已在这里等候着我们。一位矮个子胖胖的中年工作人员请我们坐下，他自己却从桌旁站起身来，走进另一个房间去了。

一切进展得很快，这位工作人员马上回来了并告诉我们，可以进去。我原以为起码还要经过三间办公室，才能见到斯大林，但是门一开，我们一迈进门槛，就看见了斯大林。他从隔壁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走出来，从开着的门可以看到里边的巨大的地球仪。莫洛托夫也在这里。他身体结实，皮肤雪白，身穿藏蓝色的讲究的西服，站在长长的会议桌旁边。

斯大林站在办公室中间迎接我们，我第一个走上前去，进行了自我介绍，捷尔基奇边立正行军礼边报告了自己全部职衔，而我们的主人只说了一个字“斯大林”，这使我们感到很滑稽。

我们又同莫洛托夫握了手，然后坐下，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右边是莫洛托夫，左边是我、捷尔基奇和朱可夫。

这间办公室是一个不大的长长的房间，没有任何豪华奢侈的陈设。在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上方挂着列宁的像片，在会议桌上方的墙上挂着苏沃罗夫和库图佐夫像，都镶在同样木制刻花纹的框子里，这些像都和各省的彩色照片差不多。

表现最随便的是主人。他穿着元帅服，软底靴，没有佩带什么勋章，只有一枚金星，即苏联英雄勋章挂在左侧胸前。在他的举止中看不到任何做作和大人物的架子。这不是画像和纪录影片中的威严的斯大林——不是那个行动缓慢，举止从容的人。相反，他一分钟也不能安静，一会儿摆弄他那个英国邓希尔公司生产的带白点标记的烟斗，一会儿用蓝铅笔把谈话的主要题目记到纸上，马上又把记下的东西用斜线划掉（在讨论某一题目快结束时），他的头一会儿转到左边一会转向右边，坐着也一

刻都不能安静，总是动来动去。

还有一点我很觉得奇怪：他个子很小，身材也不好看——身躯短并不魁伟，四肢太长，左手和右肩显得不太灵活。他的肚子不小，头发稀少，从前额到头顶并没有秃的地方。他的脸色很白、面颊红润，后来我知道，这是长期坐办公室的人的特征，在苏联上层社会中称之为“克里姆林宫的脸色”。他的牙齿发黑，也不整齐，有些往里歪。就连两撇胡子也不浓密，不给人以威严之感。但不管怎样他的面孔并不令人讨厌，而是有一种民间的、农民的、一家之主的表情，那不断转动的黄眼睛里有着某种严厉和狡猾的混合体的东西存在着。

他的口音也使我惊奇，可以感觉出来，他不是俄罗斯人。但是他的俄语词汇很丰富，他对俄罗斯谚语和典故运用自如，语言生动而流利。后来我才了解，斯大林对俄罗斯文学非常熟悉，仅此而已，其它的知识就仅限于政治史了。

只有一点对我来说并不是突然的，即斯大林的幽默感，那种颇为粗鲁而充满自信，含蓄而深刻的幽默感。他对别人的谈话的反应迅速而果断，丝毫也不犹豫，虽然他能把话听完，但是显然不愿意听长篇大论。他对莫洛托夫的态度很说明问题，很明显，斯大林把他当作自己身旁最亲信的同事，但以后我才弄明白：在政治局委员中莫洛托夫是斯大林唯一以“你”相称的人^①，这表示对他的重大的信任，虽然俄国人对相当亲近的人也往往有以“您”相称的。

谈话是以斯大林问我们对苏联的观感开始的。我说：“我们深受鼓舞。”

他说：“我们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可令人鼓舞的，虽然为了

^① 俄国人对亲人、好友、亲密的同志称“你”，对一般关系的人称“您”。

使俄国好起来我们尽了一切的努力!”

我记得很清楚，斯大林说的是俄国这个词，而不是苏联。这就是说，他不仅提倡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欣赏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而且把自己和它等同起来。

当时，我们来不及考虑这些问题，因为斯大林很快把话题转到同流亡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关系方面，他对莫洛托夫说：

“有没有可能使英国人上圈套承认铁托，承认这位唯一实际上真正在反对德国人的力量。”

莫洛托夫笑了，可以感觉其中的嘲讽和自负：“这点完全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南斯拉夫国内的情况太熟悉了。”

我在苏联机关里，特别是在苏联宣传中从来没有看到这种直截了当和开诚布公的态度，因此非常高兴。我立即感到我喜欢和能适应这种气氛，特别是因为和我谈话的这位伟人，和我一样，对待现实问题也持有毫不加掩饰的态度。当然，不必解释，斯大林只是在自己的人之间，即在忠于他和支持他共产党路线的人之间才持这种态度的。

斯大林虽然没有许诺承认民族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但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加强这个政府是很关心的。提出讨论的问题和斯大林的观点是如此明显，使我完全不必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显然，如果时机适宜，即如果苏联和英国之间，确切些说民族委员会和王国政府之间能够寻找出临时妥协的办法的话，苏联政府会立即承认民族委员会。

但是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必须寻找另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

然而，关于援助南斯拉夫军队问题倒是完全得到解决了。

当我提到要借贷二十万美元时，他说，这数字太微不足道

了，不会对我们有太大的帮助，而且马上可以把这笔款子交给我们。当我提到，将来在解放以后我们一定归还这笔用以供给我们的武器和其它装备的贷款时，他确实生气了：

“您在侮辱我，你们在流血，而我为提供给你们们的武器还要向你们要钱吗！？我不是商人，我们都不是商人，你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一样，我们有责任和你们分享我们所有的东西。”

可是援助如何具体进行呢？

最后决定，向西方的同盟国请求在意大利建立苏联空军基地，从那里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

斯大林说：“试试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同盟国的立场和他们愿意在多大的程度上援助铁托。”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如果我记得确切的话，这个基地（共拥有十架运输机）很快建立起来了。

斯大林还继续谈这个问题，他说：“飞机帮不上大忙，因为一个军队不可能靠飞机提供供应，而你们已经是一个军队了。需要的是轮船，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船，因为黑海舰队被消灭了。”

朱可夫将军插话说：“在远东我们还有军舰，是否可以把它调到黑海，用这些军舰运送武器和其它装备。”

斯大林粗暴地、不容争辩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时，那看上去善于克制，谈笑风生的斯大林变成另一个斯大林了。他说：

“您的脑袋里哪来的这些糊涂思想？您怎么啦，难道不是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吗？远东也在打仗，一定会有人不让我们到达远东，或者干脆击沉这些船队。出的真是馊主意！应该去买船。向谁买呢？现在船都不够用。土耳其吗？他们的船不多，也不会卖给我们。埃及？对，可以向埃及买船。埃及会卖给我们，什么都可以卖给我们，包括船都会卖的。”

是的，我们所看到的是真正的，不能忍受异议的斯大林。我在南共党内也已习惯于不许争辩的作风，每逢我自己对某一问题决心已下，要作出最后决定时，也倾向于这样的作风。

朱可夫元帅默默地、迅速地记录了斯大林的一切命令。

但是，形势的发展已经没有必要用购买船只的办法去援助南斯拉夫。主要原因是东方战线的战斗进行得很快，红军不久就到了南斯拉夫边界，完全可以从陆地上帮助南斯拉夫了。我认为，那时斯大林确实想援助我们。

这就是我们谈话的实质。

同时，斯大林也想了解我对一些南斯拉夫政治家的看法。他问我，对米兰·加甫里洛维奇的看法怎样，他是塞尔维亚的农民领袖，驻莫斯科的第一任大使。我说：这是一个滑头的人。

斯大林自言自语地评论说：“是的，有的政治家认为，政治上的狡猾是最主要的。加甫里洛维奇给我的印象还不是愚蠢的人。”

我补充说：“不能说他愚蠢，但是他是没有远见的政治家。”

斯大林问我，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娶了什么人。当我说是希腊公主时，他开玩笑说：

“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你看，如果我或者你也要某个外国公主的话，那么，也许会带来点什么好处吧？”

莫洛托夫也笑了，但他言行克制，没有笑出声来。

最后，我把礼品献给了斯大林，这些礼品此时显得多么简陋而贫乏。但他没有表示出任何鄙视的意思。他看到草鞋时说：“草鞋？”他把枪机搬开又扣上，在手上掂了掂，又说：“我们的枪轻一些。”

会见进行了一个小时候左右。

我们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已是傍晚时分，陪同我们的军官也似乎被我们兴奋的心情所感染，他很高兴地看着我们，在任何细小的问题上都设法满足我们的要求。

在这个季节里，北极光出现时莫斯科也可以看到，所以周围的一切呈紫红色，时隐时现，显得那么迷人，整个世界似乎是非常现实的，比我们一直生活着的现实世界更加美丽。

我的心情也是如此美好。

(七)

那时，我同斯大林还有一次更主要和有趣的会见。

我记得那天，正是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的夜晚。

这次也没有任何人预先通知我晚上有什么事，仅仅告诉我，晚上九点钟必须到克里姆林宫去。晚上来了一辆车，就把我带走了。连我们使团的人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

我被带到原来斯大林接见我们的那栋楼里，但换了一个房间。我们到那里时莫洛托夫正在穿大衣和戴帽子，他说，我们到斯大林那里去赴晚宴。

莫洛托夫不爱讲话。即便是和斯大林在一起，当他的心情较好和周围都是自己的亲信，而且当气氛轻松和较随便时也是如此。莫洛托夫连在和人谈话时也是滴水不漏的。然而在汽车里他却问了我，除了俄文还掌握哪国语言。我说：法语。我们又谈起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力量和组织性问题。我强调，南斯拉夫共产党开始打仗时还处在地下，所以军队数量相对而言不多，约一万人，但是组织性很强。

我又补充说：“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布尔什维克党。”

莫洛托夫反驳我说：“您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我们

的党非常软弱，是一个组织上没有紧密联系、分散而人数很少的党。”他继续说：“我记得我在战争初期受党的委托从彼得格勒秘密来莫斯科时，我简直找不到地方过夜，不得已只得冒险，在列宁的妹妹家里躲了一夜。”

莫洛托夫告诉我列宁的这个妹妹名字叫玛利亚·伊里尼奇娜。

汽车驰速每小时八十公里，不停地开着。看来，交通民警知道这辆车的什么特征，一路都给它开了绿灯。驶出莫斯科市区后，我们在柏油公路上行驶。后来我知道它就是政府大道，战后很长时间，也许现在还是这样，只有政府的车辆才能走这条路。不久，我们到了一个哨口。坐在司机旁边的军官从通风玻璃后面翻出来一个什么小牌子，警卫就放我们进去了。右边的小窗是开着的，莫洛托夫发现了我被过堂风吹着，就把玻璃摇上来，我这时才发现玻璃很厚，于是我才知道我们坐的是防弹小汽车。我想，这是一辆派克牌汽车，1945年铁托从苏联政府那里得到一辆和这辆一模一样的汽车。

晚宴前十天，德国人对驻在德瓦尔的最高统帅部发动了一次空军陆战队的袭击。铁托和外国的军事使团不得不退到山里。南斯拉夫领导不得不进行长途的艰难的行军，为此花费了许多为进行政治等活动所需要的宝贵时间。食品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了。苏联的军事使团把这一切都详细报到莫斯科了，我们在莫斯科的军事使团也同有关的苏联军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当他们进行组织援助南斯拉夫军队和最高统帅部时帮助他们出主意。苏联飞机组织夜航到南斯拉夫空投武器和食品。诚然，成效不大，因为空投的物资都落在广大的森林地区，而没有多久我们的军队又不得不放弃我们驻扎的这片森林地带。

在路上，莫洛托夫问我，对这一形势有什么看法。他对此虽然感兴趣，但并不激动，是为了得到更确切的情况而问我的。

我们又走了四十公里，拐到左边的公路上，就驶入小云杉林。又是一个哨口，走不远就到了大门口，我们面前是一片云杉林中的一座别墅。

我们刚从过厅走进一个小厅，斯大林出来了，他这回身穿一件扣子扣到领子的普普通通的上衣——就是那件从战前的照片上大家都熟悉的上衣。他的这一装束使他的个子显得更加矮小，而且也更觉得平易近人，简直是象在家里一样。他把我们带进一间不大的办公室，说也奇怪，这办公室好象是空的，没有书，没有画，木板墙上光光的，什么也没有。我们坐在一张不大的写字台旁边，他马上问起有关南斯拉夫最高参谋部的事情。

从他的提问中，他同莫洛托夫之间的差别也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

从莫洛托夫口里，是不可能了解他的思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他的性格内向、令人捉摸不透。而斯大林的性格活跃、几乎到了无法安静的程度。他提问题时——他是在问自己，也在问别人；辩论时，也是和自己也和别人辩论。我不是说，莫洛托夫没有热情，也不是说斯大林不能克制和假装出各种样子，后来我也看到过他们两人也有不同于上述的表现。我只想说，莫洛托夫的表情从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不管谈论涉及什么事情和什么人；而斯大林，当他在自己党的小圈子里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丘吉尔曾形容莫洛托夫是完全现代化的机器人。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他的外表和他的特征之一而已。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相比，也是那么冷静、谨慎，遇事从各方面进行

周密的计算得失，然而，斯大林的天性是热情的，易于冲动的，同时他又具有各种不同的面孔。而且他进入每个角色时，都表现得如此真实，以至于在人们看来，他从来不会假装，每次都是非常真诚。正因为这点，他比莫洛托夫具有更深的洞察力，预计事物可能发生的各种可能性，更有远见和更加灵活。因此人们对他们两人的印象是：莫洛托夫对一切问题，包括共产主义及其最终目标，都看成是相对的东西，他之所以服从这些东西并非出于自己主观愿望，而是因为客观的必要。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什么永恒的事物。他把自己和自己的一生都交给这种变幻莫测的不完美的现实，而这个现实的世界每天都把某些新的因素强加于他。对斯大林来说，他也认为一切都在变化着，一切都是流逝着，但这只是他的哲学观点。因为在变化着的事物的背后，及其内部，在某种现实的背后及其内部，都隐藏着某些绝对的伟大理想，是他自己的理想，而他认为只有由他去改变和破坏这一现实本身及消灭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时候，他才能接近这一理想。

回顾过去，我觉得，具有相对论观点和善于处理日常事物的莫洛托夫，同具有狂热的教条主义，更深远的洞察力和本能地感知未来即明天事物的可能性的斯大林，是互为补充的。此外，如果没有斯大林的领导，莫洛托夫便是能量有限的人；但是对斯大林来说，他也是必不可少的。两个人虽然都不择手段，但是在我看来，斯大林还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想办法适应客观形势。对莫洛托夫来说，选择手段本来就无所谓和不重要的事情。我想，他不仅纵恿斯大林办很多事，而且支持他和想办法消除他的动摇。在实现把落后的俄国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帝国这一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斯大林（这要感谢他的全面才干和洞察力），但是对作为实干家的莫洛托夫也不能低估他的作

用。

莫洛托夫从其性格和生理条件来看,似乎命运注定地要起这样的作用,他身体结实,性格稳重、沉着、思想集中,能吃苦耐劳。他酒也能比斯大林喝得多,但是当他举杯祝酒时,言词简短而且会产生直接的政治效果。他的私生活很一般,所以当一年后我认识了他的谦逊而清秀雅致的妻子时,我有这样的印象,我觉得任何另外一个能完成他所需要完成的某些职责的妇女都能代替他。

同斯大林的谈话是从他激动地问起有关最高参谋部及其所属部队的命运开始的。他不安地说:“他们会饿死!”

我向他说明,这是不可能的。

他仍然说:“怎么不可能?多少次饥饿消灭过许多战士!饥饿是任何军队的可怕的敌人。”

我向他解释说:“那个地方总可以找到一些食物的。我们曾面临过更艰难的处境,也没有被饥饿压倒。”

我把他说服了,使他放心了。

接着他又谈起有关援助我们的可能性问题。苏联的前线还是太远,不可能派战斗机护送运输机。有一阵子斯大林发了脾气并骂飞行员说:“他们是胆小鬼,白天不敢飞行!胆小鬼,简直就是胆小鬼!”

莫洛托夫对此问题很了解,他袒护飞行员,说:“不对,他们完全不是胆小鬼。战斗机没有那么远的航程,因此运输机还到不了目的地就会被击落。运输机的实际载重量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们还要为回程不得不带上足够的汽油。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们只有夜里才能飞行,而且所带的物品也很少。”

我支持了莫洛托夫,因为我知道,苏联飞行员为了帮助南斯拉夫的战友曾自愿建议白天飞行,在没有战斗机保护下飞

行。

同时，我同意斯大林所说的，在现在迅速发展的复杂形势下，铁托应该有更为固定的驻在地，而且这个地方应该是不至于时时都会受到敌人的袭击。当然，斯大林这时也考虑到苏联军事使团的意见。此时铁托由于他们的坚持，同意搬到意大利，从那里再撤到南斯拉夫的维斯岛。铁托在维斯岛一直坚持到红军进入南斯拉夫。诚然，这次谈话斯大林并没有想到这次撤退的具体计划，但是他脑子里已在考虑此问题了。

同盟军已经同意为援助南斯拉夫战友在意大利领土上建立苏联的空军基地。斯大林一再强调加快调拨运输机和建好基地本身的迫切性。

对这次德军的袭击我对铁托所抱的乐观态度，使斯大林的情绪好起来，所以他把话题又转到我们和同盟军的关系，首先是同英国的关系问题上了。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见的主要目的。

他的想法的实质是：首先不要使英国人感到“害怕”，他指的是，我们应该避免一切使他们感到南斯拉夫现在正在进行革命，共产党即将上台的事情。

斯大林生气地说：“你们的帽子上为什么非要戴上一个红五星？形式是次要的，主要的是结果，可是你们却突出什么红五星！说实在的，红五星现在并不必要！”

但是，他也不掩饰，他的不满并不十分强烈，只是埋怨而已。

我向他解释说：“摘掉红五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已成了传统，在我们战士的眼里它代表着一定的含义。”

斯大林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并不坚持，他又把话题转到和同盟军的关系问题上，他说：“也许你们以为，既然我们和英国

是同盟国，所以忘记了他们是什么人，丘吉尔是什么人？对他们来说，最高兴的事是如何想方设法危害自己的同盟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总是想办法给俄国人和法国人使坏。丘吉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丘吉尔是这样的人，如果你一不小心，他连最后一个铜板也从你的衣兜里偷走。是的，是会把你的衣兜里的最后一个铜板偷走的！实实在在地，连最后一个铜板也不留下！罗斯福呢？罗斯福不一样，他把手伸进衣袋去的目的是要掏出一大把钱。和丘吉尔不一样，丘吉尔连小铜板也要。”

他几次提醒我们，一定要提防英国的情报机关和他们对铁托人身安全所搞的阴谋诡计。他说：“他们已经杀害了西科尔斯基^①将军，铁托对他们就更不必说了，为了铁托牺牲自己的两、三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他们并不珍惜自己人的生命！他们搞掉西科尔斯基的事不是我编造的，是贝奇什告诉我的——他们让西科尔斯基上了飞机，然后把飞机击落，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和证人。”

斯大林多次重复了他的这一提醒，回去后我把他的嘱咐转告了铁托。当铁托于1944年9月21日夜里从维斯岛上秘密地转移到在罗马尼亚的苏联占领地区时，这一提醒显然起了一定的作用。

接着斯大林又谈起我们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关系问题。王国政府的新代表是伊万·舒巴什奇博士，他保证要搞好同铁托的关系，承认人民解放军是同占领军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斯大林坚持说：“不要拒绝同舒巴什奇的谈判，无论如何也不要拒

^① 弗拉基斯拉夫·西科尔斯基(1881——1943)是波兰军事将领及政治活动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波兰流亡政府总理及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1941年由他签署了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的议定书。1943年因飞机失事牺牲。——译者

绝。不要马上向他发动进攻，先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同他谈谈。你们不可能立即得到承认，应该找到过渡的办法。同舒巴斯奇要谈判，也许有办法同他达成某种协议。”

他坚持这样做时虽不是斩钉截铁，但是相当坚决。我把他谈的一切话都汇报给铁托和中央委员。我认为，这对著名的铁托——舒巴什维奇协议起了一些作用。

斯大林请我们用晚餐。在大厅里我们在一张世界地图前面站住了，在这张地图上苏联的领土是用红色绘制的，所以显得比平常大一些。斯大林指着苏联地图继续就他刚讲过的英国和美国的 attitude 问题说：“他们永远不会甘心让这么大的领土永远是红色的，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我注意到了这个地图上的斯大林格勒地区，它从西面用蓝铅笔圈起来，这显然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夕或期间划上去的。他注意到我的目光，我觉得他是很满意的，但并没有流露出自己的感情。

不记得借着什么话题，我说：“如果没有工业化，苏联是不可能坚持和进行这样的战争的。”

斯大林补充说：“我们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争吵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只是在这张地图前面，他唯一一次提到他的这些对手，而且用的词是：“争吵！”

餐厅里有两、三名苏联上层人物在那里站着等候我们，但政治局委员除了莫洛托夫没有第二个人。我忘记了那几个人的名字，他们一整夜什么也没说，一直沉默着。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非常形象地描写，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为他设的晚宴。其实，在斯大林家中的晚餐都是那个样子。

在一间没有什么豪华布置、但很舒适、高雅的大餐厅里，在一张长桌子的前半段上面摆着各种菜肴，这些菜肴都用沉甸甸的银制钵子盛着，上面盖着加过温的盖子，另外还有各种饮料，旁边摆着空碟子和其它餐具。每一个人都自我服务，坐到空着的那一半段桌旁。斯大林从来不坐在主人座位上，他总是坐在一个固定椅子上，即主人座位左侧第一个位子。

食物和酒的种类繁多，多半是荤菜肉食和烈酒。但其它一切都很简单，并不奢侈。如果斯大林不按铃，服务人员不许进来，只有一次需要叫他们进来，是因为我想喝啤酒的缘故。进餐厅的只能是值班军官。每人吃什么，吃多少，都随自己便，只是喝酒是强制的，不管是举杯祝酒或者并没有什么理由都要喝酒。

这样的晚餐通常要进行六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从晚上十点钟开始，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四、五点钟。大家不慌不忙地吃喝，随便说话、谈论，从开玩笑到极为严肃的政治甚至哲学问题。

在晚餐过程中的这样非正式的气氛中，苏联的相当一部分政策被正式地通过。也正是这种晚餐形式成为斯大林单调而阴郁生活中的最经常的和最适当的娱乐方式，是他唯一的乐趣。

斯大林的同事也习惯于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夜间他们都在斯大林或某一个领导人家里度过，第二天午餐前他们都不到办公室里来，但是一来就待到深夜。这使上层行政机构的工作遇到一些困难，但他们也适应了。外交使团也适应了，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和某一政治局委员保持联系。

对政治局委员和其它高级领导人是否出席这种晚餐，没有什么专门规定。通常是那些有工作要同某人商量或与当前工作有关的人被邀请出席晚餐，但范围总是很狭窄，所以出席者把

能出席斯大林的晚餐看成一种特殊的荣誉。只有莫洛托夫是常客，我想这不仅因为他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改为外交部长），而且因为他实际上是斯大林的副手。

晚餐过程中，苏联领袖们都很亲近，个人关系最好。每个人谈自己所负责部门的最新消息，当天会见了什么人，谈了什么话以及自己对未来的设想。丰富的食物，大量的（但不是过量）白酒使气氛比较活跃、亲密而毫不拘束。没有经验的人甚至似乎不会看出斯大林同其它人的差别。然而，这种差别是存在的：大家都注意地听他说的话，没有人敢固执地反驳他，从外表上看他们的关系很象是一个以严厉的家长为首的宗法制的家族，大家都怕他。

斯大林吃东西的量，甚至对比他身体强健的人来说也显得太多了，他更喜欢肉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山村出身的人。他也喜欢吃一些特殊风味的菜肴，这个具有各种气候条件的国家，特殊风味的美味是数不胜数的。但是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固定的菜是他特别喜欢的。他喝酒不多，常常只喝少量的红葡萄酒和一杯伏特加酒混在一起喝。我没有一次发现他有过醉意的时候，同莫洛托夫不一样，更不用说贝利亚（他简直是一个大酒鬼）。在这类晚餐中经常吃得过饱的苏联领袖们白天吃东西很少，他们没有正常的进食的时间，许多人为了“减轻饮食过量的负担”，每星期总有一天只吃水果和果汁。

在这种晚餐过程中，整个大俄罗斯领土、新占领的国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被改变着。然而，没有任何人会支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的伟大的创作，可以设想，有多少优秀的作品在这里永远地被埋葬了。

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听到关于党内反对派和镇压他们的话题。显然，这完全是斯大林自己和秘密警察的职责范围的事

情。由于苏联领袖们也都是人，所以他们的良心也往往使他们故意忘记这些问题，何况因为回忆这些事对他们自己的命运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很愿意对这样的事保持沉默，只字不提。

上面我写的只是在这次会见时、在自由的气氛里，很自然地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的探讨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回想起南斯拉夫人同俄国的以前的关系时，我说：“俄国沙皇不了解南斯拉夫人的意愿，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式的进攻，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解放。”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兴趣同其它苏联领导人不同。他不问我们有多少牺牲和破坏，只是对我们国内所形成的内部关系和起义运动的实际可能性感兴趣。就是这些情况，他也不是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而只是在谈话过程中进行了解的。

有一阵子，他对阿尔巴尼亚发生了兴趣，他问：“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我回答：“在阿尔巴尼亚发生的事情和南斯拉夫相类似。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的最古老的民族，比斯拉夫人甚至比古希腊人还要古老。”

斯大林问：“他们居民点的名称怎么是斯拉夫族的呢？也许，他们和斯拉夫人还是有一些关系吧？”

我还是解释：“斯拉夫人过去住在山谷里，土耳其人侵占时期，阿尔巴尼亚把斯拉夫人从那里挤出去了。”

斯大林顽皮地挤了一下眼睛说：“我还指望，阿尔巴尼亚人多少还是同斯拉夫人有点联系呢！”

我在讲到南斯拉夫的斗争方式和战争的残酷时，对斯大林说：“我们不收容德国人的俘虏，因为他们也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打死了。”斯大林微笑着打断了我的话：“我们的一个战士有一次押送一批德国人，在路上他把所有的人都打死了，只留下一个

人。到了目的地后，当人们问他，其它的人呢，他说：‘我完成了最高统帅的命令：消灭一切敌人，直至最后一人，所以给你们带回来这最后一个人。’”

谈话时，当他谈论德国人时说：“他们这个民族很怪，很象个羊群。记得，童年时看到，带头羊到那里，羊群就跟着它。记得，革命前我在德国时，一批民主社会党人在开代表大会时迟到了，原因是等着检查他们的票，或类似这种事情。难道俄国人能够这样办事吗？有人说得很好：在德国不可能实现革命，因为这会踩坏他们城市里的草地。”

他还问我一些物品用塞尔维亚语该怎么说。自然，很快就发现了俄语和塞尔维亚语有极大相似之处。

斯大林感叹地道：“说实在的，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呵！”

大家也讲了一些笑话，斯大林很喜欢我讲的一个笑话。我说：在一次少有的休战期间，土耳其人和门的内哥罗人在一起交谈。土耳其人问，为什么门的内哥罗人总是喜欢挑起战争。门的内哥罗人说：“为了抢劫。我们很穷，所以总是四处寻找，什么地方可以得到东西。你们呢？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土耳其人说：“为了尊严和荣誉。”门的内哥罗人说：“对了，每个人为了得到自己所缺少的东西而打仗。”

斯大林大笑起来并评价说：“实在是这样，这意思太深刻了——每个人为了得到自己所缺少的东西而打仗！”

莫洛托夫也笑了，但这是很有节制的微微一笑。确实如此，他是没有能力说出点幽默话和享受幽默的人。

斯大林还问，我在莫斯科见到了哪些领导人。我说，季米特罗夫和曼努伊里斯基。

他说：“季米特罗夫和曼努伊里斯基聪明得多。”

提到季米特罗夫，他谈起了解散共产国际之事，他说：“他们西方人^①太卑鄙，根本没有和我们讲过一句要解散国际的事。我们是很固执的人。如果他们那怕提到或和我们谈过有解散共产国际的想法的话，那么我们至今也不会解散它。当时共产国际的情况越来越不正常。我同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②当时绞尽脑汁想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共产国际总是推行自己的那一套，结果冲突越来越多。同季米特罗夫合作还比较容易一些，同其它人合作就很困难。然而最重要的是——对各国的共产党来说必须找出自己的民族特点并在本国范围内坚持斗争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共同的共产主义中心，那实在是很不正常、很不自然的现象了。”

晚餐期间来了两份电报，斯大林都让我看了。

第一份电报里写的是舒巴什奇在美国国务院的讲话。舒巴什奇的观点是：我们南斯拉夫人不能反对苏联，也不能推行反俄罗斯的政策，因为我们国家一向有着强烈的斯拉夫民族的和亲俄的传统。斯大林对这个观点的反应是：“这是舒巴什奇在吓唬美国人！可是他为什么要吓唬他们呢？对，是在吓唬他们，可是为什么？为什么？”

接着当他发现我表示奇怪时，他说：“他们在偷我们的电报，我们也偷他们的。”

第二份电报是丘吉尔拍来的。他通知，明天开始在法国登陆。斯大林拿着这份电报嘲笑地说：“对，如果没有下雾的话，会登陆。至今为止，总是能找出什么借口不登陆，我怀疑明天是否也会发生什么不登陆的理由。他们也许明天会碰上德国人呢。如果他们碰上了德国人，会怎么办呢？登陆也许又办不成

① 指西方的共产党。——译者

② 即莫洛托夫的名和父名。——译者

了，又是象以往一样，总是许愿，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

莫洛托夫和往常一样，结结巴巴地说：“不会的，这次会是真的。”

这次并没有给我这样一个印象——即斯大林是真的怀疑同盟军的登陆之事，他只是想拿他们开开心，嘲笑他们一番，特别是耻笑他们前几次拖延登陆的理由。

综合一下这一晚餐对我的印象，我想，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斯大林有意识地吓唬南斯拉夫领导人，使他们减少同西方的来往；而同时他力图使南斯拉夫的政策服从自己的需要，使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变成自己对西方政策的附属物，特别是在同英国的关系方面。

斯大林依据自己的思想和实践以及自己的历史经验，认为最可靠的只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铁拳里的东西；他认为，不在他警察控制内的一切人都是潜在的敌人。战争的进程使南斯拉夫革命摆脱了他的控制，在革命中产生的政权对自己有能力掌握它，满怀信心，因此斯大林不能直接指挥他们。他了解了这一点，所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利用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对待西方国家关系方面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企图把这些领导人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使他们的政策服从于自己政策的需要。

苏联领袖们的生活的天地，这也是我所生活的天地，在我面前逐渐开始呈现出它的另一个面貌：即在一方面都存在着骇人听闻的无休止的斗争。一切都集中到“报复”二字上，只是从形式上有各种不同表现而已，最后能活下来的只是能量更大和更狡猾的人。我这个对苏联领袖满怀钦佩之心的人，现在在他们一刻也不放松的警惕和毅力面前，感到头昏眼花、目瞪

口呆了。

这是这样一个世界，在他面前除了胜利和死亡，没有其它任何选择。

这就是斯大林——新社会制度的缔造者的形象。

我告别斯大林时，又一次问他，对南斯拉夫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

他答道：“没有，你们自己最了解该做些什么。”

我回到维斯岛时连斯大林说的这点也向铁托和其它中央委员作了汇报。对自己莫斯科之行，我总结为：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行动，首先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

在我们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嘱咐我把最高苏维埃赠给铁托的礼物——一把宝剑转交给他。在回南斯拉夫路经开罗时，我又在这珍贵的礼物之外，补了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礼物——一副象牙国际象棋。

我不以为这是一种象征，但今天我想，就是在那时，在我的心灵深处已经酝酿着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有别于斯大林的世界的。

座落在云杉林中的斯大林别墅的上空已经炊烟缭绕，早霞满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经过又一个不眠之夜显得很疲倦，他们在门口和我握手告别。汽车把我带进黎明前还在梦乡中的莫斯科，那披着晨露的、六月的天空一片蔚蓝的莫斯科。一种我刚踏进俄罗斯土地时的那种感情又涌上我的心头：如果从这个国度看我们的世界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也并不怎么大。也许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的思想也并非高不可攀，不能被人理解，他的思想以及他本人，苏联社会的真理最终将展现在人类的面前，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这是在战争期间我的美好的理想。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什么是更现实的事物，就是今天，我也不能告诉人们，什么事物对人类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人们都生活在理想和现实之中。

疑 虑

(一)

如果我不曾因为自己的直爽性格而成为牺牲品的话，我也许不会第二次去莫斯科，并在那里再一次见到斯大林。

事情发生在1944年秋天，红军突破战线进入南斯拉夫和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以后，那时发生了个别和成批的红军战士危害南斯拉夫公民和军人的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些严重的事件为数之多，使南斯拉夫新政府和共产党不能不视其为政治问题。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红军看成是模范的、理想化的军队，南斯拉夫军队自己队伍内部对待任何甚至是微小的抢劫和强奸行为是毫不留情的。理所当然，我们对所发生的这些事件，比普通公民更惊得目瞪口呆，这是因我们的公民根据他们老一辈的经验，认为任何一个军队都有抢劫和强奸行为，因此，他们思想上有所准备。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共产党的敌人，乘机利用红军战士的违法乱纪行为攻击尚未巩固的南斯拉夫新政权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因而使我们的斗争更加复杂化了。不仅如此，红军的最高司令部对人民提出的意见和抗议都充耳不闻，使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们对强奸行为和强奸犯是采取纵容姑息的态度，有意袖手旁观的。

当铁托从罗马尼亚回到贝尔格莱德后，他马上就到莫斯科

去了，他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因为解决红军的纪律问题亦属急不可待的问题之一。

有一次铁托召开了一个会，卡德尔、兰科维奇和我都参加了，我们决定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也夫将军谈这个问题。为了使科尔涅也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商妥：参加会见的除了铁托外，还有我们三个人，此外还加上两位南斯拉夫杰出的指挥员——佩科·达普切维奇^①将军和科查·波波维奇^②将军。

铁托用非常缓和的、很有礼貌的形式向科尔涅也夫说明了事情的真相，所以当科尔涅也夫用粗暴和侮辱的方式表示拒绝时，我们感到非常突然。我们把科尔涅也夫是作为同志和共产党人请来的，可是他却大喊大叫地说：

“我代表苏联政府抗议对红军的这种造谣中伤，她……”

我们对他的解释和劝说都是徒劳无益的，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强大势力和军队的暴跳如雷的代表，而这个军队是“解放者”。

在谈话过程中我说：“我们的困难还在于我们的敌人利用这

① 佩科·达普切维奇(1913—)南斯拉夫的军事将领。1933年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求学时入党，他的军事生涯是从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开始的，当时他任纵队连长。1941年南斯拉夫遭德军入侵，他在自己的家乡门的内哥罗领导游击队起义，随后很快被提升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工作，1945年获得“人民英雄”勋章。次年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军长，该军驻于的里雅斯特港、南斯拉夫管内，后被派往指挥希腊北部游击队作战。1953年起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因杰拉斯事件受牵连，被降职。——译者

② 科查·波波维奇(1908—)出身于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名门望族，留学巴黎，是一位律师、诗人。1933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并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回国后被捕，后被释放，仍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加入游击队并逐步担任军政部门的领导工作。1945至1953年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来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译者

点攻击我们，他们把红军和英国军队加以比较，认为英国军队没有那类违法乱纪的行为。”

科尔涅也夫正是对这句话反映特别强烈，他简直是什么也不愿意听了，他说：“你们把红军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进行这样的相比，对这种侮辱性的作法，我表示最坚决的抗议。”

南斯拉夫政府是在红军进入南斯拉夫的领土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了解到红军战士不法行为的情况的。根据公民们的反映，共发生了一百二十一起强奸行为，其中有一百一十一一起是强奸后还杀了人；此外，还有一千二百零四起抢劫并伤害人事件发生。如果考虑到红军只是进入南斯拉夫东北部小小地区的话，那么这些数字就并不算小。因此，南斯拉夫政府必须把这些事件看成是政治问题，从性质上看，它之所以严重还在于这一问题变成了我们党内斗争的题目。共产党人对这些行为还应该从道德方面提出问题：难道这就是我们朝思暮想的堪称模范的红军吗？

同科尔涅也夫的会见是不欢而散的，不过我们发现，此后苏联司令部对待红军战士的不法行为约束严厉一些了。至于我，在科尔涅也夫走后，我们的同志对我刚才说的那句话都表示不满，不过有的人态度缓和一些，有的激烈一些。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有想把苏联军队同英国军队加以比较，在贝尔格莱德只有英国的军事使团。我只是说明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从政治角度作出反映，没有想到由于科尔涅也夫将军的不理解和固执态度把这一问题复杂化了。何况，我完全没有想到去侮辱红军，我当时对红军的热爱并不亚于科尔涅也夫将军自己。当然，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不能对强奸我国的妇女（而且我从来把这些行为看成是最卑鄙的罪行之一），侮辱我们的战士和抢劫我们的财产无动于衷，保持沉默。

我的这些话，加上其它一些因素，成为南苏领导之间第一次冲突的起因。尽管后来发生了更有分量的事件，但是苏联领导人和代表总是不断地提到我说过的一句话。随便提一下，无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政府没有给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它一些领导人颁发苏沃罗夫勋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也没有给佩科·达普切维奇发勋章，所以我和兰科维奇建议铁托授予达普切维奇以人民英雄称号。毫无疑问，正是我的这些话，成为苏联代表于1945年年初在南斯拉夫散布我是“托派”的谣言的原因之一。以后，他们自动停止传播这一谣言，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罪名毫无根据，另一方面由于南苏之间关系有所改善。

我说出那番话后不久，我感到自己非常孤立，这不仅是因为和我最亲密的人对我的批评非常尖锐和严厉，也不仅因为苏联领导把事实过分夸大，使之显得更加尖锐化，而且在同样程度上也出于我本人的内心的痛苦。

事情在于，我当时正处于内在的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这是每一个真诚和全心全意地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当他遇到他信仰的共产主义思想同上层领导之实践背道而驰的时候，迟早会必然发生的苦闷。在我内心这一状态的发生，并不完全是因为我对红军的理想化的思想和红军的行为之间所看到的矛盾。我明白，红军虽然是“无阶级”社会的军队，但“毕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其中必然还会有“旧的残余”。我的内心矛盾是由于苏联领导和苏联司令部，对强奸行为所采取的充耳不闻或甚至于纵容、赞许态度而产生的，特别是由于他们不愿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更不用说想处理对我们的意见所表现出的愤慨了。我们的动机是诚恳的，我们是想保护红军和苏联的威信。苏联和红军在南斯拉夫人民中的威信，是我们党的宣传

工作多年以来全力以赴地进行的努力所取得的，可是，我们良好动机遇到了什么样的回答呢？回答的是：粗暴和拒不承认，这是大国对小国，强者对弱者的典型态度。

苏联代表企图利用我善良的意见作为自己对南斯拉夫领导耍威风，不断挑衅行为的根据，这使问题更加尖锐和复杂化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苏联代表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夸大和歪曲我的话？苏联代表为什么要利用如此歪曲的形式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说什么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感谢红军，而红军在解放首都的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帮助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巩固自己在首都阵地等等，这又是为什么？

对此，并没有（在这个基础上也不可能有）答案。

我和其它同志一样，对苏联代表的另一个做法也产生怀疑。例如，苏联领导宣布，为了帮助贝尔格莱德，他们要赠送相当数量的小麦。但是，事实表明，这批麦子实际上是来自南斯拉夫国土上的粮仓，这是德国人从南斯拉夫农民手里没收的粮食。苏联司令部完全把这些粮食和许多其它物品一样当作自己的战利品。苏联侦察机构招募了大批白俄侨民和南斯拉夫人为他们服务，甚至把手伸进中央委员会内部。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付什么人呢？我所管理的宣传部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同苏联代表们共事时时的摩擦。苏联的宣传总是歪曲或低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斗争，而与此同时却要求南斯拉夫的宣传服从苏联的需要，纳入苏联宣传的轨道，只不过开始时，他们提出这些要求时比较谨慎，后来就越来越不加掩饰了。苏联代表们大吃大喝成风，达到不象样子的程度，而且还企图把南斯拉夫的上层领导也拖进这样的风气里去，这在我和其它许多同志的眼里只能是证实了我们对苏联人的观察是正

确的：他们言行不一，口头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是道德败坏。

两个革命和两个政权尽管有其相似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但是当它们初次接触时，不可能没有摩擦。然而，因为这些摩擦发生在特殊的和内部的意识形态领域，所以它们的表现形式只是不同的道德选择，看起来好象是有着共同信仰的正统的中心不能理解一个小党和穷国的良好愿望，为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由于人们对周围的认识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所以我突然“发现”了人同自然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我开始和青年时期一样去打猎，这又使我突然感到：美好的事物不仅只存在于党内和革命之中。

然而，使人伤心的事情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

(二)

1944—1945年冬天，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了。其中包括中央委员、工业部长安德利·赫勃朗^①和总参谋长阿尔索·约万诺维奇^②，此外还有我当时的夫人米特拉^③，

① 安德利·赫勃朗(1899—1948)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克罗地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事工运活动，曾坐牢二十年。被释放后，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书记。民族解放运动一开始，于1941年即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战后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如工业部长，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国民议会主席团委员，以及联邦计划委员会主席。1948年被审查，并被解除了一切职务，据说1948年自杀身死。——译者

② 阿尔索·约万诺维奇(?—1948)战前南斯拉夫的职业军官，门的内哥罗人。参加游击队并参加组织人民解放军的工作，在1946年以前，曾任总参谋长。1948年铁托被开除共产党情报局时，他曾公开站在苏联一边。随后企图逃离南斯拉夫，被部队发现，当场击毙。——译者

③ 米特拉·米特罗维奇(1912—)1933年入党，南斯拉夫著名的女共产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游击队出名的女战士，以后逐渐提拔到领导岗位。1945年以后任塞尔维亚教育部长，后在联邦政府执行委员会工作，南共中央委员。——译者

她，除了告诉我苏联领导人的政治声明外，还可以告诉我他们的私下谈话的内容，对这些都是我特别痛苦地想弄清楚的事。

整个代表团和个别团员都不断因南斯拉夫局势和个别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立场而受到指责。苏联领导人往往从某些具体事实出发，然后无限夸大和上纲上线。更糟糕的是，代表团领导人赫勃朗同苏联代表的关系搞得十分亲密，总是向苏联领导作书面汇报，并把苏联对我们的指责都推到团员们的身上。赫勃朗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发泄对撤销他霍尔瓦提共产党书记职务的不满，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过去在监狱中表现不够坚定（这是我们后来才了解到的），而他显然是用这种办法掩盖他上述表现。

那时，把情报交给苏联党并不算什么不轨行为，因为任何南斯拉夫人也没有把自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的中央对立起来。不仅如此，就连我们党内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向苏联中央委员会保密过。然而，赫勃朗的做法，就是在那时的情况下已是一种挖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墙脚的行为。我们始终未了解到，他究竟向苏联提供了什么情报。但是，根据他的态度和个别团员所反映的情况，可以完全正确地判断，赫勃朗给苏联中央委员会写了许多信，目的是挑拨离间，要求苏联对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以便在南共中央实现对赫勃朗有利的改组。

当然，他的所作所为都被他说成是为了坚持原则，而且是利用了南斯拉夫人犯过的比较明显的过错和弱点作为自己的依据的。而最重要的还在于：赫勃朗认为，南斯拉夫不应该有自己独立工业和经济建设计划，而应该包括苏联的建设计划之中，相反，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却认为，必须和苏联合作，但与此同时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这个代表团所承受的最后的精神上的打击，无疑是来自斯

大林。他把全团请到克里姆林宫，照例设宴招待，并且安排了只有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才能看到的场面给他们看。

他批评南斯拉夫军队的管理方法，但直接点名的只有我一个人。而且丝毫不留情面！他非常激动地诉说，红军在战争中经受的痛苦和他们在被破坏的国土上连续作战几千公里时所遇到的骇人听闻的苦难。他满面泪痕，喊道：

“这样的军队却受到了杰拉斯的辱骂！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是如此热情地接待了他！我们的军队为了你们不惜流血牺牲！杰拉斯本人是作家，可是他是否了解什么叫人的痛苦和人的感情？难道他能了解一个经过几千公里浴血战斗的战士的心吗？如果这样的战士和妇女逛一逛，或者拿走了某一件小东西，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不断地举杯，奉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开玩笑，和第三种人寻开心，嘲笑他们一下；他和我的妻子接吻，因为她是塞尔维亚人。然后，他又为红军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得不到南斯拉夫人的感激而流了眼泪。

他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提到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但过多地提到斯拉夫人、斯拉夫民族、俄国人同南斯拉夫人的联系，最后还是回到红军的英雄主义、苦难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话题上来。

当我听到这一切，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而且简直是惊呆了。

今天，我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把我选为攻击的目标，并不是因为我“指责”了红军的行为，而是想用这些办法把我拉回到他那方面去。我对苏联及他本人所表现出来的真诚和钦佩，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我从莫斯科回到南斯拉夫之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描写我

同斯大林的会见。这篇文章他很欣赏。苏联代表只是劝我，如果以后我再登载这篇文章的话，最好删掉关于斯大林脚太大的那一句话，并多提一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间的亲密关系。斯大林善于很快能摸透人的性格并特别善于利用人们的弱点，这使他必然懂得，不管他使用政治上提拔的方法（我对这点是完全无所谓），还是使用从思想上整我一下的方法（我对苏联党的感情并不比对南斯拉夫党的感情深些），把我拉过去他都不会成功。只有唯一的方法能对我发生影响——那就是利用我的情感，即我的真诚和我当时对苏联的迷恋。于是他选择了这一途径。

然而我的情感和真诚同时也是我的长处，当我碰到对方的虚伪和不公正时，我这两点很容易转化成为它们的反面。所以斯大林从来没有企图直接把我拉过去，而我在实践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联的不公正和追求霸权这一特点，所以逐渐克制自己容易感情用事的弱点，越来越变得坚定和果断了。

今天确实很难判断，在斯大林的表现中哪些是逢场作戏，哪些是真正令他伤心而流泪。我个人认为，在斯大林身上这两方面很难分辨清楚，他作戏给人看时是如此逼真，在别人看来，他对自己所说的话真是深信不移，完全出自真情实意。他完全能把握争论的每一关键时刻，及时处理争论中的转折，善于适应提出的每一个新问题，甚至于每个新来的人。

就这样，代表团垂头丧气，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南斯拉夫。

在斯大林流了眼泪和指责我对红军“背信弃义”之后，我就更加孤立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并没有消极，我拿起笔杆和书本，在我自己内心中寻找解决我所处的困境所带来的问题。

(三)

但是,事态是向前发展的,南苏关系不能永远停留和保持在与军事使团和军队接触的水平上。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着,而且全面开展起来,因而也就越来越带有国与国之间的性质。

四月,为了签订互助条约,南斯拉夫将派出一个代表团到苏联。代表团由铁托率领,陪同他的是外交部长舒巴什奇^①,还有两位经济部长——B·安德烈也夫和H·彼得罗维奇。我也参加了这个代表团,显然是想通过直接接触来解决围绕“侮辱”红军问题而发生的争论。铁托让我参加了代表团,苏联对此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我也和大家一起上了苏联飞机。

这是四月初的一天,因天气很坏,飞机颠簸得很厉害。铁托、多数代表和陪同人员,甚至包括飞行员,都感到不舒服。我也有不适之感,但和他们的情况不同。

当我知道这次我也去以后,直至同斯大林见面之前,我一直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总觉得我仿佛是作为一个悔过者去的,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因为我没有什过可悔。在贝尔格莱德,我周围形成了一种气氛,都认为我已经越陷越深,是一个“不能自拔”的人了,对我来说,没有别的什么立功赎罪的出路,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斯大林的宽宏大量,不纠既往上面。

① 伊凡·舒巴什奇(1892—1955)克罗地亚政治活动家。1939年任克罗地亚州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国外。在盟国坚持下,1944年6月1日被任命为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总理。在维斯岛签订的铁托——舒巴什奇协定后,舒巴什奇将它的政权和铁托政权合并。在临时联合政府内,曾一度任外交部长。——译者

飞机逼近莫斯科，而我的内心又出现了我所熟悉的那种孤独感。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同志和战友是多么轻而易举地抛弃了我，因为同我的接触会影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会引起人们怀疑自己是否也犯了“偏离”正确路线的错误。就是在飞机上我也没有摆脱这种感觉。我同安德烈也夫的关系从来都是比较随便和坦率的，我们曾在共同斗争和在监牢里共患难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正是在艰难困苦中最容易表现出每个人的个性和建立真正的友谊。可是现在呢？他似乎很同情我，但是他爱莫能助，而我也不愿意低声下气主动去找他，更重要的是我不愿意让他的处境变得困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在支持我。在艰苦的地下斗争时期，我就很熟悉彼得罗维奇，我们之间的接触主要是在学术领域方面。但我现在却连找他谈我们当时在进行不断争论的题目——即塞尔维亚政治史问题也不敢了。铁托根本不提我的问题，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对我的问题他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对我的态度也是不冷不热的。但是我感到，他个人出自政治原因是和我站在一起的。因为他这次带我去莫斯科的行动以及对我的问题表示沉默本身就说明了他对我所持的态度。

对我来说，我的那种一般人都具有的良心（即那种自然地追求善良和公正的思想）和我所处的和积极活动的环境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冲突——这是被束缚在一定范围内的抽象目标，和受到现实可能性制约的运动之间的矛盾。我在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认为这一冲突乃是渴望改变世界和我自己所从事的运动，同掌握决定大权的人们对我们缺乏理解所形成的矛盾。

我的顾虑随着我们接近莫斯科而越来越厉害了。

从飞机上往下看，是一片荒无人烟、空旷的大地，冰雪已经消融，露出了黑黝黝的沃土，那里河流纵横，弹痕遍地。天空

多云，天气阴沉沉的，下面的东西看不清楚。觉得我不是在现实的世界中飞行着，仿佛这个世界是既没有天空，也没有陆地，也许我梦中见过这样的情景，但我觉得它比起前此所经历的一切感受则又显得更现实一些。我确是飞行在天和地之间，即在我的良知和事业之间、在我追求的目标和可能性之间。在我的记忆中只能留下了这种不现实的梦幻和令人痛苦不堪的飞行的巅巅。这时，我已没有了以前的对斯拉夫问题的兴趣，对革命狂热也几乎没有了，我的感情和我第一次来到这块俄罗斯苏维埃土地及和这块土地的领袖会见时有所不同了。

此外，我还看见铁托痛苦不堪的样子。被旅途劳顿折磨得脸色苍白的铁托，他以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他讲了话，参加了一切礼节性的仪式。

率领接待人员来欢迎的莫洛托夫冷冰冰地同我握了手，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仿佛我们并不相识似的。还有一件事也做得令人不舒服，他们把铁托送到专门为他准备的别墅去了，而我们都住在《大都会》^① 饭店。一种迷惑不解和灾难临头的心情越来越冲击着我。他们的这些做法当然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姿态。

第二天或第三天，我房间的电话铃响了，我在电话中听到一个女人的娇滴滴的声音：“我是卡佳。”

我问：“哪个卡佳？”

“就是卡佳，您大概把我忘记了吧？我必须同您见面，我一定要和您见面！”

我费劲地回想：“卡佳？卡佳？不，我不记得认识有这样一个。”于是我马上产生了怀疑：我想一定是苏联秘密警察让我

① 《大都会》饭店位于红场上，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还是一流的饭店，但不是招待贵宾的宾馆。——译者

上勾，以便以后他们可以诬陷我们说：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并不严格遵守生活上的道德观。“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如同其它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一样有无数的暗娼，这一点对我来说并不感到有什么奇怪和新鲜。但同时我也十分清楚，这种人只能通过秘密侦察机关才能和高级外宾进行联系，因为外宾在这个国家里得到比世界其它地方更严密的保护。所以我非常平静地回答对方：“不要打扰我！”就把电话筒放了。

我以为，这种下贱卑鄙的方法只用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因为我是党内的领导，我认为有义务检查一下，彼得罗维奇和安德烈也夫是否也遇到类似的麻烦。同时，我还想把这件事告诉他们，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他们说，是的，也有人给他们打过电话，但不是卡佳，而是娜达沙或瓦娃！我把一切情况解释给他们听，并且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要他们绝对不要和任何人有任何联系。

我的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感到轻松，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唯一目标，但另一方面我更加警惕起来，我思索着：为什么要干出这样的事来？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连想也不敢想去问问舒巴什奇博士。他不是共产党员，我不想把苏联的阴暗面在他面前暴露，更不想把他们阴谋诬陷共产党人的做法告诉他。但是，我坚信，任何一个卡佳也不会给舒巴什奇打电话。

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得出这样的结论：认识到正是共产党人是他们的工作目标并使之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然后在东欧国家建立霸权的保障寄托在成为他们的工具的这些人的身上。然而，我已产生疑心，并且对这样的方法感到恐怖。我对他们想把我变成他们的工具的企图进行了反抗。

那时，我还没有能力认识到：我可以是共产党人、同时也

是不做别人工具的自由人。

(四)

关于签订苏南两国间的同盟条约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条约是例行公式，我的任务只是核对一下译文。

四月十一日晚上，在很小的范围内于克里姆林宫进行了正式签字仪式。公众方面（如果在当时的条件下还可以用这样的称呼）参加仪式的只有苏联的电影摄影工作人员。

最值得提到的一个有趣的插曲是斯大林举着杯要和一个服务员碰杯。这位服务员窘惑不堪，非常不好意思，这时斯大林问道：“你难道不愿意为苏南友谊干杯吗？”于是那位服务员就乖乖地拿了酒杯，一饮而尽。

看到这一场面我感到十分虚伪，或者说觉得有些荒诞。然而，大家都在怡然微笑，似乎要用这种举动证明，他们看到斯大林对人民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

这时我又一次见到了斯大林。从他的表情看不出他有什么成见，但也没有莫洛托夫的冷冰冰的面孔和虚伪的礼节。斯大林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关于红军表现的争论，看起来并没有被忘记，也没有被谅解，所以我仍然被忏悔的火焰烧得头昏脑胀。

在克里姆林宫的小型晚宴中，斯大林的表现也和上述的情况差不多。

晚宴后，我们一起看电影。斯大林说，他对枪响已听腻了，所以我们没有看军事影片，放映的是关于集体农庄的并不出色的幽默故事片。在电影放映过程中，斯大林不断插话，对情节评价时，他很象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把艺术加工看成是真

实的故事。第二部电影是战前的，叫《如果明天爆发战争的话……》。影片中，表现打仗时使用了毒气，德国侵略者后方发生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影片结束后，斯大林不紧不慢地说：

“现在的实际情况和影片上演的差不多，只不过没有使用毒气，德国无产阶级也没有举行起义罢了。”

大家因喝酒、饱餐和电影而感到精疲力竭。斯大林又一次默默地同我握了手，不知为什么，但我感到我的心里平静了些，有些怡然之感。也许，这是因为周围气氛还能忍受？或许因为我的内心里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看法，它给了我心上的平静？大概两者皆有。不管怎样，我觉得：没有斯大林的宠爱，我也照样能活下去。

不过，一、两天之后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喀捷莲娜大厅中举行的盛大宴会时，斯大林的态度有某种解冻的迹象。总的来说，他在进餐饮酒时，情绪比较好一些，也比较活跃一些。

按当时苏联的礼节，铁托的座位在斯大林左侧，在加里宁（当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右侧。我的座位在加里宁左侧。莫洛托夫和舒巴什奇坐在斯大林和铁托对面，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其它客人的座位设在侧席。

起初，气氛不太自然，很拘束。在座的人除了舒巴什奇都是共产党人，但是举杯时相互称呼“先生”，非常严格地遵循国际上规定的礼节，似乎这是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代表之间的会晤。

我们通常都是在正式讲演和礼节之后，以朋友相待，是作为具有共同目标的同一运动的关系亲密的人共聚一堂的。因此，这种礼节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就令人感到更加明显，因为当时南苏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因为苏联追求霸权和共产主义世界

内部进行争夺权威的斗争而受到破坏。这又一次证明，现实生活并不受个人的愿望和某种公式的约束，而是把人们料想不到的形式强加于它。

这时，苏联和西方同盟国在军事关系方面正在度他们的蜜月，苏联怕对方指责他们，说苏联对待南斯拉夫，不象是一个独立国家对另一个独立国家的关系，因南斯拉夫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后来，当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在东欧的地位巩固了，到那时苏联才企图抛弃一切条约及其它的“形式”，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和“民族主义的”残余。

后来斯大林打破了官方拘谨的气氛，只有他一个人能这样做，因为他可以不会承担“犯错误”而受批评的风险。他随便地站了起来，举杯并称铁托为“同志”，还说他不愿意再称他为“先生”了。他的这一举动使大家感到亲切，气氛活跃起来了。舒巴什奇博士也高兴地笑了，不过很难相信他的笑会有多大的诚意，然而对他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头脑和固定原则的政治家来说，装模作样本来就是他的本性。斯大林开始开玩笑，说俏皮话，捉弄坐在桌子对面的人，高兴地说一些唠叨话。气氛越来越活跃了。

加里宁老头子眼睛实在不行了，他勉强能摸到酒杯、盘子和面包，我总是在旁边尽力照顾他。铁托一、两天前被加里宁正式接见过，他告诉我，老头子还不那么衰老。可是，根据铁托所注意到的细节及我在宴会上的观察，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斯大林当然了解加里宁已经衰老不堪，所以当加里宁对铁托抽的南斯拉夫香烟表示感兴趣时，他很不得体地开了个玩笑说：“不要拿了，这是资本主义的香烟！”香烟从加里宁颤抖的手中掉了下来。

斯大林大笑起来，那样子活象牧神^①。几分钟后，狂笑之后的斯大林又为“我们的总统”加里宁举杯，但这只是对一个除了躯壳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的人的连篇空话而已。

在这类范围更大的场合，对斯大林的神化，人们感觉得更加直接、更加突出。

今天我可以这样说：斯大林的神化，用现在的语言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不仅是斯大林自己造成的，而在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他周围的官僚们造成的，因为他们需要有这样的领袖。

然而，关系逐渐被颠倒过来：被那些捧上了天的神化了的斯大林逐渐达到如此强大的程度，结果他完全可以不理睬把他捧上天的人们的期望和需要。

一个身材矮小笨手笨脚的人走进了金碧辉煌、五光十色的宫殿，一切都为他让路，多少狂热、倾倒的眼光目送着他，只要他开口说句什么话，宫殿的随从都要竖起耳朵记住他的每一句话。他个人是如此相信，对这一切他简直是视而不见了。饥饿正笼罩着他的国家，到处一片废墟，已经遍体鳞伤。他的军队和那些陶醉于白酒和胜利之中的肥头大耳、满胸勋章的元帅们已经踏遍了半个欧洲。他完全有把握，在下一回合的较量中他们将踏遍另一半欧洲。斯大林明白，他是人类历史中最独裁的人物之一。但这并不使他感到不安，他相信，他是在主宰历史的裁判。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使他的良心受到谴责，尽管他本人或者根据他的命令已消灭了几百万人，那些在与他共事的几千名亲密的战友，仅仅因为他们对他的政策和措施，真正能把国家和人民引向幸福，平等和自由的天堂表示了一些怀疑，

① 罗马神话中头上有角的神。——译者

就被他当作叛徒们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手的数量越小、力量越弱，他对他们采取的斗争方法就越加骇人听闻，为时也最长久，手段也最残忍。然而他却胜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是良心？它是否存在？在他的哲学和实践中，良心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人吗？不过是人类繁殖生产力的产物。

诗人因为有了他而充满了灵感，乐队为他奏着颂歌，哲学家和研究所为他说的每句话发表大本大本的著作，而被他判了死刑的人喊着他的名字走上刑场。现在他成了人类历史上赢得了最大的一次战争的胜利者，他在占地球面积六分之一的国家中掌握着绝对权力，这一权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继续不断扩张。因此，他相信他的社会中没有矛盾，他的国家在各个方面比任何其它社会都优越。

他和自己的近臣——他的所谓“同志”开玩笑，不仅是因为他的沙皇式的宽厚的胸怀，然而他作为一国之君的威严，如他所做的那样，仅仅表现在他从来不和自己开玩笑。他之所以和人们谈谈笑笑，是因为他有时喜欢从奥林匹斯^①下到人间，以表明他是一个活人，用以时刻提醒人们，脱离集体的个人就等于零了。

我和大家一样，也被斯大林及其玩笑所陶醉。但是我的脑子和内心深处还有那么一个清醒的和不安的角落：我看见了这一切病态表现，我也无法同意斯大林的那种开玩笑的举动，不满意他有意识地没有和我讲一句合乎人情的和同志式的话。

（五）

但不管怎样，当我被邀请参加斯大林别墅里举行的小型宴

① 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诸神居住的地方，那里有着铜制的宫殿。——译者

会时，我还是感到既突然又亲切。舒巴什奇博士当然一点也不知道，南斯拉夫方面参加那次宴会的只有我们这些共产党员部长，苏联方面参加的人只有斯大林最亲密的助手：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安东诺夫将军、贝利亚，当然，还有莫洛托夫。

和往常一样，我们在晚上十点钟集中到斯大林别墅的桌前，我是和铁托一起来的。坐在主席座上的是贝利亚，右侧是马林科夫，我挨着他，再下面是莫洛托夫、安德烈也夫和彼得罗维奇，左侧是斯大林、铁托、布尔加宁和安东诺夫将军，他当时是副总参谋长。

贝利亚也是小矮个子，在政治局内大概没有比斯大林高的人。贝利亚也是个胖子，脸色又苍白又黄，手心软而潮湿。当我看到他的四四方方的嘴唇和透过夹鼻眼镜看着对方的那双青蛙般的眼睛时，我简直是如同触了电一般，因为他实在太象伏伊科维奇——贝尔格莱德王国警察局的一个局长，他的专长就是折磨共产党员。我用巨大的毅力才摆脱了这个不愉快的比拟，这是因为他们两人不但从外形上很象，他们两人的全部表情——自信、蔑视、拍马奉迎和谨慎的混合体——也都太相象了。贝利亚和斯大林一样是格鲁吉亚人，但从他的外表上看不出来。格鲁吉亚人通常是黑头发，身材消瘦，而从贝利亚的外貌上看不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可以说是斯拉夫人，也可以说是立陶宛人，而可能性最大的是混合血统的人。

马林科夫更矮更胖，但是他是典型的带有蒙古血统的俄罗斯人（颧骨高高的，肌肉松弛，一头漆黑的头发）。看上去，是一个不露声色，寡言内向的人，注意力集中，他的个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特点。但在他那厚厚的几层脂肪下面似乎存在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活跃而机灵，有一双很聪明而无所不见的眼睛。长期以来，大家都知道他是斯大林在党务方面的非官方

的副手。一切同党组织有关的事情——党的干部提拔和撤换的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干部档案制”就是他发明的。几百万党员和后补党员详细的历史、经历、自传都存放在中央，并且在莫斯科不断地按需要予以加工和修改。我利用这次机会，请他帮我找一本斯大林的《论反对派》，这本书因为摘录了大量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引文因而不公开发行了。第二天我得到了一本旧书，它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上。

布尔加宁身穿将军服。他生得很漂亮、是个非常典型的大个子俄罗斯人，留着老式的小胡子，说话异常谨慎。安东诺夫将军还很年轻，是一位身材匀称、英俊、生着一头黑发的美男子，他不随便讲话，只是谈到和他有关的事时才开口。

当我面对斯大林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充满了信心，尽管他这次会见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理睬我。

直至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以后（这要感谢各种饮料，干杯和玩笑所起的作用），斯大林才认为，到了同我结束争执的时候了。他半开玩笑地给我倒了一杯白酒，建议我为红军干杯。我没有马上领会他的意图，建议为他的健康干杯。

他笑着，用考验的眼光看着我说：“不必，不必，还是为红军干杯！为什么？您难道不愿意为红军干杯吗？”

我当然干了这杯酒，尽管我在斯大林的酒宴上，除了啤酒，我总是尽可能不喝其它酒类的。我不喜欢喝白酒，因为酗酒同我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但我也从来不是主张禁酒的人。

接着斯大林问我，红军在我们那里出了些什么事。我告诉他，我完全不想侮辱红军，而只是想指出一些个别人的错误，和我们因此而遇到的政治方面的困难

斯大林打断我的话说：“是的。您读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书吗？您看到人的灵魂和心理状态是多么复杂吗？您想一想，一

个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打仗，看到多少战友和最好朋友的牺牲的人——这样的人对周围事态怎么会是正常的呢？在如此可怕的战争之后，他和妇女玩一玩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把红军理想化了，然而它不是理想化的军队，就是红军里没有那些刑事犯的话（这些刑事犯是我们让他们参军的）^①，红军也不会是理想化的军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个少校飞行员戏弄了一个女人，出来一位工程师，这位骑士要保护这个女人。少校拿起了手枪，喊着说：‘你这个后方的老鼠！’就一枪把这位骑士——工程师打死了。少校被判了死刑。此事交到我这里，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战时我作为最高统帅有权过问这类事情，我释放了少校，把他派到前线去作战。他现在是一位英雄。必须懂得战士的心情。是的，红军不是理想化的军队。但重要的是，它应该打击德军，而且打得很好，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后来，在我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我惊奇地听到有比这种“谅解”更高水平上的“谅解”红军战士的过失。苏联士兵在东普鲁士进攻时，坦克兵不加区别地压死了德国的逃难者——妇女和儿童。这件事传到斯大林那里，并请示应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们给自己的战士上的课已经太多了，现在就让他们发挥主动性吧！”

斯大林问我：“我们军事使团的团长科尔涅也夫将军为人如何？”

我不愿意再谈科尔涅也夫和他的使团的什么坏话，尽管能够谈的有许多许多。

^① 为了补充兵源，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允许刑事犯人参军上前线，立功赎罪，战争胜利后释放回家。这样的犯人在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里最多，他们作战勇敢，但纪律极坏。——译者

斯大林继续说：“这个人并不笨，但是实在可怜，是一个酒鬼，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

接着斯大林就我只喝啤酒（我就连啤酒也不喜欢喝）开心说：“杰拉斯和德国人一样，只喝啤酒，他是德国人，真的，他是德国人。”

我并不喜欢这个玩笑，因为那时，就连一小批站在我们一边的德国共产党人流亡者，在莫斯科的地位也是最低的。然而我听了他的这些话并没有生气，心里没有产生愤怒之情。

从表面上看，围绕红军问题的争论就此结束了，斯大林对我的态度也和以往一样也很真挚。

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1948年南苏中央之间发生了冲突，此后，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他们的来信中又利用和歪曲了关于红军纪律问题的争论和所谓我“侮辱”红军的事件。

斯大林有意地半开玩笑半恶意地挖苦铁托，他说南斯拉夫军队仗打得不好，同时对保加利亚军队给了很高的评价。不久前（冬天的时候）补充了大量新兵的南斯拉夫军队，第一次参加了较重要的正规战斗行动，打得不好。斯大林显然了解具体情况，他还是挖苦地说：

“保加利亚军队比南斯拉夫的强。保加利亚军队本来有弱点，军内还有过敌对分子。他们枪毙了十个二十个，一切都解决了。保加利亚军队确实很好——受过训练，纪律性强。你们的南斯拉夫军队还是游击队，没有能力应付重要的阵地战。冬天，德国的一个团就把你们一个师打垮了。一个团对一个师！”

过一会儿，斯大林举杯，建议为南斯拉夫军队干杯，但没有忘记补充说：“为一个能在平原上打得很出色的军队干杯！”

铁托忍着，没有对斯大林的话做出反应，当斯大林针对我们开心时，铁托面带笑容默默地看着我，我对他表示赞许和同

情。当斯大林说，保加利亚军队比南斯拉夫的军队好时，铁托忍不住了并高声说，南斯拉夫军队很快会克服自己的缺点。

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关系中，总象是有一种特殊的、不能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的特点，似乎在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彼此都记恨在心的什么事情，而他们两人又不知为什么互相间都不愿意把此事开诚布公谈出来。斯大林很注意不要有什么事伤了铁托本人，但又总是对南斯拉夫过分挑剔。铁托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前辈，很尊重他，但同时又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他对斯大林指责南斯拉夫总是予以反击的。

有一次铁托谈到，当前社会主义产生一些新现象，社会主义的表现和过去不同了。斯大林听到后说：

“现在，社会主义就是在英国君主制度下也是可能出现的。不是处处都需要革命。最近英国工党代表团来过我这里，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是的，新现象很多，就是在英国王国的条件下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斯大林从来没有公开地主张过这样的观点。不久，英国工党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并把百分之二十的工业收归国有。但不管怎样，斯大林始终没有说过这些措施是社会主义的，也没有称工党为社会主义者。我想，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对外政策上他和工党政府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和冲突。

在谈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说，南斯拉夫政权实质上是苏维埃政权；共产党掌握了所有经济命脉，国内也没有什么反对党。斯大林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不对，你们那里不是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戴高乐的法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产物。”

铁托补充说，南斯拉夫产生了一些新的情况。这场讨论没有结束，但就此停止了。

我从内心深处并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我想，我的意见和铁托的意见没有什么区别。

斯大林也讲了他对正在进行着的战争本质上的特点的看法：“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他也大致上讲了他的泛斯拉夫主义政策，他说：“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都不敢！”他重复着这句话，并有力地用食指在空中划着。

有人提出，德国人在今后五十年内不会恢复元气。斯大林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不对，他们会恢复，而且会很快恢复起来。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有很熟练的数量很大的工人阶级和技术知识分子，再过十五至二十年，他们又会站得很稳了。所以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总而言之，如果斯拉夫人团结起来，任何人都不敢碰他们一下。”

有一次他站起来，提提裤子，似乎要和谁打架似的，然后他自我陶醉地说：“战争快结束了，再过十五——二十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

他的话使人毛骨悚然——可怕的战争还在进行着呢！但是他对所选择的必须走的道路充满信心，对他所生活的世界及自己所领导的运动的未来将必不可免要发生的事有着充分认识和估计，这些都使人们敬佩不已。

那天晚上他所讲的其余的话，大都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总而言之，尽情地吃喝，干了无数次杯，祝酒的话也都没有什么意义。

莫洛托夫讲述了斯大林如何开了丘吉尔的玩笑，他说：斯大林举杯建议为侦察员及特务机构干杯，用此暗示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利玻利半岛的失利，原因是英国人没有

得到确切的情报。同时，莫洛托夫也很得意地提到丘吉尔的精细和幽默感。他说，有一次丘吉尔在莫斯科喝了一大杯优质的葡萄酒，然后说，他完全有资格得到一枚苏联高级勋章和接受红军的衷心的感谢，因为过去在外国干涉时期^①入侵阿尔汉格尔斯克时，他教育了红军如何能把仗打好。归根结蒂，看起来，苏联领袖虽然不喜欢丘吉尔，但是他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知道他是一个有远见的、危险的“资产阶级国务活动家”。

铁托在回别墅的路上，在汽车里说：“这些俄国人，真见鬼，怎么喝那么多酒，简直是腐化堕落。”他也是不能多喝酒的人。

我当然同意他的意见，而且又一次完全徒劳地想搞清楚，究竟为什么苏联的上层领导如此大量而经常地酗酒。

在从铁托的别墅返回城里的路上，我总结了一下这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没有什么争吵，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加大了，因为一切争论的问题是按两个完全自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作为政治原因得到解决的。

我们在季米特罗夫那里也度过了一个晚上，为了把晚上的活动安排得满一些，他邀请了两三个苏联演员，他们为我们演出了短小的节目。

当然，我们谈了有关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将来联合的问题，但是谈得很简短，涉及的东西都是很一般的，并没有详谈。铁托和季米特罗夫共同回忆起共产国际时代的事情。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友好往来，不是政治会见。

当时季米特罗夫感到很孤独，因为保加利亚的侨居苏联的党员都随红军回到保加利亚去了。

^① 指十月革命后外国出兵干涉苏联的时期。——译者

当时，在季米特罗夫的情绪中可以感觉出他很疲倦和有些优柔寡断。其中的原因（至少部分原因）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谁都不愿公开讲出来。当时保加利亚虽然已获解放，但是斯大林不允许季米特罗夫回国，理由是时机未到，因为他如果回去，西方会把他归国看成是在保加利亚公开推行共产主义。似乎保加利亚施行的方针，如果季米特罗夫不回去，人们都看不见似的！在斯大林的宴会上也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不知是什么意思，斯大林挤了一下眼睛说：“在保加利亚，季米特罗夫回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在这里过得也很好。”

我们当时就开始怀疑（尽管没有什么充分证据）：斯大林在保加利亚没有把事情安排就绪之前，他就不肯让季米特罗夫回国！

我们的疑虑还没有发展成为确信苏联在谋求霸权，但是我们对此已有所觉察。我们也就不得不同意斯大林虚构出来的说法，他说他担心季米特罗夫会迅速使保加利亚向左转。

当这些问题在它发展的初期，我们的这些疑虑已经绰绰有余了。

这样一来，就又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斯大林当然是天才，但是季米特罗夫也不是蠢才，斯大林怎么会比季米特罗夫更好地了解保加利亚应该干什么呢？把季米特罗夫留在莫斯科，违背他的意志去行事，难道不影响他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内及人民中的威信吗？归根结蒂，为什么要围绕季米特罗夫是否回国问题，玩弄这么复杂的手腕呢。然而与此同时，俄国人对这件事又都守口如瓶从不提起，连对季米特罗夫本人也一句不说，这是为什么呢？

在政治上，比起任何其它领域来，发生的一切事件，多半是从思想上的分歧和怀疑对方居心不良开始的。

(六)

我们途经基辅回国，根据我们和苏联政府双方的愿望，我们要拜会一下乌克兰政府的成员，为此，我们在那里停了三天。

当时乌克兰共产党书记和政府主席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他的外交部长是曼努伊里斯基。他们来迎接我们，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这三天的时光。

1945年战争正在进行中，所以还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些愿望——赫鲁晓夫和曼努伊里斯基问我们：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这一问题毫无结果，因为斯大林很快就遇上了“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抗，所以他根本没有考虑如何加强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独立性的问题。至于能言善辩的十分活跃的曼努伊里斯基老头子他是一位没有部的部长，他以后还在联合国说了两、三年的空话，然后突然失踪了——消失在那些由于斯大林或另外什么人的愿望而造成的无数牺牲者的大海之中了。

赫鲁晓夫的命运则完全不一样，尽管当时谁也猜不出他的前程将会如何。

他从1939年起就属于最高级的政治领导阶层，不过不象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或卡冈诺维奇那样受斯大林的信任。在苏联的上层中，大家认为，赫鲁晓夫是精明的实干家，在经济和组织方面具有难得的才干，然而作为演说家和作家则完全不为人所知晓。他是在三十年代清洗后被提升到乌克兰的领导岗位上来的。至于他在清洗中起了什么作用，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对这些事都毫无兴趣。不过，我很了解在斯大林的俄国是怎样提拔人才的：需要的是在血腥的“反富农”和同“反党”

分子斗争中的运动里坚决果敢而又能随机应变的人。特别是在乌克兰，除了上述那些罪行外，还要加一个——“民族主义”的罪行。

赫鲁晓夫的高升（那时他还相当年轻）对苏联来说，并没有什么奇特的：作为国家干部他经受了各种考验——政治和其它考验，并靠自己的忠诚、伶俐、机警、聪明顺着党的阶梯一步一步地爬了上去。他和多数领导者一样，是革命之后新起来的、斯大林式的一代党和苏维埃干部中的一员。战争开始时，他正好是乌克兰的最高领导人。当红军不得不撤离乌克兰时，赫鲁晓夫在红军里得到一个很高的政治职务（但不是最高的），他是陆军中将。德军被打退后，他又回到乌克兰，成为基辅的党和政府首脑时，他仍然穿着他的中将的军服。

我们听说，他本不是乌克兰人，而是俄罗斯人。大家都对此表示沉默，他自己也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说乌克兰连政府主席都不是乌克兰人，那实在是很不得体的事。我们这些善于对有损于我们理想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去进行解释的共产党人也对此表示奇怪：难道在一个比法兰西民族人数还多的民族里，在一个比俄罗斯民族具有更高的文化的民族里，连一个能承担政府主席的职务的乌克兰人都找不到吗？

还有一点他们也无法掩盖：即当德国人占领了他们的家乡乌克兰以后，乌克兰人往往离开红军，而在德军撤出之后，却有二百五十万乌克兰人应征入伍参加红军。那时，反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小规模战斗还在继续进行（天才的俄国将军瓦杜丁是这一运动的牺牲者之一），我们对下述解释是不能满足的：他们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顽强活动的恶果。那么必然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在苏联所有民族确实都是平等的，那么民族主义又从何而来呢？

乌克兰的社会生活正在明显的俄罗斯化:戏剧用俄语演出,一些报刊是用俄文出版的,——这些都使人感到惊讶。

但是我们还想不到要在这些或其它方面埋怨赫鲁晓夫这位好客的主人,因为他作为好党员只能服从他的、列宁主义的中央和领袖及导师斯大林的一切指令。

所有苏联领导人都具有实干精神,他们在自己的共产主义圈子里常常也很直爽,赫鲁晓夫在这两方面都是突出的代表人物。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当我仔细阅读他的讲话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的知识面没有超出俄罗斯古典文学,他在理论方面的造诣没有超出中级党校的水平。除了在各种训练班获得的这些表面的杂七杂八的知识外,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他靠自学和自我修养,靠在多种实践中所获得的活的经验。他这些方面的知识是无法估量的,因为有时我对他理解的那些很少人才会知道的某些知识的细节方面惊奇不已,与此同时又为他对一些起码的原理一无所知而感到不可理解。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具有生动而形象表达的才能。

和其它苏联领导人相比,他实在太爱说话,他常常喜欢运用民间谚语和成语——这是当时领导人的风格,被认为是他们联系群众的一种表示。但是由于他本来就平易近人,言行自若,所以他的这一习惯不显得那么做作。

他也具有幽默感。他和斯大林的幽默感的区别表现在:斯大林主要在幽默中表现出他的智慧,因此显得有些笨拙和犬儒主义的东西,而赫鲁晓夫的幽默则纯属民间性质的,因此显得粗俗,但是生动活泼,仿佛是取之不尽的。现在,当他身居高位^①,全世界都在注意他时,可以看出,他在控制自己的言行,

① 指赫鲁晓夫当权的时候。——译者

但其本质并未改变，从这位苏维埃国家的主人的身上仍然容易认出他是一个来自民间的人。应该指出，在一切共产党里，没有受过完全的教育自学出来的人和一些学识浅薄者之中，他的自卑感最少。他比他们任何人更少考虑用某种光彩夺目的形式及公式化的词句去掩盖自己的无知和弱点。他滔滔不绝倾吐出来的那些大量的老生常谈的话都表现出他的真正无知和仅仅在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公式，然而讲这些话时，他是坦率的，是出自他的信念的。他的语言及表达方式比斯大林更受人欢迎，尽管他们的听众都没有变，都是广大的党员和群众。

他穿着没有熨过的半新不旧的将军服，他对普通党员和公民的日常工作的细节都很关心，在这点上他在苏联领导人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当然，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相反，是为了巩固它的基础，改善它的现状。当别人是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取汇报并发号施令的时候，赫鲁晓夫却在下面调查和了解情况，并就地发出指示，纠正缺点和错误。

任何苏联领导人都不到集体农庄去，偶尔去一趟也是为了参加宴会或者是摆摆样子的。而赫鲁晓夫和我们一起去集体农庄，他坚信集体农庄制度的正确性，并同庄员们一起用大玻璃茶杯饮酒。与此同时，他到温室、猪圈去视察，和人们讨论一些实际问题。在返基辅的路上，他还继续就在农庄里没有讨论完的问题发表他的看法，并公开谈论农庄的缺点。

在一次乌克兰政府各经济部门的会议上，我们看到他在处理大规模的事业中的非凡的实干才能。他的人民委员和南斯拉夫部长不同，他们不仅都是内行，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实事求是地估计现实的可能性。

他是一个身材矮胖，结实、性格活泼、动作灵巧的人，仿佛是用一块木料刻出来的一样。他吃东西时好象是大块大块地

把食物吞下去，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保护自己的那个钢质的假牙床^①。斯大林及其亲信，如果说他们没有美味崇拜狂的话，起码是有美食癖。对赫鲁晓夫，在我看来，吃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他象每一个过分疲倦的人那样，重要的是好好地饱饱地吃上一顿，当然，那就要看他是否有这种可能就是了。^②赫鲁晓夫的日常伙食是丰盛的，由国家供给，不用他私人付款。赫鲁晓夫不讲究吃喝，然而吃的量不少于斯大林，酒喝得比斯大林还多。

他是非常灵活的人，和所有的实干家一样，特别能适应环境。我想，如果某件事能给他带来实际利益的话，他是会不择手段地去把它干成的。他和一切来自民间的煽惑者一样，这样的人往往甚至于相信自己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也会轻而易举地放弃对他不利的那些方式，并且随时准备用道德标准和最高的理想准则去解释自己的这种举动。他喜欢这样的谚语：“打架时没有时间选择木棒”。他也利用这个谚语去解释他不打架时也需要木棒。

我上述对赫鲁晓夫的描写，虽然对今天的赫鲁晓夫来说，似乎说这样的话不大相宜。我只是叙述了自己当时的印象，也只是随便提了一下我现在的一些想法。

我当时并没有发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有什么不满。提到斯大林时，他很尊敬，他十分强调自己同斯大林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他告诉我们，在德军入侵的前夕，斯大林从莫斯科打电话给他，要他加倍注意，因为有消息说，德国人可能明天（即6月22日）有军事行动。这件事我只是作为我记得的

① 他动过手术，牙床和颌骨都是假的。——译者

② 这里指斯大林每天彻夜的晚宴和赫鲁晓夫的繁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译者

一桩事把它写在这里，并不是想驳斥赫鲁晓夫关于德军的突然袭击应归罪于斯大林的说法。突然袭击的行为是斯大林错误的政治估计所产生的后果。

不管怎样，在基辅有一种新鲜感，这要感谢赫鲁晓夫的不检点和务实的精神、曼努伊里斯基的热情和基辅的美丽；这个城市以其辽阔无垠的平原、混浊的大河两岸突起的山峦，令人觉得和贝尔格莱德十分相似。

然而，如果说赫鲁晓夫给人留下了坚强、自信和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的印象，基辅给人留下了智慧的、精心建筑的美的印象的话，那么就整个乌克兰来说，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没有什么特色的、精疲力竭和陷于绝望中的国度。

我对苏联的实际情况了解得越深入、我的疑虑就越多。要使我作为一个人的良心和这些事实相妥协，就越来越成为非常困难的事了。

失 望

(一)

我于1948年初第三次会见了斯大林。这次会见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正是苏联同南斯拉夫领导之间发生冲突的前夕。

在这次会见之前，南苏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要事件，因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苏联同西方之间的关系已开始变为冷战性质，已经成为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了。

在我看来，关键的事件有：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希腊的内战和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情报局——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南斯拉夫和苏联是坚决反对马歇尔计划的唯一两个东欧国家；南斯拉夫主要是由于当时我们持有革命教条主义的观点，所以反对，苏联是害怕美国的经济援助会动摇刚刚用武力征服的帝国。

当我作为南斯拉夫代表为出席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法共代表大会来巴黎时，莫洛托夫恰好在巴黎举行同西方国家代表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莫洛托夫在苏联大使馆接见了我们，我们在下面的两个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一、抵制马歇尔计划，二、批判法国党的所谓“民族主义路线”。莫洛托夫特别问及我对大会的印象。他还谈到由杜克洛主编的《新民主》杂志，他认为

这份杂志本来应该体现共产党的一致意见，因此他说：“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也不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东西。”

关于马歇尔计划问题，莫洛托夫对是否应该同意召开东方国家参加的会议表示犹豫，他认为，如果东方国家参加会议，他们可以利用这个讲坛，但只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就退出会议。我并不同意这个方案，但如果俄国人坚持的话，我也会同意他们的建议，我们政府的看法也是如此。但是莫洛托夫从莫斯科得到政治局的指示，连召开会议也反对了。

我回到贝尔格莱德不久，在莫斯科要召开东欧国家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研究对待马歇尔计划的态度。我被任命为南斯拉夫代表。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在于集体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不反对参加马歇尔计划。苏联飞机已经在贝尔格莱德机场等候我，这时莫斯科来电报说，召开会议的理由已不存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了。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也是由于上述原因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当各国党的观点同苏联的观点不一致时，用这种形式进行协商。早在1946年夏天，建立这种各国共产党能够协调自己的观点和交换意见的机构的想法已提到日程上来了。那时斯大林、铁托、季米特罗夫都谈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一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总是拖了下来，未能实现；关键在于，苏联领袖要找出实现此计划的适当的时机。这一时机于1947年秋天终于来临，毫无疑问，这是直接和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巩固自己对东欧国家的领导相联系的。

在波兰西部（原德国领土）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只有两个共产党——南斯拉夫和苏联——坚决主张建立情报局。哥穆尔

卡反对这个主张，他谨慎地但毫不含糊地提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

随便提一下一个插曲，情报局机关刊物的名称“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是斯大林想出来的，他认为今后每当西方宣传机构它们要引用该杂志的每篇文章时，就不得不重复地提到这个口号^①。但是斯大林的期望并没有实现，由于杂志的名称太长而且宣传意义太明显，所以西方有意地直接用“情报局杂志”这个称呼代替了杂志的名称。情报局的地点也是斯大林最后定下来的。代表们决定把所在地设在布拉格。晚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斯兰斯基^②乘汽车回布拉格去了，以便和哥特瓦尔德^③协商一下。夜间，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同斯大林通了直线电话（就连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找一个破烂的旅馆做情报局地址的事，不同莫斯科通直线电话也决定不了）。尽管哥特瓦尔德勉强同意了设在布拉格，但斯大林却又下命令把共产党

① 这个杂志的名称就是当时的口号。——译者

② 鲁道尔夫·斯兰斯基（1901——1952），捷克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6年起任《红色权力报》社长，1928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35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希特勒瓜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斯兰斯基逃往苏联，1944年以前一直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捷克解放时，随红军返回捷克斯洛伐克，任党的总书记，出席过1947、1948和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1951年9月被撤去领导职务，三个月后被捕入狱，1952年被判处绞刑。——译者

③ 哥特瓦尔德（1896—1953），捷克斯洛伐克和国际共运活动家，1929—1945年任捷共总书记，从1945年起任捷共主席，自1948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他于1912年参加革命运动，1921年被选为捷共中央委员，1925年被选为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书记，1938—1945年驻苏联，主持捷共国外领导中心的工作，1945—1946年任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阵线政府副主席，1946—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主席，他是斯大林路线的忠诚执行者，1953年参加斯大林葬礼后回国，患脑溢血逝世。——译者

情报局设在贝尔格莱德了。

在南苏关系的深处两个平行的过程正在进行着，表面上是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完全一致，而实际上对各种问题各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行动。

当南斯拉夫最高领导的大型代表团（铁托、兰科维奇、基德里奇^①、涅什科维奇^②）于1946年夏在莫斯科时，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十分亲密的程度。斯大林拥抱铁托，预言他未来在欧洲范围内将起的作用，与此同时又明显地蔑视保加利亚人和季米特罗夫本人。但不久，围绕着合营公司问题两国开始发生争执和分歧。

隐蔽的摩擦在不断地继续着，这些摩擦非共产党世界是看不见的。但是在党的上层却不断地爆发着：关于苏联侦察机构招募情报人员的问题，这种招募活动在我国的国家 and 党的机构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得尤其厚颜无耻，这主要是出自苏联领导对南斯拉夫革命的蔑视。苏联在南斯拉夫的代表们对南斯拉夫把铁托和斯大林相提并论，反映十分强烈。南斯拉夫同东欧其它国家进行的独立联系以及南斯拉夫在这些国家里威信的提高，他们的反映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

摩擦很快转到经济关系方面上来，特别是当南斯拉夫人认

① 鲍里斯·基德里奇（1919—1953）南共领导人之一，斯洛文尼亚人。1928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党的活动。1941年参加游击队后任斯洛文尼亚部队政治委员，1945年任斯洛文尼亚总理。1946年被派往莫斯科研究苏联经济。同年秋天回到南斯拉夫后，一直领导经济工作。他曾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主张完全由国家计划领导，他死后以上政策有了改变。他是南共的政治局委员。——译者

② 布莱哥耶·涅什科维奇（1907——）塞尔维亚共产党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41年参加铁托领导的游击队。1945年任塞尔维亚总理，原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1952年被撤职。——译者

清楚了：在实现五年计划期间，他们除了和我们进行通常的贸易往来之外，我们并不能从苏联那里得到更多的援助。斯大林遇到我们反抗后却说什么，对友好和同盟国家来说，合营公司的形式是不适宜的，所以答应给予我们各种援助。然而与此同时，苏联的贸易代表利用了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化，也利用了南斯拉夫把苏联看成是无私的不谋霸权的国家这一幻想，而取得了经济利益。

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一样在东欧国家中是少数在粉碎了法西斯侵略的同时没有借助红军作为决定性因素，就实现了国内革命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社会改革比其它国家都走得更远一些，而这个国家又正处在形成的苏联东方集团的最突出的地位。希腊正在进行国内战争，西方指责南斯拉夫在其中起了挑拨作用并在物质上帮助他们，所以南斯拉夫同西方，特别同美国的关系已紧张到了极点。

今天，当回忆往事时，我认为，苏联政府不仅非常满意地在注视这种关系紧张化的进程，甚至还为关系的恶化采取了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只能限制在不伤害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可能做到的范围之内。当莫洛托夫在巴黎听到南斯拉夫打下了两架美国飞机时，他简直要和卡德尔^①拥抱，但同时莫洛托夫又告诉他，不要再打下第三架了。苏联政府并没有直接支持希腊起

① 爱德华·卡德尔（1907—1979）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之一，原为斯洛文尼亚的一个教师，1928年入党，1931年被捕入狱，坐牢两年，1934年至1937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列宁党校学习，并留校授予教授职称，在党校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铁托合作改组南斯拉夫共产党，194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做领导工作，1943年成立临时政府时任副总理，1945年政府正式成立后，连任该职，1951年起兼任外交部长及政府改组委员会主席。他被公认为南斯拉夫优秀的理论家。

——译者

义，所以，南斯拉夫因此是孤独地坐在被告席上唯一的国家。但是苏联也没有采取任何坚决措施去平息这次起义，一直到斯大林觉得这样做对他们有利时为止。

把共产党情报局的地址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决定也是这样，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对南斯拉夫革命的承认。但其背后隐藏着苏联的阴谋：南斯拉夫领导必须忘记对待本国革命的自满情绪，要服从所谓的共产党的国际团结，这实际上意味着承认苏联的霸权，满足苏联的政治及其它官僚们的贪得无厌的要求。

现在我觉得还应该谈谈斯大林对各国革命的态度，包括南斯拉夫革命在内。

由于莫斯科常常在最关键的时刻拒绝支持中国革命、西班牙革命，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拒绝支持南斯拉夫革命，所以人们有根据地认为，总的说来，斯大林是反对一切革命的。然而这种观点是不太正确的。斯大林是反对超出苏联国家利益范围的革命，他本能地感到，在莫斯科以外建立革命中心就是对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垄断地位的威胁。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因此，他只在一定范围内支持革命，即在他还能控制它们时就采取支持的态度，一旦它们开始从他的手掌中溜掉，他就随时准备抛弃它们。我认为，在苏联政府的政策上，至今为止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

斯大林把国内的整个组织制服了，对国外的行动也不能有不同的态度。他在进步及自由的概念同自己国家一个政党的利益之间划了等号，所以在其它国家里他也只能作为指挥者为所欲为。他使自己也服从于他的事业，因此他成了专制和官僚主义、偏见和愚昧无知——即他强加于自己国家的一切劣根——的奴隶。

常言说得好：在剥夺别人自由时，必然要丧失掉自己的自由。

(二)

我去莫斯科的理由是南斯拉夫和苏联在对待阿尔巴尼亚政策方面发生了分歧。

1947年12月底, 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一份电报, 要求南斯拉夫中央派我或者另一同志来莫斯科协调两国政府对待阿尔巴尼亚的政策。

分歧的表现是各方面的, 在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斯彼鲁·纳库自杀之后, 这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已经全面发展起来。南斯拉夫派出更多的各部门的专家去阿尔巴尼亚, 还给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各种食品, 尽管南斯拉夫自己也很不宽裕。合营公司也开始建立起来。两国政府原则上同意这样的观点: 即阿尔巴尼亚应该同南斯拉夫联合起来, 这样做就能使南斯拉夫国内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问题也会得到顺利的解决。

南斯拉夫政府给阿尔巴尼亚援助的条件, 比起苏联政府给予南斯拉夫的条件要优惠得多, 也公正得多。然而, 事情并不在于公正与否, 而在于这种关系的实质, 阿尔巴尼亚的部分领导暗地里反对这种关系。

斯彼鲁·纳库这个人身材不高, 体质很弱, 是个非常敏感、细致的知识分子。他当时负责阿尔巴尼亚政府的经济工作, 他第一个起来反对南斯拉夫, 要求给阿尔巴尼亚独立发展的自由。他的观点不仅在南斯拉夫, 就是在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会里也遇到了坚决反对。反对他最坚决的是科奇·佐治^① (阿尔

^① 科奇·佐治 (1911—1949)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 他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和南斯拉夫游击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阿尔巴尼亚解放后任内务部长。在铁托与共产党情报局关系破裂后, 他被以所谓“托派”和“铁托分子”的罪名处决。——译者

巴尼亚的内务部长，后来因同情南斯拉夫而被枪决)。佐治是阿尔巴尼亚南方的一个工人，老革命家，他被认为是最坚定的共产党员，尽管党的总书记和政府主席是恩维尔·霍查，当然，霍查比起佐治无疑是更有学问和更加机灵的人。霍查也参加了批判纳库的队伍，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并不明确。可怜的纳库在被指责为沙文主义异常孤立的情况下，大概就在开除他党籍的前夕，自杀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死成为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紧张化的起点。

当时，这一事件并没有公开，是后来1948年南阿冲突公开后，恩维尔·霍查把纳库捧上民族英雄的宝座。但是，这件事给两国领导留下很深的印象，从庞杂的共产主义公式的武库里拿出的任何词句，比如说什么纳库是怯懦者、是庸人等等，也消除不了这一深刻的印象。

苏联对纳库死亡的真正原因，对南阿之间的关系都非常了解。在地拉那的苏联使团越来越扩大了。苏联、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南阿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背着苏联的地方，但是应该承认，南斯拉夫政府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并没有同苏联商量。

苏联代表越来越经常地对南斯拉夫有关阿尔巴尼亚的一些措施表示不满。我们发现，恩维尔·霍查周围的亲信同苏联使团的关系却越来越密切了。一些苏联代表的指责也不断提到日程上来：如果南斯拉夫不愿意同苏联建立合营公司的话，那么，为什么又同阿尔巴尼亚人建立了这类公司呢？如果南斯拉夫要求往国内派苏联专家的话，那么，为什么自己还派出专家到阿尔巴尼亚去呢？如果南斯拉夫自己需要外国专家的话，那么他们的人怎么能称之为有资格发展阿尔巴尼亚的专家呢？南斯拉夫作为贫穷和落后的国家，为什么又突然承担起援助阿

尔巴尼亚的任务呢？

由于苏南两国政府之间的这些分歧，莫斯科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了，它想在阿尔巴尼亚取代南斯拉夫的地位。然而在南斯拉夫人看来，这是极不公正的，因为要同阿尔巴尼亚联合的不是苏联，再说苏联同阿尔巴尼亚并没有共同边界。与此同时，也越来越清楚地可以看到，阿尔巴尼亚的上层领导已转向苏联，这突出地反映在他们的宣传上。

所以当苏联政府建议取消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分歧时，贝尔格莱德表示双手欢迎，不过我至今仍不了解，为什么斯大林要我到莫斯科去。

毫无疑问，我给斯大林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爱冲动和性格直爽的人。我想，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把我看成是这样的人。我的这个特点有利于进行关于复杂而棘手的问题的公开争论。

我还认为，斯大林想把我拉到他那边去，以便分裂南共中央并使它屈服。已经站在他一边的有赫布朗和朱约维奇。但是对赫布朗，因为他同王国警察有些不明不白的联系，所以已在背对背地开始对他进行审查，而且他已经被开除中央委员会了。朱约维奇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又是中央委员，但是，他并不属于在为党的统一斗争中和在革命过程中在铁托周围所形成的那个圈子。还在1946年，我随同铁托去莫斯科时，铁托提到我有头痛的毛病，斯大林曾邀请我到他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去休养。但是我并没有去，主要是因为他的邀请没有通过大使馆正式提出，所以我把斯大林的表示只看成随便说的一句客气话。

记得，我是1948年1月8日（大约是这个日子）带有双重心情从南斯拉夫出发到莫斯科去的。我一方面因斯大林邀请我本人，因而从心里感到荣幸，但同时内心深处怀疑他这种做法不是偶然的、对铁托和南斯拉夫中央是不怀好意的。

在贝尔格莱德，并没有给我什么特殊的指示和嘱托。这些指示我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因为我本人是属于南斯拉夫的最高领导层，而我们的共同观点早已定了下来：即苏联领导对我们党已定了的南阿联合的方针应有所克制，不应当讲一些没有分寸的话，也不应该要求我们执行某种其它的特殊路线。

南斯拉夫军队利用我去莫斯科的机会也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是去讨论装备方面和军事工业方面的需要的问题的。当时的总参谋长科查·波波维奇及负责军事工业生产的米埃尔柯·托多罗维奇也参加了这个代表团。当时的军队总政治部主任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捷姆波，也和我们同去，以便了解红军在这方面的经验。

我们是乘火车去莫斯科的，怀着愉快的心情及莫大的希望上路了。但同时也遵循已定观点：南斯拉夫在解决自己问题时要走自己的路，主要靠自己的力量。

（三）

我们过早地把我们的观点透露出去了，那是在南斯拉夫驻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使馆的宴会上说出去的，当时在场的有安娜·波克^①（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和其它一些罗马尼亚政治活

^① 安娜·波克（1893—1960）罗马尼亚犹太族人，母姓罗宾逊。她是1921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党的领导人马赛尔·波克结婚。1924年夫妇两人离开罗马尼亚去共产国际工作。1936年回国后被捕。她的丈夫波克死于莫斯科大清洗运动。她因两国交换政治犯而得重返莫斯科，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导苏联广播电台对罗马尼亚的广播，并协助将苏联境内的罗马尼亚战俘组成以图尔多·弗拉迪米列斯库命名的一个师。后随苏联红军回罗马尼亚，于1947年7月出任外交部长，不久并任命为副总理。1952年被加以所谓“异己分子”的罪名，被解除职务，后指控为“波克—卢卡右倾反党分裂集团”，受警告处分，几年后逝世。——译者

动家。

除了格鲁波维奇大使外，他后来作为莫斯科的拥护者移居到国外，其它所有南斯拉夫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不能成为绝对的样板，因为情况不同了，东欧各国的条件和相互关系各不相同。我当时注意到，安娜·波克一方面很注意听，但保持着沉默，或者勉强表示同意一些说法，她总是力图避开讨论这个敏感的问题。一个罗马尼亚人，可能是波德纳罗什，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而另一个罗马尼亚人，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真心实意地同意我们的看法。我当时就认为，这类的谈话是多余的，因为我坚信，我们的观点都会被转告给俄国人，而他们会把这些观点看成是“反苏”的，“反苏”这个词当时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同义语。与此同时，我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所以我力图缓和自己的说法，强调了苏联的功绩和苏联经验具有原则性的意义。然而，这些好话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强调的问题是，每个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选择自己的道路。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苏联的上层完全不允许有什么差别和进行任何妥协的，特别是在他们共产主义队伍的内部更是如此。

我们虽然只是路过罗马尼亚，但是处处都遇到一些不正常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苏联对罗马尼亚和其它东欧国家的态度：当时这些国家还处于被直接占领的状态之下，他们的财富经过各种渠道已被掠走，主要是经过合营公司。俄国人几乎没有在这些公司里投入什么资金，他们的股金只不过是从德国人手里得到的资本，他们直接把这些资本宣布为自己的战利品。同这些国家的贸易也同与世界其它地方的贸易条件不同，根据是签订过各种专门的协定，按这些协定苏联的购买价格低于世界市

场，可是出售价格则高于世界市场。只有南斯拉夫例外。这些我们是知道的。罗马尼亚的贫困和政府的软弱无能及唯命是听、毫无骨气，使我们更加愤慨。

苏联代表的蛮横无理，目中无人，我们认为这是对人的侮辱。我记得，当驻雅司的苏联官员说出：“看，罗马尼亚的这些肮脏的雅司^①吧，再瞧瞧罗马尼亚人吃的这些玉米面粥吧！真要命！”我们当时听了这样的话，是多么的惊讶不已呵！

他接着还重复了爱伦堡和维辛斯基批评罗马尼亚贿赂和偷盗的话：“他们不是一个民族，只有以此为生的坏职业！”

在那个温暖的冬天，雅司确实象一个肮脏和荒芜的巴尔干的小省分，它那山丘、花园、四面环绕着花厅的房屋都很美丽，然而只是比较熟悉这个城市的人们才能看到它的美。可是我们很了解，苏联的外省的城镇，一点不比雅斯好，可以说还不如雅斯。最使我们恼火的是那种以“优秀民族”自居的自大狂和大国习气。罗马尼亚人对我们的殷勤和尊重态度，使我们更加感到罗马尼亚人所处的低下的地位，与此同时，我们又为自己的独立自主精神感到自豪，因此，我们和他们讲话时就更随便一些。

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态度和想法是“可能的”，是正常现象，因为“俄国人就是如此”，因为他们本来就很落后，又长期脱离了外部世界，而且革命传统也已经消失了。

我们在雅斯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挂着政府专车的苏联火车来接我们，陪同的人还是那位苏联公安机构专门负责南斯拉夫事务的科佐夫斯基上尉。但这次他显得更拘束和闷闷不乐，

① 雅司是罗马尼亚的一个省分，这里泛指罗马尼亚的一切小城市和地区。——译者

这当然不仅是因为在他面前的都是部长和将军，而是因为在我們同苏联“同志”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了某种捉摸不定的、无法解释的、官方的冷淡的气氛。

我们所乘的专车设备豪华、饮食精美、服务周到，但也就仅此而已。对车厢的其它方面我们却尽情地挖苦了一番：巨大的铜制门把手、古老的各种装饰品多得不得了，厕所的马桶之高，坐上去两腿要悬在空中。难道他们想用这些东西表示自己的强大和国家的威力吗？难道有必要如此炫耀自己吗？还有更想不到的事情：在这象沙皇时代一样豪华的车厢里，列车员在他的休息室里用笼子养了一只母鸡，还在笼里下了蛋。这位低工资的、穿着破旧的列车员说：“有什么办法，同志们！工人总得想点办法过日子，家庭人口多，生活艰难。”

南斯拉夫的火车虽然也不是全能正点运行的，可是在这里，火车晚点几小时，并没有人着急，工作人员只是不缓不慢地回答你说：“总会到达目的地的。”

俄国总是使用一切办法要表现俄罗斯人的及其民族精神的一贯传统，他尽力在对抗工业化所需要的紧张、繁忙的作风并发挥行政当局的无限的权力。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积雪埋住了房屋，只露出一些屋顶，周围依然一片被战争破坏和令人恐惧的景象，沿途都是被烧毁的車站、小木房子，正在清扫道路的都是穿着靴子、戴着头巾的妇女，人们只有一杯开水和一块黑面包。

在这饥饿和荒凉之中，只有基辅这次还给我留下了美丽、清洁、文明、有审美力、追求时髦事物的印象。虽然由于夜幕笼罩着一切，我们看不见第聂伯河和辽阔平原上的风景，但是基辅却非常象贝尔格莱德，是一个前程无限、拥有百万人口的、人民精心而有计划地建造起来的大城市。在基辅我们只停

留了片刻，等候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任何乌克兰领导人都没有来迎送我们。这是一个披着银白霜雪的夜晚，也是披着忧伤的黑纱的夜晚。只有我们的车厢灯火辉煌，在这破坏和贫穷的海洋里，只有我们的车厢里到处都很舒适，应有尽有。

(四)

我们到达莫斯科几小时之后，当我们正在和南斯拉夫大使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促膝谈心时，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苏联外交部问我是否觉得很疲倦，并说斯大林当晚就想接见我。事情办得这么快，对莫斯科来说是少见的。外国共产党人来这里后总要等很长时间，所以在他们中间流行一句话：来莫斯科容易，离开可就难了。如果我真已精疲力竭的话，我也会举双手同意马上答应斯大林的邀请。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很羡慕我，科查·波波维奇和托多罗维奇^①一再提醒我，不要忘记他们来这里的目地。我是和他们同路来的，我借一路同行的机会，已经详细而具体地了解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我真正地因能够得到斯大林接见而高兴，但同时我也清醒地考虑着这样匆忙行事的原因。在我同斯大林以及其它苏联领导人度过的这个夜晚，这种双重的心情始终在支配着我。

和往常一样，大约晚上九点钟我被送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等着我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我知道日丹诺夫在政治局里是负责同外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的。

在通常的寒暄之后，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谈到正事上来，他

^① 米雅尔科·托多罗维奇，(1913—)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从事青年运动时期入党。第二次大战时期参加游击队。解放后在国防部工作，历任特需供应局长，农业部长和农林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译者

说：“在你们的阿尔巴尼亚那里，中央委员在自杀！这太不好，太不好了！”

我解释说：“纳库·斯波鲁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联系，他在阿尔巴尼亚的中央内部把自己孤立了。”我还没有谈完，斯大林出乎意料地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这时，他把右手的手指并拢起来，放到嘴边，作出好象要吞食下去的动作。

我对斯大林的手势和他表现感情的方式大吃一惊，几乎到了目瞪口呆的程度。我不知道我的心情是否反映在我的脸上了，但我还是力图把他的话当成玩笑，看成是斯大林过分简单和形象地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方法。所以我又解释道：“我们不是要吞并阿尔巴尼亚，我们是要进行联合。”

这时，莫洛托夫插话说：“这就是吞并的意思！”

斯大林还做着刚才的那个手势，说道：“是的，是的，就是吞并。但是我们同意这样做，你们要去吞并阿尔巴尼亚，而且越快越好！”

整个谈话气氛，尽管使用了这种表达方式，还是真诚的和友好的。就连莫洛托夫说出那句吞并的话时，也表现出对他来说是少有的、半开玩笑的亲切语调。

和阿尔巴尼亚保持亲近的关系和进行联合的问题上，我是抱有诚意的、当然是革命的动机。我和其它许多人一样，认为在阿尔巴尼亚政府确实是自愿的条件下，这个联合不仅给南阿两国带来直接的利益，而同时又会结束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传统的积怨和冲突。在我看来，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一措施会把数量众多，居住集中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合并到阿尔巴尼亚去，那时他们就会已成为南阿联邦中的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南斯拉夫如果要解决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问题，

除此之外，其它一切可能性都不现实，因为简单地把南斯拉夫这块领土连同那里的阿尔巴尼亚居民交给阿尔巴尼亚的做法，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会遇到不可抗拒的抵制。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不能对阿尔巴尼亚人要求合理的联合提出什么异议，况且我也曾向意大利提出给南斯拉夫人以同样的权利。对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我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它只能巩固我的这个想法：阿尔巴尼亚人，特别是北方的阿尔巴尼亚人，按其性格和生活习惯都特别象我所出身的门的内哥罗人，他们的生命力和维护自己民族传统的意志，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放弃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方针而去同意斯大林的观点。然而斯大林的话马上在我脑子里引起了两种想法：第一，南斯拉夫实行的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上出了差错；第二，苏联同波罗的海国家的联合问题实际上是前者吞并后者，莫洛托夫的话就是证据。

这两种想法汇合在一起，对我成了很大的思想负担。

也许，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政策方面确实有阐明得太不明确和执行得不完善的地方，但不管怎样，这完全不是“吞并”的行为。这时我脑中又出现了一个想法：也许这一政策不符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愿望，而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把他们的愿望和整个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愿望等同起来了。纳库为什么自杀了？与其说他是“庸人”和“民族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更象一个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也许，阿尔巴尼亚人也象我们南斯拉夫人一样，在同苏联的关系上，愿意保留自己国家的独立性？如果违背人民的意志，利用阿尔巴尼亚的孤立和贫困而实现联合的话，那么，这会不会导致不可挽救的冲突和困难呢？阿尔巴尼亚人是具有古老传统的一个整体，但作为一个民

族，他们还很年轻，所以他们才有这种不可抗拒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他们会不会把联合看成是失掉自己的独立性和放弃自己民族独特的风格和生活方式呢？

当我脑中出现第二个想法时——即苏联已经吞并了波罗的海的国家，我马上把这个想法和第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我在不断重复地确信：我们南斯拉夫人绝不能和阿尔巴尼亚通过这样的途径去进行联合。至于说其它什么帝国主义（如德国）要镇压阿尔巴尼亚，把他变成反对南斯拉夫的基地，这种危险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

斯大林的话又把我拉回到现实进行的谈话之中。他说：“在您看来，霍查这个人怎么样？”

我避免给予直接和明确的回答。但是斯大林说出的意见恰好表达了南斯拉夫上层对霍查的看法，他说：“他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庸人，对吗？对，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在他们之中，大概最坚定的人是佐治吧？”

我对他提的这一问題给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结束了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谈话，时间连十分钟都不到。最后，他说：“我们之间没有分歧，您亲自替苏联政府起草一份给铁托的电报，明天交到我这里来。”

我怕自己没有听懂，又问了一遍，他又重复让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起草一份给南斯拉夫政府的电报。

起初，我把这看成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是对南斯拉夫关于阿尔巴尼亚政策的赞许的最高表示。但第二天我在起草这份电报时，我又想到：将来他们会不会利用这份电报反对我国政府。所以我谨慎和简短地只写了几句：“杰拉斯昨天抵莫斯科，在当晚会见中，双方认为，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这份电报并没有拍到南斯拉夫，但在以后的莫斯科同贝尔格莱德冲突中也没有被利用反对南斯拉夫。

其它问题的讨论也没有进行多久，而且也都是些次要问题，如关于共产党情报局设在贝尔格莱德，情报局的机关报，铁托的健康，诸如此类。

我趁机提出关于给南斯拉夫军队和军事工业提供装备问题。我指出，我们在同苏联代表接触中常常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借口“军事秘密”拒绝给我们这种或那种设备。斯大林站起来，喊道：“我们同你们没有什么军事秘密。你们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你们没有什么军事秘密。”

他走到办公桌旁边，叫布尔加宁听电话，简短地命令说：“我正在这里接见南斯拉夫客人——南斯拉夫代表团，你们应该立即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只进行了半小时，接着我们就乘车到斯大林别墅去参加晚宴。

（五）

我们乘坐的是斯大林的轿车，似乎还是那辆我曾和莫洛托夫在1945年坐过的那辆车。日丹诺夫坐在后边的座位，在我的右侧，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坐在我前排的折叠座椅上。途中，斯大林把玻璃隔板上的小灯开了^①，灯下面挂着一块怀表，我看时间是二十二点钟。他就坐在我的前面，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已经驼了的背，他那满是条条皱纹的老年人的后脖筋子卡在元

① 苏联为高级领导装配的轿车上，在司机座位和后面座位之间，装有玻璃隔板，以便于首长们谈话时，不被司机听见。——译者

帅服坚硬的领子上面。我当时想：这就是我们时代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助手也都在这里。如果在我们身边有一颗炸弹爆炸，把我们炸得粉碎的话，那么这样的惨祸将会是多么轰动世界的事件啊！这是突然出现在我脑中的可怕的念头，它如此出乎我的意料，使我自己感到震惊不已，于是我怀着忧伤而同情的心，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位老爷爷，他的整个一生的精力，直到今天，都在关怀着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胜利和幸福。

为了等待其它客人的来临，斯大林、日丹诺夫和我在过厅的世界地图前面停了下来。我又一次看到用蓝铅笔勾出来的斯大林格勒，斯大林又注意到我们目光所向，而我又一次发现，这使他愉快。日丹诺夫也看到我们交换了目光，并且插过来说：“这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开头。”斯大林什么也没有说。

据我记忆，当时斯大林正在地图上寻找哥尼斯堡，因为他想要把这个城市改名为加里宁格勒，我们的眼光在列宁格勒周围寻找，这一带的地名从叶喀琪琳娜时代起，都是用德文名字。斯大林不喜欢德文命名，他对日丹诺夫说：“都改过来，莫名其妙，这些地方怎么至今还用德文名称！”

日丹诺夫拿出一个小本子，用铅笔把斯大林的指示记了下来。

此后，我同莫洛托夫一起到地下室去上厕所，地下室有一个厕所，里面有几个马桶间和一排便池。莫洛托夫边走边开始解裤子扣，还说：“我们把这个称之为装货前要把旧货卸出去！”

我虽然长期坐过牢，监狱里的人们对有些事不怎么注意羞耻，但是我在莫洛托夫这位比我年长的人面前感到不好意思，于是我进了马桶间并把门关了起来。

然后，我们进了餐厅，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日丹

诺夫^①和沃兹涅先斯基^②已在那里等候着了。后边两个人在我的回忆录中还是新出场的人物。

日丹诺夫个子也不高,留着褐色的短胡子,前额很高,鼻子尖尖的,脸色红红的,一种病态的红润。他是受过教育的人,在政治局里算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我认为,他虽然也具有人所共知的狭隘偏见和公式化等特点,但他的知识面却相当广泛。他虽然什么都懂一些,甚至包括音乐在内,但是我不觉得他在某一个科学领域中具有较渊博的知识。他是非常典型的唯智论者,他多方面的知识是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得到的。再说,他是一个无耻的文人,一个犬儒主义者,这就更令人讨厌,因为在这样的知识分子气质后面往往可以隐藏着一个对待从事文艺和思想领域工作的人们的态度似乎“宽厚”的暴君。那时正好是苏共中央作出关于文学和艺术领域问题决议的时候,也就是说,对在战争期间从官僚主义的党的监督下滑出来的最低限度的选择题材和形式的一点点自由遭到残酷冲击的时期。那天晚上,日丹诺夫讲了一个最新笑话,讲的是列宁格勒如何领会了他对作家左琴柯的批评,他说:这位作家的食物卡^③被收走了,一直到莫斯科出面干涉之后,收走食品卡的人

① 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日丹诺夫(1896—1948),从1935年起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9年又选为正式委员。负责思想工作,在文艺创作中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针,负责战区反对西方文化影响的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列宁格勒保卫战领导人之一。在创建共产党情报局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译者

②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大清洗运动中,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整个苏联经济计划和调整工作。1939年被任命为副总理。卫国战争期间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41年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1948年为正式委员。1949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中,因他写了一本有关经济政策的书,受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逮捕入狱并被处决。——译者

③ 苏联食品卡和我国的粮、油票和副食品本相同。拿走了食品卡,就没有面包和其它供应了。——译者

才宽宏大量地还给了他。

沃兹涅先斯基是苏联计委主席，他年纪不大刚过四十岁。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一头金色的卷发，有着突出的颧骨，高高的前额。他给人的印象是穿着整洁，有文化修养，说话很少，性格内向，他总是愉快地微笑着。我在战争期间读过他写的关于苏联经济问题的著作，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作者是一个严肃而深思熟虑的人。后来这本书在苏联受到批判，沃兹涅先斯基从肉体上被消灭了，其中的原因至今还不清楚。

我相当熟悉沃兹涅先斯基的哥哥，他原来是大学教授，当时正好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的教育部长。

1946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同沃兹涅先斯基的哥哥之间，有过非常有意思的争论。我们共同得出一个结论：被官方承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狭隘和片面的。在另一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更是不谋而合的，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确切些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后，正在出现一些新的现象，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出现了一些在理论上还没有研究过的一些新变化。他那漂亮而聪明的脑袋大概是在疯狂的清洗中被砍了下来。

晚宴一开始，不知是谁，可能是斯大林本人建议让每个人都猜猜当时的气温是在零下多少度，然后作为惩罚，错说了多少度就得喝几杯酒。我幸亏在饭店里看了温度表，又因夜里温度下降所以又减下了几度，因此只错了一度。记得贝利亚说错了三度，还说这是他故意说错的，这是为了想多喝几杯酒。

晚宴这样开始，使我的头脑中出现了异端的想法：即这些关在自己小圈子中的人们，还可以为了多喝酒想出其它一些毫无内容的借口，例如猜什么餐厅有多长，桌子有多重，等等。

鬼知道，他们也许确实已经这样做过了。象这类用猜测温度而决定喝酒数量的做法，使我马上想到，这些拥簇在他们年老的领袖周围并决定着人类命运的苏联上层人物的生活是多么脱离人民，多么空虚和多么贫乏。我还回想起，俄国的沙皇彼得大帝也曾经和自己的近臣们举行过类似的宴会，他们也是尽情地大吃大喝，直到醉滥如泥，不省人事的程度，并且在他们的宴会上决定着俄国及俄罗斯人民的命运。

宴会过程中我始终摆脱不了这种生活空虚的感觉，尽管我自己总想不去考虑它。斯大林的衰老更加深了这样的印象。虽然我尊重他，热爱他，而且我还在不断地培养自己对他的这种感情，然而我无法从我的头脑中驱出我的异端的想法。

我觉得他的衰老中，有某种悲哀和病态的因素。

然而这悲哀是看不见的，这是因为我想到连这样伟大的人物也会衰枯、殒死而感到悲哀。至于病态的因素在他身上是时时刻刻都表现出来的。

斯大林早年就好吃好喝，可是现在他表现的贪吃的样子，仿佛是害怕他再也得不到那些他喜爱的美食佳肴似的。但酒喝得少了，他谨慎到似乎喝每一口酒时都在考虑是否会危害他的健康。

他思维能力的衰退更加明显。他总是喜欢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西伯利亚流放、高加索的童年等等。谈到一些眼前新事物时，总要和往事联在一起进行比较，例如说：“对，记得过去也有同样的情况……”

这两三年中，他的变化实在太太，简直使人无法理解。我在1945年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个灵活喜动的人，思想活跃而新鲜，具有幽默感。那时战争正在进行，虽然，斯大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战争上面，紧张到了极点，已经

把它用尽了。现在那些毫无内容和平庸的玩笑会引起他发笑，而我讲的一个政治笑话，说的是斯大林如何让丘吉尔和罗斯福上了当的故事，他根本没有听懂，而且还象一般老年人那样生气了。我看出，在座的人都感到窘促和有些难为情的样子。

只有一点没有什么变化，他还是那个粗暴、尖刻、多疑的斯大林。他连莫洛托夫的话也要打断，可以感觉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了。所有的人都奉承他，在他尚未表态之前每个人都避免谈出自己的意见，他一旦表了态，就都急忙地表示赞成。

和过去一样，谈话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上。我的回忆也只能按这个方式来安排。

斯大林提到原子弹时说：“这是很厉害的东西，厉害呀！”他的脸上露出赞叹的神情，这神情明显地表示：他在没有得到这个“厉害的东西”以前是不会甘心的。但他没有提到苏联是否已有原子弹，或正在研制的过程中。

原来，当一个月后我和卡德尔见到季米特罗夫时，他保密地告诉我们，俄国人已经有了原子弹，而且比美国投到广岛的那颗原子弹还厉害。我现在想，季米特罗夫的话与事实不符，俄国人当时还处在研制原子弹过程中。不过，既然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就如实也写在这里。

当天夜里和后来在接见保加利亚代表团时，斯大林都讲过，德国的分裂状态要持续下去：“西方要把西德搞成他们那个样子，我们要把东德建成我们这样的国家！”

他的这一思想是新的，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还来自苏联对东欧的整个方针。1946年夏天，斯大林和其它苏联领导人在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面前宣布整个德国应该是我们的，也就是说苏维埃的，共产主义的。这一声明我是不理解

的。当时我问了一位在座的同志，我说：“俄国人打算怎样实现这点呢？”对方回答：“这点我也就知道了！”

我想，就是宣布这一声明的人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们不过是被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而且寄希望于西欧的经济及其它方面衰落和崩溃而忘乎所以了。

宴会快结束时，斯大林突然问我：“为什么在南斯拉夫党内犹太人很少，而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解释说：“在南斯拉夫，总的来说，犹太人不多了而且大部分属于中层。唯一杰出的犹太党员是彼雅杰^①，他自己认为他与其说是犹太人，还不如说是塞尔维亚人。”

斯大林回忆说：“彼雅杰？矮个子，戴眼镜？想起了，他来过我这里。他的职务是什么？”

我回答：“中央委员，《资本论》的翻译。”

他打断我的话，带着挑衅般的神情大笑起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里没有犹太人！你们是反犹太主义者！杰拉斯，您也是反犹太主义者！”

他的话和他的笑当然应该按相反的意思去理解，我懂得这是他的反犹太主义的一种表示，同时也逼我表示自己对犹太人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犹太人问题的看法。我没有说话，只是笑。要我表态很容易，因为我从来都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我把共产党人只分为两类：好的和不好的。不过，斯大林自己很快就放弃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已挑衅地提

^① 莫萨·彼雅杰（1889—1957）南斯拉夫的党的理论家。1920年南共党的创始人之一。地下党时候在工会中宣传共产主义工作，被捕入狱，被判处徒刑20年。服刑期间，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次大战时期和杰拉斯一起在门的内哥罗起义。战后任国民议会、后为联邦人民议会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联邦人民议会主席。他是南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五十年代病故。——译者

出了这一难以启齿的问题，也就感到满足了。

坐在我左侧的是沉默寡言的莫洛托夫，右侧是好说话的日丹诺夫。日丹诺夫谈起他同芬兰人之间的来往，以佩服的口气谈到他们交付赔偿物资时十分准确，他说：“交货准时，包装出色，质量优等。”他最后说：“我们犯了错误，没有占领这个国家，要是占领下来的话，那么，现在一切事都好办了。”

斯大林说：“对，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过分顾虑美国人会有反应，可是他们连手指头也没有敢动一下。”

莫洛托夫说：“哼，芬兰是一个不好咬的小胡桃！”

在这段时间里，日丹诺夫正在和音乐家在一起开会，要做出一个有关音乐的“决议”。他喜欢听歌剧，并且问我：“你们南斯拉夫有歌剧院吗？”

我对他的发问感到奇怪，我说：“南斯拉夫有九个歌剧院。”同时我在想：他们对南斯拉夫的了解实在太少了，看来，他们只把南斯拉夫当作地理概念才发生了兴趣。

日丹诺夫是唯一只喝桔子汁的人，他向我解释说，他有心脏病。我问他：“这种病的后果严重吗？”

他以他惯有的微带讽刺的口气微笑着说：“我随时都可能死掉，也可能活很长时间。”从他的表现，确实可以发现，他太容易激动，他的反映是神经质的，过分敏感的。

当时苏联新的五年计划刚刚通过，斯大林没有明确地、专门对谁地随便说了一句：必须提高教员工资。然后对我说：“我们的教员队伍特别好，但是他们的工资水平太低，必须想点什么办法。”

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这时我也想到我们南斯拉夫的教育工作者工资太低，生活条件太坏，而我们又无力帮助他们。

沃兹涅夫斯基一直不说话，他的举止一直象一个在长辈面

前的小字辈。斯大林对他只说过一次话：“有没有可能在计划之外给建设伏尔加——顿河运河筹出一部分资金来？这件事太重要！我们应该找出资金来！从军事观点看，这件事也很重要，万一打起仗来，我们有可能被挤出黑海，因为我们的海军力量太弱，而且还长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那么，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呢？你们想想，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如果我们有了这条运河，那么我们黑海舰队就可以开进伏尔加河，那时海军的帮助有多大呵！所以这条运河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沃兹涅夫斯基同意要找出资金，拿出小本子，记下了。

我早就对两个问题（这几乎是我个人感兴趣的问题），很想知道斯大林的看法。

一个是理论问题：即无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还是在其它书籍中，我没有找到对“人民”和“民族”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的解釋。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党人中间早就被看作是民族问题的专家，所以我询问他的意见，并且还补充说，在他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书中也没有说这个问题。那本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表的，从那时起，大家公认，这就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点。

对我的问题，首先回答的是莫洛托夫：“人民和民族是一个概念。”

但是斯大林反驳说，“不对，瞎说！这是不同的概念。”并解释道：“民族，这是大家所知道的概念：是具有某种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而人民是特定民族的劳动人民，也就是说，有着共同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劳动者。”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他说：“这是伊里奇的观点，这本书是他校定的。”

另一个问题和陀斯妥也夫斯基有关系。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在许多方面把陀斯妥也夫斯基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的作家,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攻击。

斯大林的回答很简单:“他是个大的作家,也是个大的反动派。我们不出版他的著作,因为对青年人的影响很坏,但他是个大作家!”

我们的话题转到高尔基。我说,我认为无论从方法还是从反映俄国革命的深度来说,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不谈方法问题,说道:“不对,他的最优秀作品是早期写作——《奥库罗夫小城》、他的短篇小说和《福马·高尔杰也夫》。至于反映俄国革命问题嘛,那么在《克里姆·萨木金》这本书里没有写革命,书中只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叫什么来着?柳蒂科夫还是柳托夫?”

我改正他说:“库图佐夫。柳托夫是另一个人。”

斯大林继续说:“对,库图佐夫!革命在这本著作中表现得十分片面、非常不够,就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他的早期作品也强得多。”

我已经很清楚,斯大林和我彼此都不了解,我们的爱好、情趣也太不一样了。我过去也听过一些大作家的意见,他们和斯大林一样,认为斯大林指出的那些作品是高尔基的最优秀的著作。

在谈到苏联现代文学时,我也或多或少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也认为肖洛霍夫最好。斯大林说:“现在有比他好的。”并说出两个人的姓名,其中有一个是女作家。

关于法捷耶夫的《青年进卫军》一书的争论,我避而不谈。当时开始批判这本书的主人公的党性不强,而我对本书的批评恰好相反。我认为太公式化、太肤浅、太平庸。我对亚历

山大罗夫的《哲学史》也是持这种看法。

日丹诺夫讲了一下斯大林对康·西蒙诺夫爱情诗的评价，斯大林说：“这诗只要打印两份就够了——一份给她，第二份给他！”斯大林声音嘶哑地笑着，其它的人都跟着大笑起来。

晚宴上少不了贝利亚的下流的玩笑。他们逼我喝了一杯胡椒酒^①。贝利亚咧开嘴笑着说，这种酒对生殖腺有不良反应，他还用最粗野和下贱的话形容了一番。在贝利亚讲话过程中，斯大林仔细地看着我，正要大笑起来。可是当他看到我那副不耐烦的样子，他的表情也严肃起来。

就是不出此丑行，我也摆脱不了要把他同贝尔格莱德的王国警察局的警察署长乌伊科维奇相比较，他们是如此相象，使我简直感到自己已被乌伊科维奇——贝利亚的肥大而湿冷的魔掌抓住了。

我觉得在这长达六小时的晚宴上，最重要的是围绕着谈话内容（不管与谈话有关与否）的那种气氛。在大家所说的话的背后，总是感到有着什么更为重要的内容，某种必须讲出来，但大家谁都不会也不敢讲出来的事情。那种拘谨谨慎的谈话方式，对所谈的话题的精心选择更加使你感觉到这些内容，仿佛这些没有讲出来的话，人们是都可以听得见了。我的心里已经准确无误地知道这一内容：即他们对铁托和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要把我拉到苏联政府方面去。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最突出的是日丹诺夫，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气氛，表现在和我谈话时流露出来的那种真挚亲密的关系。贝利亚用他的大青蛙式的半睁着的眼睛看着我，一种自我满意的嘲笑的表情一直挂在他那四方的肉乎乎的嘴唇

① 一种用胡椒浸的白酒，通常是为治感冒用的。——译者

上。而在这一切人和事的上面屹立着斯大林——殷勤周到、非常稳重的和非常冷酷的斯大林。

话题和话题之间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我内心的紧张和在我周围的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了。我很快就选好了防御策略，显然在这以前这种策略在我的脑子里已经下意识地形成了：我准备直截了当，非常简单地对他们说：我看不出来，南斯拉夫和苏联领导人之间有什么分歧，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诸如此类……我虽然在关键时刻从来没有动摇过，但现在一种强烈而固执的对抗情绪冲击着我的心。我有自知之明，如果斯大林和其它人逼我作出道德上的选择：要他们还是要自己的良心，具体表现为要他们的党还是要我们的党，要南斯拉夫还是要苏联的话，我很容易从防御状态转到进攻状态。为了事先掌握主动权，我几次好象是无意地提到铁托和南共中央委员会，但我提时特别有分寸，使对方难以开始自己的谈话。

斯大林拿出了拉私人关系的拿手好戏，但这是徒劳的。他想起1946年他曾托铁托邀请过我来苏联养病，于是问我：“您为什么没有来克里米亚？为什么拒绝了我的邀请？”

我对这个问题是有所准备的，但对斯大林没有忘记此事我又一次感到不快和奇怪。我解释道：“我本来等待苏联大使馆发出邀请，我觉得冒昧地从命给您添麻烦是很不便的。”

斯大林继续考验我说：“那里的话，有什么麻烦呢？是您自己不愿意来！”

我退回我的堡垒，——冷静地克制着自己，缄默着。

就这样，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斯大林和他的那一伙冷酷而善于暗算人的阴谋家（我确实把他们看成是这样的人）无疑已感觉出我的反抗。而我希望达到的目的正是如此。我避开了他们，他们也没有敢激起我的反抗。他们当然认为，他们没

有预先安排好就摊牌当然是走错了棋。我却识破了他们可耻的把戏，我感觉到内心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如此巨大，它甚至于可以抛弃我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一切。

晚宴以斯大林举杯建议为纪念列宁而干杯结束的。他说：“为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我们的一切，干杯！”

我们都站起来，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干了杯，我们这些醉意朦胧的人们很快把这一气氛忘记了，而斯大林脸上的表情还是那样激动、庄严，而同时又是那么阴沉。

在我们宴毕回去之前，但已离开餐桌时，斯大林打开了一架巨大的自动唱机。他还企图跳个高加索舞，看得出来他的节奏感还不错，但他很快就停下来不跳了，并苦恼地说：“老了，我已经是个老头子了！”

他的助手们（暂不称他们为近臣）都来安慰他说：“不，不，您怎么能这么说！您的气色很好，您的举止动作都还很健壮，真的，象您这样的年纪……”

后来斯大林又放一张唱片，花腔女高音的颤音是用狗的吠叫声伴唱的。他狂喜不已，哈哈大笑，高兴极了。当他发现我的惊奇和不满的表情时，他仿佛表示歉意似地解释道：“不，这花招想得很有点聪明，有点鬼聪明。”

我走时，大家还都留在那里，但也已经准备动身回家了。的确，在这么长的宴会之后，一切的话都说尽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没有讲为什么要举行这个宴会！

（六）

没有过两天，我们被叫到总参谋部去谈谈我们有什么愿望

和要求。

还在火车上我就提醒科查·波波维奇和米埃尔卡·托多罗维奇，依我看，他们提出的要求过高，很不实际。我特别不能想象，如果俄国人连建立民用工业都不愿意认真帮助我们，他们怎么会同意帮助南斯拉夫建立军事工业呢？要求援助我们海军舰队，我们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海军舰队，他们自己还没有呢。要是说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统一体，部署在亚得里亚海的舰队是苏联的还是南斯拉夫的，都无所谓，——这一道理是说服不了我的，因为恰好在这个团结一致的背后有着很多裂痕，更不用说，苏联政府对一切不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都不信任，而且很明显，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本国利益。然而，他们所提出的这些愿望，贝尔格莱德已经审查和批准了，我无奈，只好支持他们。

主持这次会谈的是布尔加宁。出席会谈的有高级军事顾问，包括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①元帅。

首先，由我概括地谈了我们的需要，然后由托多罗维奇和波波维奇作了具体补充。

苏联代表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仔细询问了我们的具体要求，并都一一记下来了。

总参谋部是一座外表简陋的大楼，它的缺陷试图用豪华的装饰品、镀金设备和漂亮的窗帘弥补起来，但于事无补，效果不大，我们离开这座楼时非常满意，确信，我们的事情已开了头，不久，真正的具体工作即将开始了。

表面上也是如此：不久，托多罗维奇和波波维奇被叫去参

^① 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苏联元帅。1945年2月任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员，同年6月任这支军总司令员，1950—1953任苏联陆军部长，1953年以后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译者

加各种会议。可是，形势又起了变化，一切都停止了，苏联代表告诉我们，“出现了复杂情况”，因此必须等待一下。

我们已经明白：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们也并不感到奇怪。不管怎样，把谈判拖下去，只能使我们对苏联现实及对莫斯科跟贝尔格莱德的关系问题上持更加强烈的批判态度。况且，我们没有工作了，所以不得不把时间消磨在各种晚会和莫斯科古老的但是第一流的戏院里。

任何苏联公民都不敢来拜访我们，因为我们虽然来自共产主义世界，但还是属于外国人的范畴，而苏联的法律规定，苏联公民不得接触外国人。我们的一切接触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这使我们非常恼火和感到受了耻辱，因为在南斯拉夫并没有这些限制，对苏联的代表和公民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也迫使我们对他们做出应该持批评态度的结论。

我们的批判还不是综合性的，只是由许多具体事例组成的。伏克曼诺维奇——捷姆波发现苏军的官兵宿舍缺点很多就公开提了出来。科查·波波维奇和我因在莫斯科饭店住单人套间太寂寞想搬进一套两人住房间，但在一位“电工”来把这套房子收拾一番之前，不让我们搬进去。我们这才明白了，他是在安装窃听器。莫斯科饭店虽然是一座新盖的最大的饭店，但里边的设备总是出故障：房间很冷，水管漏水，从东德运来的浴盆不能用，因为下水道不通，水都流在地板上。浴室没有钥匙，这成为科查·波波维奇开心的借口，按他的说法，建筑师懂得，钥匙可能被丢失，所以把浴盆放在门边上，使洗澡的人能用脚顶住门。我常以留恋的心情，回想我在1944年住在“大都会”饭店小房间的情景。那里的设备虽然陈旧，但很结实和好

用，保管得好，上了岁数的工作人员会说英语和法语，待人有礼貌，态度和气。

有一次我听见浴室里有人发牢骚，我一进去，看到两个工人，一个工人在修理顶棚上的电线，他站在另一个工人的肩膀上。

我问：“这是怎么搞的，同志们！为什么不搬个梯子来？”

工人埋怨说：“我们向管理处提了多次想要个梯子，意见都白提了，我们就一直这么凑合着干活，真受罪！”

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发现“美丽的莫斯科”的大部分是闭塞的大村庄，无人管理也没有建设。我们的司机姓潘诺夫（我从南斯拉夫给他带来一块手表送给了他作纪念，我们之间建立了友谊）。他怎么也不相信，纽约和巴黎的汽车会比莫斯科多，但他对苏联的新型轿车质量不好也表示不满。

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参观沙皇的陵墓^①时，一位导游的姑娘带着民族自豪感滔滔不绝地讲“我们的沙皇”。俄国人的优越感处处都表现出来，而且是以一种畸形和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就这样，我们每走一步，都发现苏联现实生活中我们前所未见过的情景：落后、原始、沙文主义、大国主义，与此同时，当然我们也看到，他们正在力图克服这些缺点，使各方面都能转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的超人的英雄气概。

因为我们知道，在苏联领导人和政治机构顽固不化的头脑里，任何小小的批评意见都立即被看成是出自反苏的立场，所以我们自然不去接触俄国人，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又由于我们是负有政治使命来到这里的，所以我们之间也互相提醒

^① 俄国沙皇和名人如普希金等人的大理石的灵柩都安放在教堂里，实际并非陵园。——译者

不要有什么“不妥”的行为和“不慎”的言论。我们处在这种被隔离的状态中，于是我们采取了有组织的形式来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记得，我们为了对付窃听器开始注意自己在饭店和办公室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谈话时总是开着收音机。

苏联代表必然注意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同他们的紧张关系和互不信任的气氛逐渐增加起来。

这时列宁的水晶棺从外地运回来了，战争期间把它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天早晨我们也去瞻仰列宁墓。本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瞻仰本身又激起我们一种新的前此未有的恶感。在我们缓缓地走下陵墓时，我看见一些戴着头巾的普通妇女在胸前划十字，仿佛她们来了圣者的木乃伊^①的前面似的。不过，我自己也仿佛被一种从少年时代已被遗忘的神秘的感情控制着。况且，周围的一切布置——花岗石的结构、肃穆笔直的哨兵、投到列宁身上的看不见从何处来的微弱的光线，以及列宁的遗体本身，已经干枯、白得象石灰一样，头上有几根稀稀拉拉的头发，似乎是人为地贴在上面去的——一切都给予人们的正是这种神秘的感觉。尽管我对列宁这位天才异常尊敬，但在列宁的遗体旁边造成的这种神秘气氛，在我看来，则是很不自然的，而主要是反唯物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

当时，如果我们就是忙得不可开交的话，我们也想去看看列宁格勒，这个美丽的革命城市。为此我拜访了日丹诺夫，他欣然同意我们去列宁格勒参观。不过，我也注意到他仍然很拘谨，会见的时间还不到十分钟。虽然如此匆忙，他也没有忘记问我对季米特罗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有关他去布加勒斯特

^① 东正教的大主教死后封为圣者、圣徒，将其尸体做成木乃伊放在一个木盆子里，基辅这种教习尤甚，基辅大教堂的地下室里存放着许多这样干尸体，朝拜的信徒们在尸体面前划十字。——译者

访问时发表的声明有什么想法。在季米特罗夫这次去拜访期间，他提出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协调工业计划和建立关税同盟的主张。我说，我不喜欢他这个声明，因为他过早地和孤立地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系确定下来了。日丹诺夫对这一声明也不满意，可他未说出原因，但不久这一原因暴露出来了，我在后边还要专门讲这个问题。

大约在这时南斯拉夫的一位外贸部代表波格丹·茨尔诺勃尔尼亚也来到莫斯科。他同苏联有关机关谈判时，主要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他一定要我和他一起去找当时的外贸部长米高扬。^①

米高扬接见我们时，态度冷冰冰的，很不耐烦。我们的要求之一，是希望俄国人把他们答应交给我们的那些留在他们占领区的火车车厢，这些车厢中许多是从南斯拉夫拉走的，而俄国人反正也因为苏联的轨道比我们的宽，无法使用。米高扬问我们：“你们考虑过没有，按什么条件，什么价格我们把这些车厢交付给你们？”

我回答说：“很简单，你们作为礼物赠送给我们！”

他简单明确地说：“我管的不是送礼，我管的是贸易。”

我和茨尔诺勃尔尼亚坚持要修改关于出售苏联影片的协定，因为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协定，对南斯拉夫非常不利。我们的努力也失败了，米高扬借口说，东欧国家也会以此为先例来修改协定，所以，断然拒绝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① 阿那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1895—1978），亚美尼亚共产党人。他在长期担任苏联对外贸易和食品工业部长期间，表现了非凡的才能。1926年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为正式委员。1937年以来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据许多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回忆时反映，他与大清洗关系最少，对他也印象不错。斯大林死后，他一贯支持赫鲁晓夫。世界舆论公认他是“明智的共产党人”，1958年访问之后，在西方博得了很高的声誉。——译者

然而，当谈话转到出售南斯拉夫铜矿问题时，他的态度马上变了，他表示愿意预付任何数量的外汇或实物购买我们的铜。

我们的谈话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只是把毫无效果，漫无止境的谈话继续下去而已。很明显，驶往南斯拉夫方面的苏联机器的轮子已经刹车了。

列宁格勒之行，使我们觉得轻松一些，给我们以一种新鲜的感觉。

在访问列宁格勒之前，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能超过南斯拉夫起义地区和游击队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的事物存在。然而列宁格勒超过了南斯拉夫的革命实践，如果说按其英勇气概没有什么超过的话，那么按其集体牺牲精神方面肯定是超过了南斯拉夫的。在与后方切断了供应和联系的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没有燃料和食物，继续处于重炮的轰击和飞机的不断轰炸之下，在1941—1942年这一个冬天冻死和饿死的达三十万人之多，人们饿得以人肉充饥，却毫无投降的念头。但这只是一般的情况。

当我们直接接触到了现实，即接触到牺牲精神和英勇气概的具体事例，会见了参加过或目睹过那场战争的幸存者时，我们才感觉出列宁格勒这篇史诗的伟大，才能感到人类——俄罗斯人民当他们的精神生活、国家及其整个生存的基础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作出多么伟大的奇迹。

我们和列宁格勒领导人见面时，我们怀着无比钦佩的心情，还感到了人们之间的感情上的温暖。他们大部分都是朴实的、有文化教养的、勤恳、努力工作的人，他们曾经经历了这个城市的伟大的悲剧，而且直到今天在他们的心中还蕴藏着这场悲剧的伟大精神。他们生活比较单调，所以对来自另一个国

家，带来另一种文化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欢迎。我们很快而且很容易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因为我们都是有过相同命运的人。我们根本没有想在他们面前埋怨苏联领导人，但我们发现，这些人处理和对待他们管理的这个城市及居民的生活问题的态度，比起莫斯科来，更真诚，更合乎人情。

在我看来，我会很快地同他们找到共同的政治语言，因为我们很快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当我在两年后知道这些人也未能逃脱极权主义的残害时，我的确没有感到突然，他们仅仅因为敢于作个真正的人而未能摆脱这样的命运。

在我们愉快而令人悲伤^①的列宁格勒旅行中也有不愉快的插曲——陪同我们旅行的列萨科夫是一个十分讨厌的人，苏联那时还有不少出身于工人及来自其它基层的干部。观察一下列萨科夫吧！他文化水平低，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可以判断：他不久前还是一个普通工人。如果他不想掩盖自己的这些缺点，而且不去想完成那些他力所不及的任务的话，那么这些缺点也算不了什么大毛病。实际上，他确实不是靠自己的本领和智慧被提拔上来的，而是从基层被硬调进中央机关来的，并被分配管南斯拉夫事务。他既是一个谍报人员，又是一个党务干部。他以党的工作人员的身份非常愚蠢而笨拙地搜集有关南斯拉夫及其领导人的情报。

列萨科夫个子不高，脸上有许多疙瘩，牙齿黄而小，领带结得歪歪斜斜的，衬衣总是放在裤子外面，他特别怕别人说他没有文化。如果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不是官居要职，不总是挑起我们（主要是我）同他进行不愉快的辩论的话，那

① 这里指列宁格勒战后的悲惨的情景。——译者

么，人们对他还是会有好感的。他夸口说，“日丹诺夫同志已把所有的犹太人从中央机构里清洗出去了”，可是同时又赞扬当时几乎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匈牙利政治局。我想，苏联领导虽然暗地里反对犹太主义，但是在苏联看来，对匈牙利来说，那些在匈牙利人民中间没有扎下根的人是最合适的人，因为他们可以完全服从苏联领导人的意志。

我们已听说而且自己也发现，当苏联当局想要除掉某一个人，然而又没有充分理由时，通常的办法是通过情报人员把有损某人名誉的事散布出去。列萨科夫有一次“保密地”告诉我，米可夫元帅之所以被贬职是因为他在柏林收罗了许多珍宝。他说：“您要知道，斯大林同志不能容忍不道德行为的！”关于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他说：“您想想看，已经发现，他是出身于犹太血统！”

非常明显，列萨科夫虽然很不聪明，但他很了解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关系和我们中央的工作方法。他说：“任何东欧党的上层里，没有象你们党那样的一个善于团结合作的四巨头。”

他没有说出这四个人的名字，但我是知道的，他指的是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和我。我半信半疑地在想：也许这“四巨头”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也是一颗难咬的胡桃吧！

（七）

眼看一天一天白白地过去了，无事可做，科查·波波维奇决定先回国，让托多罗维奇留在莫斯科听结果，就是说等待苏联领导什么时候开恩——恢复谈判。我本也想同波波维奇回

去，但是贝尔格莱德通知我，卡德尔和巴卡里奇^①要来莫斯科，要我和他们一起参加同苏联政府就有关“已形成的困难局势”进行谈判。

卡德尔和巴卡里奇于1948年2月8日（星期日）抵莫斯科。苏联政府本来邀请了铁托，但是贝尔格莱德推托说铁托身体不适——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两国之间互不信任的气氛——所以派卡德尔来。与此同时，也邀请保加利亚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来苏，这一消息当然是那位列萨科夫告诉我的，他还故意强调说，保加利亚派来的是“大头头”。

此前不久，1月29日的莫斯科《真理报》表示不能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措施，并声明和他的有问题的、臆想出来的联邦和邦联以及“关税同盟”断绝一切关系。这是一个警告，是苏联政府将要采取更加强硬方针和某些具体措施的预兆。

卡德尔和巴卡里奇被安排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因此我也搬到他们那里去了。当天夜里，卡德尔的妻子已经睡了，卡德尔也睡下了，我坐在他的旁边，尽可能低声地把我来莫斯科后的印象以及同苏联领导接触的情况告诉了他。我的总的印象是：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给予我们什么真正的援助，我们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苏联政府力图将南斯拉夫置于被占领的东欧国家的地位。

卡德尔这时（也许是刚抵莫斯科时）告诉我，同莫斯科争论的直接导火线，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政府之间已达成关于南斯拉夫两个师进驻阿尔巴尼亚的协定。这两个师已经

^① 弗拉基米尔·巴卡里奇（1912—）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1933年学生时代参加南共地下党，1934年被捕入狱，判处三年徒刑，1941年参加游击队。第二次大战后任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理，1946年为出席巴黎和平大会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现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译者

组建完毕，南斯拉夫的空军一个团已经进驻阿尔巴尼亚，这时莫斯科表示坚决反对，而且根本不愿意听我们对进驻理由的解释，我们告诉苏联：南斯拉夫两个师所以进驻阿尔巴尼亚，是为了一旦希腊的“保皇法西斯分子”进攻阿尔巴尼亚时，用以保护阿尔巴尼亚的措施。莫洛托夫在致贝尔格莱德的电报中，竟以将发生公开冲突相威胁。

派遣两个师的做法，我是完全不赞成的，这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消息，于是我问卡德尔：有什么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他说，他也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没有参与此事。

我不能相信这种发了疯似的说法：即南斯拉夫的两个师是应恩维尔·霍查的要求进驻阿尔巴尼亚的。这完全是莫斯科教唆霍查这样干的，以便找到借口给南斯拉夫政府加上帝国主义阴谋扩张的罪名。我这样说完全不是为了减轻霍查后来对待自己同志和本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和残暴的丑恶行为的责任。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怎样解释它是另一回事，我们应该保留实事的本来面目。

南斯拉夫的两个师进驻阿尔巴尼亚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的。但我认为，他们的态度并不是真诚的，但今天具体分析此事件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当时已经被破坏了的南苏关系的背景，而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当时的贝尔格莱德同地拉那之间的关系。

第二天，我和卡德尔在公园散步时，我受到苏联谍报人员的监视，但他们无法窃听到我们的内容，所以满面愤怒。我和巴卡里奇一起继续和卡德尔讨论，这次谈话我们谈得更加详尽，内容也更广泛、深刻，并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尽管我们在得出结论时有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但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我和往常一样，还是主张作出更坚决和果断

的反应。

在1月10日以前,苏方没有任何表示和动作。10日晚上9点钟,他们派车把我们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大楼里。我们在那里等候保加利亚人——季米特罗夫、科拉洛夫、科斯托夫^①约十五分钟左右,他们一到,我们就都被带去见斯大林。

苏方代表是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②、佐林^③,他们坐在斯大林的右侧,保加利亚代表科拉洛夫、季米特罗夫、科斯托夫坐在斯大林的左侧,我们——卡德尔、我、巴

① 特立伊乔·科斯托夫(1897—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曾任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虽然他是一个反铁托分子,但持有“首先考虑保加利亚利益”的观点。1949年3月被解除职务,同年12月被起诉。曾因在审判时翻案成为一时的新闻人物。后被处决。——译者

② 米哈依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1902—1981)。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两枚社会主义劳动勋章、四枚列宁勋章、一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的获得者。1921年入党。出身于农民家庭。1918—1920年从事贫农委员会的活动,以后在青年团工作。1928年在莫斯科经济学院毕业,后又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经济。毕业后在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经济学院任教。曾积极参与大清洗活动,特别是反对布哈林反对派的斗争。1931—1934年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1935年以后在罗斯托夫·斯塔罗波尔等区的区委书记(区等于我们的省)。卫国战争期间在高加索北部军区司令部工作。1944年任立陶宛共和国中央政治局主席。1946年调入苏共中央工作。194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9—1950年兼任《真理报》总编辑。此后历任苏联外交委员会主席(1954)、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自1955年起)。赫鲁晓夫时代支持过赫鲁晓夫。为权威人士,被苏联称之为理论家,共运专家,国际事务活动家等。死前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译者

③ 瓦列里安·亚力山大罗维奇·佐林(1902—),苏联外交官。历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1941),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5—1948),外交部副部长(1948)和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1956—1958)。1960年以后为苏联联合国常任代表。1965年任苏联驻法国大使。从1974年起任苏联外交部特命大使。苏共20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22大和23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三次曾获列宁勋章及三次曾获其它勋章。——译者

卡里奇——坐在苏联人的右侧，斯大林坐在首席的座位上。

当时，有关这次会见，我曾经向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写了报告，但是今天我无法查阅这份报告，只好根据自己的回忆和有关这次会见公布的材料，把当时情况写下来。

莫洛托夫首先发言，他照例简短地说明，在以苏联政府为一方以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政府为一方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从党的或国家的观点上看无论如何这是不能允许的。

他们举出下面的例子，用以说明分歧的所在是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之间签订了友好条约。然而苏联政府仍然坚持它的观点：即在同保加利亚没有和苏联签订和平条约之前，保加利亚不应与它国签订任何条约。

本来莫洛托夫还想详尽地讲一讲季米特洛夫在布加勒斯特发表的有关成立东欧各国联邦的声明（季米特洛夫在他的声明中还提到包括希腊在内），以及他讲话中谈到的成立关税同盟和协调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工业计划等问题。但是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过于感情用事了，随心所欲讲了许多话。他的讲话，铁托的讲话，在西方都被认为是在我们同意后讲的。比如说：波兰人曾来我们这里访问。我问他们，有关季米特洛夫的声明，你们有什么想法？他们说，是件好事。我告诉他们说：这不是一件好事。这时他们才说，如果苏联政府这样认为，那么他们就持同样的看法：这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原来以为，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是得到苏联政府同意的，所以才表示赞同这一声明。季米特洛夫后来想通过保加利亚通讯社更正一下他的这一声明，可是他已经什么也无法更正了。这还不算，他还举一个例子说，过去奥匈帝国阻挠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建立关税同盟，这就使人们很容易想到：过去的

阻力是德国人，而现在的阻力则是来自俄国人。问题就在这里！”

莫洛托夫继续说，保加利亚政府要同罗马尼亚建立联邦的事，事先并没有和苏联政府商量一下。

季米特洛夫想缓和一下所涉及的问题，他强调说，他不过是泛泛地提过建立联邦的事，但并不具体。

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不对，你们已经就关税同盟及协调工业计划问题达成了协议。”

莫洛托夫补充说：“成立关税同盟和协调经济计划意味着什么呢？这不就是建立一个国家吗！”

当时，虽然没有人把问题的结论说出口来，但会见的实质性问题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即“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间的任何关系，如果不符合苏联政府的利益和未经苏联同意，这些关系是不能发展的。显而易见，在具有大国主义思想的苏联领袖们的概念中，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而且总是提醒人们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红军解放的。对他们来说，季米特洛夫的声明和南斯拉夫的缺乏纪律性和具有自主精神不仅是异端行为，而且是渎犯了他们“神圣”权利的举动。

季米特洛夫想要解释和辩护一下，但斯大林总是打断他的话，不让他把话讲完。

这就是斯大林的本来面目，他的机智变成恶毒的粗暴，他的固执变成毫无调和之余地。这时他还是克制着自己，不要使自己狂怒以至不可收拾。他始终没有丧失掉现实感，在责骂保加利亚人时，他知道就是不谴责他们，保加利亚人在他面前也是唯命是听的，所以他责骂的真正目标是南斯拉夫人，如俗话说：骂女儿是骂给媳妇听的。

季米特洛夫在卡德尔的支持下指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

在布莱德没有宣布保南已经缔结了一项条约，而是宣布双方谈话将导致签订一项条约的协议。

这时斯大林喊道：“是这样，可是你们并没有同我们商量！我们是从报纸上才知道你们的这些勾搭的！你们如同大街上的娘儿们一样，满嘴胡说八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新闻记者马上就抓住了而且如获至宝！”

季米特洛夫继续为他们同罗马尼亚建立关税同盟辩解道：

“保加利亚的经济困难实在太大了，如果没有同其它国家的亲密合作就无法发展下去的。至于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的确我是说得过了头了，这也是事实。”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您是想标新立异，一鸣惊人！您完全错了，你们的联邦是不可思议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有什么历史联系？一点也没有！更不必说保加利亚同匈牙利和波兰的联系。”

季米特洛夫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解，他说：“在保加利亚和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斯大林顽固地、毫不留情地说：“区别很大！这有什么可隐瞒的！列宁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承认错误并且要尽快消灭这些错误。”

季米特洛夫用一种和解、几乎是屈从的口气说：“是的，我的确是错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些错误，可以学习到如何处理对外政策，并取得教训。”

斯大林尖刻地嘲笑他说：“学习！搞了五十年政治，才想起纠正错误！你的问题并不在错误，而是立场问题，你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不同。”

我斜着眼睛看了季米特洛夫一下：他的两耳通红，在他脸上生有金钱癣的地方出现大块大块的红晕。他稀少的头发乱

了，那一缕缕的头发贴在他那满是皱纹的脖子上。我非常同情他。这位“来比锡审判案的巨狮”^①曾经在戈林和法西斯主义不可一世的时候，向他们进行坚决的回击，揭露他的诬陷。现在却落到如此垂头丧气的地步。

斯大林还继续说：“关税同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联邦，这都是胡闹！至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联邦那是另一回事，这些国家之间有着历史的以及其它方面的联系。这个联邦可以建立，而且越快越好。是的，越快越好，如果可能，明天就建立起来！是的，明天！现在我们就马上讨论这个问题。”

不记得是谁，可能是卡德尔，说建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联邦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斯大林更确切地说：“不好，首先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然后保南两个国家再同阿尔巴尼亚建立联邦关系。”

接着他又补充道：“我们认为，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波兰和

下，完全可以参加进俄罗斯联邦！不管这些计划是多么隐蔽，如在雾中，抑或纯属设想，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斯大林正在为东欧国家选择一种解决的办法和组织形式——以便他们能够长期和牢固地处在莫斯科的统治和霸权控制之下。

就在这关税同盟和保罗条约问题似乎已告结束的时候，科拉洛夫老头子忽然想起了什么重要问题似的发了言，他说：“我看不出，季米特洛夫同志有什么错误，因为我们事先曾把将同罗马尼亚签订条约的草案送给了苏联政府，苏联政府并没有表示反对关税同盟，只是不同意关于侵略者这一概念的理解。”

斯大林把头转向莫洛托夫问道：“条约草案送给我们了吗？”

莫洛托夫丝毫都不在乎的样子，尖刻地说：“是的，送来了！”

斯大林露出非常失望的样子，同时凶狠狠地说：“我们也做出一些蠢事。”

季米特洛夫抓住了这一新情况，说道：“这就是我发表声明的依据，草案送到莫斯科，我没有想到，你们会反对这个草案。”

斯大林还是毫不妥协：“胡说八道！您如同一个共青团员不自量力。您总想震撼世界，似乎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你们和南斯拉夫人做些什么事，总是不让别人知道，从来不打招呼，我们都是在大街小巷里才听说你们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将既成事实放在我们的面前。”

当时领导保加利亚经济事务的科斯托夫也想谈一点意见，他说：“作为一个弱小而又不发达的国家，实在太困难了……我想提出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

斯大林又打断了他的话，让他去找有关的部门，在这次会见中主要解决三个政府和三个党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

终于轮到卡德尔讲话，他红着脸——这是他激动的标志——把头缩到肩膀里，讲话时在不应该停顿的地方停顿下来。他说，在布莱德签订的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的条约，事先寄给了苏联政府，苏联政府除了对条约的期限从“无限”改为“二十年”之外，没有提出别的意见。

斯大林默默地用责备的眼光看着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把头低了下去，紧咬住嘴唇，实际承认了卡德尔的话。

卡德尔继续说道：“这一条意见我们采纳了，此外就没有别的分歧意见了……”

然而斯大林还是打断了他的话，态度还是那样凶狠，但没有象对待季米特罗夫那样带有侮辱口吻，说道：“胡说！有分歧，而且分歧是很深刻的！有关阿尔巴尼亚的问题，您还能有什么可说的？你们把部队进驻阿尔巴尼亚的事，就根本没有告诉我们！”

卡德尔反驳说，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这样做的。

斯大林喊道：“你们的行动可能导致国际上的严重纠纷，因为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你们是怎么想的？不管你们如何辩解，事实总归是事实——你们要把两个师开进阿尔巴尼亚，事先又完全没有同我们商量。”

卡德尔解释说，这一切并没有最后定下来，根据他的回忆，南斯拉夫政府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没有一次不事先同苏联政府协商过。

斯大林喊道：“说谎！从总的来说你们是不和我们协商的！这不是一两个错误的问题，是你们的原则——指导思想错了，对，是你们原则错了。”

卡德尔的话被打断了，他没有再说什么，就这样，他的观点没有能够讲完。

莫洛托夫把文件拿了出来，读了南保条约中的一段话：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将“本着联合国的精神努力合作以支持任何保卫和平，反对一切侵略温床的倡议。”

然后他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季米特洛夫解释说：“此处的含义是把自己反对一切侵略温床的斗争和联合国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又插话说：“不对，这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是最普通的共青团员玩的把戏！这不过是说得天花乱坠的响亮的词句而已，只会给敌人提供借口。”

莫洛托夫又回到保罗关税同盟问题上来，强调说，这是两个国家合二而一的开始。

斯大林说，关税同盟一般是不现实的。在争论再一次稍稍平息下来以后，卡德尔说，有些关税同盟实践证明是很不错的。

斯大林问：“举个例子说说看。”

卡德尔说：“例如，比尼卢三国的同盟，通过这一同盟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进行了联合。”

斯大林说：“不对，荷兰没有参加，只有比利时和卢森堡，简直是不值一提的胡闹。”

卡德尔说：“不对，荷兰也参加了。”

斯大林仍还坚持说：“荷兰没有参加。”

斯大林看着莫洛托夫和佐林，又看看大家的神情。我很想告诉他，在“比尼卢”这个名称里“尼”是代表荷兰，因为“尼德兰”是荷兰的正式名称。但大家都不说话，我也就不便开口，于是“比尼卢”同盟里就没有荷兰的地位了。

斯大林又回到协调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经济计划问题上来，他说：“如果在合作之后马上要开始争吵，这是没有意义的事

情。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联合那是另一回事，他们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彼此之间早已存在着这一共同的愿望。”

卡德尔强调说：“在布莱德会议上决定开展工作以促进逐渐向建立保南联邦的方向发展。”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不对，不应该‘逐渐’，而应该‘立即’建立起来，如果可能的话，就在‘明天’。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先联合起来，然后把阿尔巴尼亚也联合进来。”

斯大林接着把话题转到希腊起义问题上，他说：“应该把希腊起义的事收起来。”他就是这样说的“收起来”。又对着卡德尔问：“你们相信希腊起义会成功吗？”

卡德尔回答说：“如果外国干涉不有所加强，如果不犯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

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卡德尔的话，继续说道：“如果，如果！根本没有成功的任何可能。你们以为，英国和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会允许在地中海切断他们的运输命脉吗？简直是胡闹！我们没有海军。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

这时有人谈起中国共产党最近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中国的情况不同，远东的形势也不同。诚然，我们也可能犯错误！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建议中国同志想办法同蒋介石协商，达成一项临时性的协定。他们口头上同意了，但回国后还是自己干起来了——集中了力量，狠狠地打击了蒋介石。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我们错了。但希腊的情况不同，要毫不犹豫地收起起义收起来。”

我至今还不清楚，为什么斯大林如此反对希腊起义。我

想：那时其它新建立起来的国家还没有被完全征服，还没有控制在自己手里，也不可能再打算在巴尔干半岛上再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希腊，这样做没有好处。又何况他考虑到这会引起国际纠纷，因为纠纷可以变成一种威胁的形式。这样一来，他或者会被卷入一场战争之中，或者至少会威胁他已经占领的领土。

至于有关中国革命的绥靖政策问题，在这里无疑也是对外政策方面的机会主义起了作用。也许，他考虑到：世界上出现一个新的共产党领导的大国对他的事业及他的帝国会是一种威胁，况且，他根本没有任何希望从中国内部让它屈服于自己的指挥棒之下。不管怎样，他知道，每个革命，仅仅因为它是新生的事物，就必然会成为独立的地震发源地，它会去建立自己的独立的政权和国家。在中国问题上，他尤其担心和恐惧，因为中国革命就其重大意义来说，并不亚于十月革命本身。

争论开始平静下来。季米特罗夫又提出同苏联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又打断他的话，说道：“这个问题我们将同保南联邦政府一起讨论。”

接着科斯托夫提出有一项技术援助条约订得很不公平。有关这个问题斯大林让他写个“条子”告诉莫洛托夫。

卡德尔问起意大利政府提出要求把索马里交给他们托管，对此问题应持什么态度，因为南斯拉夫并不想支持这个要求；可是斯大林却持相反的意见，他问莫洛托夫，是否已经作了答复。斯大林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立场的，他说：“从前，国王之间如果不能就战利品达成协议的时候，他们就把引起争端的领土送给最弱的诸侯，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把它夺回来。”

斯大林快要结束他的谈话时，他没有忘记引列宁和列宁主义来掩饰他的要求和命令。他说：“我们，列宁的这些学生，也

经常和列宁有过分歧的意见，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论，但是后来经过辩论，把观点一致起来，就又继续前进了。”

会见进行了两个小时。

这次，斯大林没有请我们到他家里去赴宴。应该承认，当时我心里感到悲伤和难过，因为当时在我这伤感的人的情绪上，对他还有着强烈的爱慕之心。

我很难过而且心上感到残酷、冰冷的空虚。在汽车上我本想把自己对会见的失望心情告诉卡德尔，但是他也情绪很坏，用手势表示要我不要讲了。

这不意味着，我同他的意见不一致，而是我们各自的反应不同而已。

卡德尔真是心乱如麻，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上看得出来：第二天，他被带到克里姆林宫去签署苏南两国进行协商的条约时，——没有说明书，也没有进行仪式——他把字签错了地方，所以又不得不再签一遍。

当天，在斯大林办公室的过厅里，我们同季米特洛夫约定：我们将到季米特洛夫那里去进午餐，以便商讨有关联邦的问题。我们是机械地去讨论这件事的，这是因为纪律性和苏联政府的威信当时还在起着作用。但会谈的时间很简短，大家都无精打采，我们都一致同意，待我们回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之后再行联系。

当然，一切都变得毫无结果，因为在一个月后，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保加利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用信件的形式开始攻击南斯拉夫领导。真相已经大明，关于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会谈只是一个圈套，其目的是破坏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团结，这是任何一个有思想、有理想的人不愿意主动套在自己头上的绞索。

这次同保加利亚代表团的会见,我还记得。科斯托夫对我们十分周到,态度和蔼可亲。我觉得奇怪,因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他是对南斯拉夫持敌对态度的人,即所谓“苏联”的人。原来,他也是主张保加利亚独立自主原则的人,他之所以对南斯拉夫人非常生气,是因为他认为南斯拉夫是苏联的主要帮凶,或者也许南斯拉夫自己想把保加利亚及其共产党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后来科斯托夫因为被诬陷里通南斯拉夫而被枪决了。而南斯拉夫的宣传机构一直到他死之前都还攻击他。可见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南保之间的互不信任和误会已经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

就是在这次会见中,季米特洛夫还谈到原子弹的问题。当我们在他的别墅前和他告别时,他好象顺便地谈了一句:“问题不在批评我的声明,而是另有缘故。”

季米特洛夫当然也和我们一样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他没有力量,也许是因为他本人不象南斯拉夫领导人那样有能量。

我并不担心我们在莫斯科会出什么事情,不管怎样说,我们毕竟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代表。虽然如此,波斯尼亚的森林这时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在德军攻势最残酷的日子里,我们曾经隐蔽在这块地方,那时我们在清澈、冰冷的泉水旁边憩息身心,获得心灵上的慰藉。我甚至对卡德尔或者另外一个什么人说:“赶快回到我们的大山和森林里去吧!”

有人责备我,说我把事实过分夸大了。

三、四天后我们离开了莫斯科,清晨我们被送到伏努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送别国宴的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飞机。在飞机起飞之后,我感到一种童年时代的喜悦,同时又是严肃的心情中的一种喜悦,这种感情在我的心中越来越强烈了。与此同时,斯大林谈的有关希科尔斯基将军命运的故事在我的记忆

中却越来越淡薄了。

我难道还是四年前怀着忠诚、坦率、纯洁的无限向往着苏联的那个我吗？

在接触了现实之后，我的又一个理想破灭了。

这是否是为了一场新梦的开始呢？

大概，我是最后一次谈斯大林

(一)

我本来认为我写了《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之后，有关斯大林的问题我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我象往常一样，往往遇事估计不正确，这次我又估计错了，正如不久前我希望的那样，当我写完《不完美的社会》一书之后我本打算不再研究《意识形态问题》了。

然而，斯大林仿佛还活着，他还到处徘徊，而且还会久久地在世界上游荡。仿佛大家都拒绝接受他的遗产，然而还有许多人从他的思想中为自己吸取力量。赫鲁晓夫否定了他，然而他自己就曾对斯大林歌颂备至。现在的苏联领导人 不 赞 美 他 了，但他们还在斯大林的阳光下取暖。就是铁托，在他和斯大林决裂了十五年之后，又重新把他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去尊敬。就是我，现在我也在问我自己：也许我对斯大林问题进行的许多思考，不就是证明他还活在我的心中吗？

斯大林到底是个什么人？他是国务活动家吗？一个杰蒙^①式的天才吗？他是篡夺了政权的暴虐狂、罪犯？或者是教条主义的牺牲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如何利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对他所进行的事业是怎么想的？他对自己、对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怎样估计的？

① 杰蒙是莱蒙托夫长诗《杰蒙》的主人公，他是被上帝处罚为既不能进天堂，又不能下地狱的幽魂，他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游荡，无论他的爱，他的一吻，或他的恨都能致人以死命，但他又是无所不及的。——译者

这仅仅是有关他这个人物想到的几个问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现代世界的命运，特别是关系到现代共产主义世界的命运，因此，我认为这些问题具有深刻意义，它将长久地、不以时间为转移而存在着。

在我同斯大林谈话的一些内容里，他的两个信念，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他的第一个思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945年说的。他的第二个思想是1948年讲的，这是我准确地记得的。

他的第一个思想大致是这样表达的：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前提、出发点是正确的，那么一切其它的问题就必然由此产生，它们也都将是正确的。他的第二个思想是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谈话中有人（也许就是我）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是生气勃勃的，是具有现代精神的，斯大林对此问题仿佛是已经早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已经做出了不容争辩的结论了，也许，他这样的表示也是违背他自己的意愿的。他说：

“是的，毫无疑意，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但他们也有缺点。不应该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受德国的古典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对他们的影响更深。然而当时列宁却已经摆脱了这些影响。……”

他的这些判断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新奇之处，因为根据每个人的信念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将人们的观点和行动区分为“正确的”或“不正确的”，这种共产主义的习惯的判断方法是众所共知的事。人们狂热地把列宁奉为马克思的唯一保卫者和继承者，也是有目共睹的事。然而斯大林上述两个判断中，不但有他独见的因素，而且对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

斯大林解释说：思想的前提是胜利的基础和保证，他的这

一观点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他的这个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相矛盾吗？马克思认为一切思想的基础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或斯大林的这种观点，不是有意识地讲出来的，难道不也十分接近哲学上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吗？因为唯心主义的哲学主张说：起决定作用的和第一位的是理性和思想。问题很清楚，斯大林在他上述的判断中没有体现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①而斯大林却说，理论和思想没有被群众掌握之前已经是取得胜利的力量了。试看一看1928年7月布哈林在赞同加米涅夫评论斯大林的思想时说：“斯大林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理论，如果当他需要抛弃某一个人的话”^②，那么为什么斯大林这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持批判态度的论断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自己还没有发现呢？

尽管人们发现了他的这些问题，然而在我们上述的斯大林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有着它本质上的一贯性。布哈林在批评斯大林没有原则性时（如果不去考虑布哈林的顽强的派性方面），我认为，布哈林的批评和斯大林所持的思想是决定性因素的这一观点并不矛盾。斯大林党内的对手——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以及其它一些人在与斯大林的斗争中都遭受了失败，其中一个带本质性的（如果不是最带本质性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比起其它的任何人，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遇事有独道之处，他是一个比较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③。当然，在斯大林的风格中，没有托洛茨基具有的那种五光十色的华丽的文彩，他分析问题却具有布哈林的那种敏锐的智慧。斯大林对问题阐述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0页。——译者

② 罗伯特·康古斯特著《大独裁者》第81页。纽约麦克米兰公司出版，1968年。——译者

③ 在这一点上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同意本书作者的观点。——译者

对社会现实合理的透视，是走向新的胜利的力量的领导。他从某一现实中，从相应的条件和环境中取得的思想，看起来似乎是很一般的，平凡的，没有巨大分量的。然而这只是它的外部形式。

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是理论不能脱离实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当共产党人能够实现他们的学说和实践统一的地方，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就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妖魔般顽强的力量，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学说与他的权力及国家的威力结合起来。因此，斯大林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家；他之所以发表讲话和写文章，只是为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正是在他的这种思想和实践的结合，求实精神和非抽象的实用主义中，显示出斯大林观点的力量和独立性。……

还应该指出：一切东方的教条主义者和西方的严肃的研究斯大林问题的学者，由于他们忽视了或者没有对他的观点的这一本质给以足够的认识，或者只从文章的词句中表面地进行研究，所以，在今天去理解他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夺得了政权，就感到十分困难了。

有必要再强调一次：十月革命以后离开苏联社会和苏联国家的需要，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存在什么斯大林的思想观点。这是关系到他的党生死存亡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这种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权力，变成为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1972年版。——译者

“领导”的、统治的力量。托洛茨基称斯大林是“我党最杰出的才能平庸的人。”^①布哈林讥笑他说:“斯大林是受着激情的冲动而不妊的著名的理论家。”^②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带有派性情绪的尖刻的言词,并非实质性的判断。斯大林的确没有认真地从理论上思考过问题。他并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科学的探讨。然而,在理论、意识形态和党的需要、更确切地说是党的官僚阶层、党的显贵的需要相结合方面,斯大林的思想,他的思维能力比他的对手更有价值得多。党的官僚阶层支持斯大林并不是偶然的現象,就象希特勒当年的那些冗长的讲演,在今天看来几乎是狂人的呓语,但在当时他曾用他的这些呓语争取到千百万德国人的支持,并把这些千百万“一向十分理智的”德国人投进了死亡的战场。斯大林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恰恰相反,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当斯大林为了新生的、蜕化了的官僚阶层的生存和特权去说明“当前迫切的任务”时,当他把新生的官僚阶层和俄罗斯的强大和工业化的任务混为一谈,相提并论时,托洛茨基这时正在高谈阔论他的世界革命的奇特的理论和各种方案,而布哈林则进行教条式地埋头深入钻研某一理论的各种细节。

与此同时,斯大林象每一个天赋甚高的政治家和手腕高强的行政领导人那样,善于把别人的思想给以现实的可行的形式。比如说斯大林的著名的论点“在苏联一国的范围里建设社会主义”,本来是布哈林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日益发展起来的思想。……在各种作品中,这样的做法称之为剽窃、抄袭或模仿。

① 罗伯特·康古斯特著:《大独裁者》第71页,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69年版。

② 罗伯特·康古斯特著:《大独裁者》第71页,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69年版。

虽然如此，在斯大林生前，没有人否定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今天也没有一个理智的、头脑清楚而聪明的人愿意这样做。人们不同意的只是：作为一个理论家和作为贯彻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从品质方面对他过去所做的这样或那样的评价。

(二)

以上我谈的是斯大林的品质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争论某人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范围里是某人的继承人，这是非常表面而且是非本质性的问题。只有那些没有远见和创造性处理问题能力的人，才可能是一贯忠实、准确的继承人。我们谈论的问题是政治，在政治中各种神话、离奇的事情乃是不可避免的、天天都有的现象；这里我所谈的具体的情况，是指有关驳斥对列宁遗产所持的那种教条主义的，蓄意煽惑人心和书呆子气的态度和作法。因为凭引用列宁文章的引语可以证明形形色色的、各式各样他的事业的继承人都是忠于列宁的，也可以证明其中没有一个人是属于他的。我们只有把列宁的意向和斯大林如何实现这些意向的、以及斯大林的对手——持不同政见的人提出的方案进行比较，我们才能够接近真理。

我们也无法回避去分析所谓列宁遗嘱，因为它在教条主义者、尤其是在反苏的各种争论中起过而且今天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列宁的《遗嘱》实际上是他于1922年12月22日夜间中风后，左半边身体瘫痪之后口述的一封信。次日，即12月23日医生允许他每天口述四分钟。于是他开始口述给代表大会的一封信，25日口述继续进行，26日才口述完毕。

这封信的一部分是涉及列宁建议代表大会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100人及支持托洛茨基提出的有关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信的这一部分于12月26日交给了斯大林，因为当时他是党的总书记。根据一些猜测，斯大林怀疑列宁更倾向于托洛茨基的意见，所以他打电话给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对她破口大骂，借口说她不尊重医生的嘱咐，允许列宁研究政治问题，置列宁生死于不顾。不知克鲁普斯卡娅是否把她挨骂的事告诉了列宁，但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在12月25日的口述记录中是这样说的：“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之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①十天以后，即1923年1月4日又补充了下面一段说明：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我想这句话应该说：“在一切方面都不必和斯大林有什么不同，只有一点要胜他一筹”——杰拉斯），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②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份《遗嘱》和列宁往常的那种尖锐、一针见血、表达思想准确的风格不同，《遗嘱》中的话是不确切的、模棱两可的，尤其是在关键的地方。列宁非常清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也预见他们之间的冲突意味着什么。然而在12月23日列宁第一次口述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他回

① 《列宁全集》，1957年中文版，第36卷，第617页。

② 《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36卷，第618页。

避公开谈这一问题，而是采取了打预防针的措施，建议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50—100人（当时只有27人），“为了加强中央机关，为了改善我们的机关能够严肃地进行工作，也是为了……党的一切方面的命运”^①（大概应该是：为了党本身的命运——杰拉斯）。

简直不可理解的是：象列宁这样的人，他能够明察秋毫，具有无比丰富的政治经验，千锤百炼了他的党，使这个党用他的思想形成了当时的面目，他是一次伟大革命和一个大国的首脑，已经尝过了“历史”和权力能令人陶醉的毒酒，他怎么会认为，而且好象是突有所悟似地认为只有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才能够拯救“党的一切方面的命运”呢？列宁的思想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难道他的智力已经衰退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于改变了他一向主张的思想——即居于首位的是原则和力量，而突然大讲起数目字的意义的吗？难道他忘记了辩证法，忘记了在一切现象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吗？列宁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论本质的那些热烈的意见为什么这里一点也没有了呢？仿佛第一次怕他建立起来的党的组织和目标会遭到破坏。

更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列宁在第二天，即12月24日的口述中才谈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谈到他们之间可能产生的分裂。仿佛他在一夜之间进行了反复的思考，改变了他的想法，才敢于公开地把这个问题谈出来。

12月24日的口述中说：“我们的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假如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的不稳定性是可能产生的，它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说得很不明确，他没有提到他不断阐明过的不容争辩

① 《列宁全集》，1959年俄文版，第36卷，第545—546页。——原注这一段中文版中没有。——译者

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显然是在担心工农“联盟”的分裂。然而这一思想和下面口述的一段话既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也与上述事实本身没有联系。列宁的口述中说：“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闹分裂，我打算在这里分析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该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到100人。（昨天的数字的吸引力还没有离开列宁的思想——杰拉斯）。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①

列宁在生命危险的时刻，对他来说，根本不会去考虑和研究“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在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民主百万倍的苏维埃政权下”^②，一个人会“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这样的事是怎样发生的？显而易见，他不仅担心党的命运，他也在担心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比他的总书记大得多的无限的权力。在列宁身上也有着大家都熟悉的“人的弱点”，即某个人的“历史上的作用”越大，这个缺点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即将思想和权力，权力和他个人等同起来。

但是研究这样的问题会使我们偏离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

① 《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36卷，第616—617页。——译者

② 《列宁选集》，1956年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第2卷，第38页。——原注

即在列宁的同事和战友中，他认为谁应该是他的继承人呢？显而易见，他的继承人绝不是斯大林，也不是托洛茨基，因为前者太粗暴，后者又热衷于行政方面。而其它优秀的中央委员中，列宁也没有认为有人是他的能够胜任的继承人。

列宁口述说：“我不打算再评述其它中央委员的个人品质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①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此处可能是笔误，从意思上看，他应该是他们——杰拉斯），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②（这里的问题在于1917年他们都是参与了反对列宁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斗争的。——杰拉斯）

现在请大家注意列宁讲下面一段话时的逻辑性及其诚恳的态度吧！是什么缘故，当列宁谈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的一段事件”时，他一面强调说，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然而也不能去责备他们两人。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强调指出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呢？我想，当问题涉及到政权的问题时，为了以防万一，重新提一下已经“被原谅的”“错误”也是没有害处的事……

列宁提到两位年轻的中央委员，他也和对其它人一样，在

① 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10月10日（23日）和16日（29日）党中央会议上的投降行为，当时他们发言并在表决时反对列宁提出的关于立刻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中央两次会议上遭到迎头痛击后，就在10月18日的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指出布尔什维克在准备起义，并且说他们两人认为起义是冒险行动。这样，他们就把党的最大秘密（中央关于在最近时期组织起义的决议）出卖给罗将柯和克伦斯基了。同一天，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中斥责了这种行为，把它叫作前所未闻的工贼行为。（见《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26卷第196—199页。）——译者

② 《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36卷，第617页。

前半句夸奖了他们的优点，在后半句则指责了他们的缺点：

“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该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①

这里还想补充一点：在1923年4月召开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增加至40人，在1925年5月，即在列宁逝世后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至63人。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列宁的“遗嘱”，但大会一致通过了决议：不公布列宁的这份“遗嘱”。更值得提及的是：托洛茨基根本不承认列宁留下过“遗嘱”。^②当然，他的这一意见，在他没有可能查到列宁的手稿之前，是一直坚持的。

列宁的“遗嘱”很有必要进行专门的、全面的分析。然而从上面引证的片断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列宁没有把他掌握的权力交给任何一个人，同时，他只有对斯大林，没有指出他有政治上的缺点，而仅仅指出他个人性格等方面的毛病。这个评语也符合历史事实：即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始终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1927年10月23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夸耀自己是有原因的，他说：“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

① 《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36卷，第617页。——译者

② 斯大林著：《论反对派》，莫斯科，1928年，第723页。——原注

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①

那么,在实践中列宁遗产的情况又如何呢?实际上是谁把他的事业继续下去的呢?路易·费舍在他写的《列宁生平》一书中得出的结论说:如果列宁那管是再能活十年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争吵就不会发生如此悲惨的变化,苏联也不会淹没在全面的暴行之中。这一观点是能够使人信服的,因为它有着更广泛的理论性的意义。然而,可惜列宁并没有能再活十年,因此,关于继续列宁事业的问题应该以现实为背景来进行研究,即研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斯大林和反对派的斗争、斯大林的恐怖政策,研究斯大林接收下来的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全部面貌。

这样做的话,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也是因为围绕着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以及今天共产主义运动的活生生的现实的许多方面,许多不同的、敌对的势力和思想也还仍然在进行斗争的缘故。

决定论的观点提出:象如此落后的俄罗斯和全面渗入国家一切领域的意识形态,除了使用全面的行政暴力的途径,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推动共产主义的运动。我们抛开这个观点不去管它,然而,我认为列宁事业最彻底、最自然的继承人正是斯大林。甚至,如果假设斯大林有可能把列宁也消灭了的话,这和我上述的结论也没有矛盾。这是列宁学说必然导致的结论:因为列宁和那些宣传理想社会的人(包括马克思在内)不同,他是为取得某一种全面的权力进行了斗争,运用这样的权力去建设一个社会,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也象马克思那样,把这

① 《斯大林全集》,1954年中文版,第10卷,第153页。——译者

一政权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思考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工人阶级的监督和压力，而列宁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党来实现这一专政的。一个非假说的理想的——即全面的权力和作为假说的理想的权力等同起来了。

人们可以在一切方面指责斯大林，然而有一点却不能指责他，这就是他没有背叛列宁建立起来的政权。赫鲁晓夫没有理解这一点，他不能也不敢去理解这一点。他把斯大林的权力说成是他的“错误”——即说他离开了列宁和列宁主义。他这样做并没有在知识分子和人民中给自己建立声望，而且破坏了他和党的官僚阶层的关系，因为对这个阶层来说，党对一切其它社会使团一样，它的历史就是它的生命的一部分。乔治·肯南指出：1945年以后的德国政权并没有否认纳粹的罪行，然而他们反对纳粹分子所采取的措施比起纳粹的罪行来是不相称的。德国政权传统的连续性没有中断。与此同时，苏联的任何一个领袖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不是在继续他们党的事业，创造他们党的历史。列宁的政权，在采取了某些改变了手段的条件下在斯大林时代曾经继续存在下去。当然我说的不仅仅是政权，但主要的当然是政权。这个政权今天仍然在某些改变了的面貌和形式下继续存在着。

(三)

斯大林党内的一切对手、政敌都是在非现实的世界里活动，虽然他们脱离现实的程度不同，有的多些，有的少些。托洛茨基热衷于革命——一头钻进了世界革命。布哈林埋头于经济的研究，当然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务的基础是经济问题，他们曾经探讨往昔的“公社制度”^①和计划理想的未来。而斯

^① 这里指俄罗斯的宗法公社制度。——译者

大林沿着列宁走过的道路，他逐渐地明白了：如果不改变党的作用和它的意义，就不可能保存新的制度。在党政合一的革命时期，党的权力比政权要大。后来的变化仅仅是：按照列宁关于国家是使用强制手段的暴力机关的指示，政权的权力大于党——表现在秘密警察和它的整个组织系统。

当然，这些变化都是潜移默化、逐渐发生的，仍旧保存了“党的领导作用”的形式，也就是说保存了意识形态领域中和各种形式主义的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也注意到：作为政权本身会为自己带来特权和“在历史中的地位”，那么问题就十分清楚了，为什么从党取得了政权的第一天起，党内就出现了权势欲的思潮：不是斯大林创造了一个极权的党的官僚阶层，而恰恰相反，这个阶层为自己找到了象斯大林这样的领袖。

正是因为斯大林理解了当时的现实和未来的前景，所以他才能够出奇致胜地抓紧了时机，打败了他的敌手，赢得了政权。被击败了的斯大林的这些对手们，他们对党的感情和热爱逐渐地变成了他们的弱点，而对斯大林来说，利用他们对党的感情是他对付他们的主要手段：即在“党的面前完全解除他们的武装”，要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干了最卑鄙无耻的罪行——说自己是叛徒，组织怠工，进行暗害和谋杀等等。今天我们已经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斯兰斯基案件，在匈牙利发生的拉伊克案件，大概还有其它国家进行的类似案件，苏联的检察员们都和他们的东欧各国的小兄弟商量过，并且交流过“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当然要完结这样的案件没有刑讯室和刽子手是办不到的，正如中世纪宗教法庭对待异教徒和魔鬼那样，而我们时代的这些审讯，其中新的东西仅仅是理由、论证和手段而已。

斯大林并没有消灭了党，他改造了它，“清洗”了它，把它

变成了现实的、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使用的工具。象《卡拉玛佐夫兄弟》里面的伟大的中世纪宗教裁判者^①一样,他明白了:应该把上帝杀死,这里的上帝是指党的和谐的集体和平等的社会,用以拯救他的法典——即苏联的制度和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的组织。百依百顺地能跟在他后面走的,不仅仅是政治官僚阶层,而且他要求全世界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也能为他的马首是瞻,因为形势所迫,他们不能不把他们的命运和苏联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而斯大林把他和国家等同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如何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即象具有严谨的智慧的陶里亚蒂和象英雄人物季米特罗夫这样的人,怎么也会没有“发现”斯大林的笨拙的谎言,而和骇人听闻的大恐怖妥协呢?

各种“胜利”不但增长了斯大林的威望,而且他自己陶醉于这些胜利不能自己;他把政权、思想和斯大林等同起来,变成三位一体了……正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毫无选择地可以在世界上体现一样。

(四)

列宁逝世三个月之后,即1924年4月斯大林在他讲的《列宁主义问题》讲义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这部讲义把列宁的思想肤浅化了,简单化了,但同时给它作了定义,也仿佛像恩格斯对待马克思的著作一样,他写了《反杜林论》,把马克思的思想系统化了,并给它作了定义。当然,斯大林这样作并非由于偶然,但却过于轻率,有失检点。他早已理解了列宁主义的实质,并且把它树立起来,作为自己

① 陀斯朵也夫斯基的名著《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之一伊凡,他是一个半疯的病人,他常常觉得在自己面前出现一个伟大的中世纪的宗教裁判者。——译者

的大旗。因此，在苏联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的观点和行动都占了上风。许许多多的成绩和胜利都是政治家们所目睹的现实，可以“证明”“我们的”——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思想观点是无比优越的，正确的。

我想，也正是这些原因马克思的学说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什么分量了，虽然他仍然忠于这一学说的本质——即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建立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那些突如其来的暴跳如雷的愤怒的发作并没有使他失去理智，他能够用几个月，乃至用几年的时间仔细地、用心思考地去研究某一问题或者他的某一敌手。他也是这样对待思想问题的：当他在列宁逝世后，急于要建立“列宁主义”的时候，大概他已经感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不足之处。大概，转折的时刻是反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当时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的民族入侵了苏联，想要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思想取得胜利的唯一国家彻底毁灭。

他早已把国际共产主义的活动置于苏联党的控制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它的结局仿佛又一次证明：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如果能够存在下去，它只能把自己置于苏联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建立了政治官僚制度，并且宣扬、鼓励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是为了在这样的制度和思想上巩固他个人的权力，而且他认识到只有采用这种形式才可能保存俄国的革命和共产主义。战争结束不久，他开始否认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①著作的意义，虽然列宁曾对这位理论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① 冯·卡尔·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参加过1812—1815年和法国作战。曾任柏林军校的校长。崇尚黑格尔哲学思想。他的有名的著作《战争论》中指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得到列宁高度的评价。
——译者

斯大林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发现了比冯·克劳塞维茨更好的理论家，非常简单，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他所属的那个民族的军队在战争中被苏军消灭了，而这次战争可能是俄国人民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一次战争。

斯大林从来没有公开谈过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损于他们的言论会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中产生信仰的危机，与此同时，也就是威胁着他的事业和政权。他认识到：他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他比较彻底地、系统地发展了思想和行动、认识和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的原理。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否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或那一条的原则，对斯大林来说，是无所谓的。难道一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列宁，不是都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是“为了领导实践的”，而不是只去收集他的每个原理；他们不是还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然而，这一问题的内容要广泛和复杂得多。任何一种制度，特别是专制制度，它所全力以赴要达到的目的，是统治者有能力巩固这种制度所具有的状态。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就不无武断的地方），当它成为官方的，即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时，它就不能不被僵化成为教条的状态。因为一个国家和它的统治阶层，如果每天都改变它的统治方法（且不必说去改变它的理想），那么这个国家和它的统治阶层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它们应该生存下去——在斗争和劳动中去适应从内部到外部都在变化着的现实。这样的情况就“迫使”领袖们《离开》理想，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在他们的拥护者和人民的心目中保存，如果可能还要加倍地提高他们个人的伟大之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它的“科学性”和密闭性的与世隔绝的政权

促使斯大林毫不动摇地用最残酷的手段去消灭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异端分子——生活本身使他们不能不“背叛”，也就是说改变那些意识形态中“最神圣的”原理。斯大林警惕地守卫着意识形态领域，然而这仅仅作为权力的一种手段，用以使俄罗斯强大起来和提高他个人的威望。因此，那些认为自己就是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本身的官僚们今天还在摇着古老的手摇琴，奏出枯燥的曲子说：斯大林虽然有“错误”，但“他为俄罗斯做了许多事情”，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在斯大林时代谎言和暴力应该被提高到最高原则的程度……然而，又有谁知道：在斯大林的明察秋毫，洞悉一切，非善良的头脑中，也许他认为谎言和暴力就是辩证法中的否定呢？而且他也认为通过这一否定，俄罗斯乃至整个人类最后就可以走向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幸福呢？！

在生活中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斯大林把共产主义思想引向了极端，因此，共产主义思想和信仰这一思想的社会都开始退化了。当他还没有来得及清除掉他的内部的敌手，当他刚刚宣布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当战争还没有结束，这时在苏联的社会里以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出现了新的思潮和流派。可以说，当斯大林论述“思想原则”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候，他用他的世界的语言、思想和制度来说服别人的时候，他说的这些东西和其它的政治领袖所说的内容也都是一样的，其它的政治领袖们也说：如果我们的思想反映了社会运动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用这种思想鼓舞人们使他们组织起来，那么，我们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而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斯大林具有非凡的敏锐的思维能力，而且他的思想形成之后是坚定不移的。我记得，在他在场的情况下，不可能给他提出什么意见或者暗示，如果有人提出来，他马上就会发现。如

果我们还记得他曾赋予思想以多大的意义的那些提法（虽然对他来说，这只是一种手段）的话，那么我们自然就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即他也看到了他所建立的社会制度的不完美的方面。在这方面，今天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明，特别是在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著作中写得更加清楚。她说：当他知道在古比雪夫为莫斯科撤退到那里的党中央机关的子弟建立了一所专门的学校时，他惊叹地说：

“真要命！你们哪，你们的这些该诅咒的等级制度！”^①

在斯大林时期形成了官僚主义的等级制度，这也正是斯大林的最不共戴天的敌人托洛斯基曾经提出过的问题。骇人听闻的大清洗，几百万人被处决和在集中营的生死线上挣扎着的人们，这就只能加深了社会的不公正，这种情况又反过来要求新的暴力，新的浩劫和清算。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用他那颗残酷的心毁灭了自己的家庭。最后，在他自己的周围只剩下了一片空虚和恐怖展现在他的面前：他逝世前一段时间，他从画报上剪下了陌生人的孩子的照片，贴在自己房间的墙上，然而他并不愿意看见自己的亲孙儿孙女。……这对人们、特别是对那些只用教条主义的头脑去进行单一方向的思考、把人的生命和他们的追求置于所谓的“历史的必然”之上的人们将是非常重要的教训。因为在实际上，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大的胜利者，然而与此同时他也是遭受了最悲惨失败的人物。他死后没有给人类留下一件可以经历时间考验的、不容争辩的、众所公认的宝贵的财富。^② 他的一切胜利都变成了失败——包括他本人和他的思想。

那么斯大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如

① 斯维特兰娜·阿里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1979年中文版，——译者

② 这里作者指他的思想、著作和事业。——译者

此地步了呢？

斯大林的言行作为一种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仅涉及共产主义运动和当时的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这里指出的是：思想和人、和领袖、运动的关系，暴力在社会中的作用，神话在人的生活中的意义，群众、人民、民族的亲近、友好的条件等一系列的问题。斯大林已经属于过去了，但有关上述这些问题的争论和类似这些问题的争论，不久以前才刚刚开始。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所认识的斯大林，是一个活生生的、热情的、易于冲动的人，但是他是具有极高的组织才能和善于控制自己言行的人物。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难道他能管理这样的现代化的大国和领导如此艰巨、可怕的、极其复杂的那些作战活动吗？

因此，我认为当围绕着他这样的政治家进行争论的时候，诸如刑事犯、暴虐狂等等概念都具有次要的意义，而且这都是离奇古怪之词。在这样的争论中我们要避免去犯错误，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政治并不能摆脱所谓的低级的欲望和迷误。只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政治乃是人的各种倾向、追求的总和，因此，政治就不可能清除各种犯罪和狂症的因素，变成为纯洁无瑕的政治。所以很难找出（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犯罪行为和政治暴行之间的界限。因此，每一次新的实行暴力的极权者的出现，思想家们就不得不去进行新的自己的调查，分析、总结和概括。

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的界限存在于理智和感情，必然性和主观性之间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强奸了历史的人，即便我们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罪行和暴虐症的话，也是如此。例如，如果我们同意在那样具体的条件下集

体化是明智的和必需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实行集体化政策，也不需要去消灭成百万“富农”。然而，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教条主义者，他们不同意上述的意见，他们认为斯大林是醉心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受到托洛茨基责备他为机会主义的压力的，而且国家正受到法西斯入侵的威胁，一旦入侵，他们就可以在“阶级敌人”中找到支持他们的人。然而，对那些被诬陷的党内“反对派”队伍中进行的控制和血腥的清洗，他们能提出什么可以证明这些作法是正确行为的理由呢？这些人对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并没有构成任何的威胁。相反，他们所以变得完全无能为力保卫自己，而且陷入了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恰恰是因为他们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忠于这个制度和意识形态。

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并不只限于大清洗，大清洗不过是恐怖政策的典型表现罢了。苏共党内的一切反对派在不同程度上都赞成惩处“富农”和其它“阶级敌人”。他们全体都是自愿地把自己的脖子伸进了意识形态的枷锁之中，因为他们的理想目标和斯大林是一致的，共同的。在责备斯大林没有研究某一专门问题的同时，布哈林自己研究科学问题——研究经济学和哲学，用他自己的幻想来建立经济基础。从本质上说，他们谁也没有用新的目光发现新的东西、新的理想。斯大林的大清洗，对他们每一个人，毫无例外，都是突如其来的。大清洗使斯大林个人突出起来，逐渐地变成了这以后所形成的那个样子，并且开始铺设他的事业的基础。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用残酷的、肆无忌惮的大清洗的方法，在思想和他的权力、国家和他个人之间划上了等号。当真理成为绝对的，不可争议的和相信会是完全无阶级的社会里，事情的结局也只能如此。目的本身把手段神圣化了。斯大林的事业把

一切道义的、精神的，也就是那些在生活中长远起作用的因素铲除了。这就是斯大林这个人物之谜，也就是衡量他的事业的真正的尺度。

1969年7月于贝尔格莱德

作者小传

米洛凡·杰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于黑山省科拉申城附近波里亚镇。他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法律和文学。1932年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年被捕,坐牢三年,1935年被释放。1937年南共党内斗争中,他是属于铁托一派的,赞助铁托改组了南共党。1937年杰拉斯被选为中央委员,1940年被选入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1941年在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入侵南斯拉夫之后,南共党派杰拉斯和皮雅杰组织起义。1943年末杰拉斯参加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主席团(这个组织的第二次会议在雅伊则召开,会上宣布该组织为南斯拉夫最高立法机关,拥有国会的一切权利)。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会议任命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被宣布为南斯拉夫临时政府,杰拉斯在政府中任部长职务。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改名为临时人民议会,杰拉斯参加了议会工作,并兼任黑山省事务部部长。1948年杰拉斯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局书记。1953年初杰拉斯任南斯拉夫副总统,他是当时四位副总统之一;1953年末他任联邦人民议会主席。以杰拉斯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曾多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他曾提出和准备了南斯拉夫经济改革方案,后来当他被捕入狱期间,政府对他的方案进行了简化和改变了一些地方,但却实行了他的方案。

杰拉斯认为党成为统治阶级并产生了道德、思想蜕化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之后,他同党和政府发生了冲突。从1953年10月至1954年1月,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他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谴责国家的管理走向了斯大林的管治方法,他坚持要成立第二个政党,他反对党干涉司法机关的工作。(根据杰拉斯的意见,“司法机关应该是国家和法治机关,也就是人民的机关,而不应该把党的队伍中的政治利益和意见强加予它……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以意识形态为论据,而是以法治原则办事呢?到什么时候判决将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的基础,而不是只依据法律条文呢?”)(1953年12月31日《斗争报》)1954年1

月17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中央特别全会上(南斯拉夫共产党已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通过决定撤销杰拉斯党内外及政府的一切职务,理由是他具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是要取消南斯拉夫的党。”(苏联大百科全书1957年第二版第49卷第334页)黑山共和国撤销了杰拉斯党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1954年3月他被开除出党。1955年1月他被判处十八个月的监禁,监外执行,案由是“发表了诽谤性的声明,在他的声明中恶意地歪曲了南斯拉夫的情况”。1956年10月29日杰拉斯公开赞同匈牙利事变,批评了铁托的制度和共产主义本身。为此他被判处了三年徒刑,狱内监禁。在狱中期间,他得以把他写的《新阶级》的手稿送出监狱交给了出版人,该书于1957年10月出版后,他又第二次被判刑,刑期增至七年。1961年1月他被提前释放,然而过了三个月,他又因发表了《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而被关进监狱,因为他被指控在该书中“泄露了国家的秘密”。在狱中杰拉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如《麻疯病患者》等等),还写了一本描写黑山的君主彼得二世涅戈什的书;涅戈什是政权和教会的统治者,也是塞尔维亚优秀的文学代表人物。此外他还翻译了英国作者米尔顿的《失乐园》。狱中杰拉斯还写了自传体的名为《没有权力的国家》一书。

1966年12月他被释放出狱(他服刑的这个监狱是奥匈帝国时代出名的斯列姆斯克·米特罗维查监狱),但没有恢复他的公民权。在南斯拉夫国内他没有公开演讲的权利,他的著作不能出版,没有发还他战斗岁月曾授予他的那些勋章、奖章等等。过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政府允许他出国讲学和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1969年他的《不完美的社会》一书出版了,这本书也和其它的著作一样,在南斯拉夫列为禁书。1970年4月杰拉斯正要出国讲学,准备了一系列的报告,然而这次出国签证被取消了。据有关方面透露,取消他出国之行无不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因为他出去讲学这个月正值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活动月。

在苏联,杰拉斯的名字在具有民主情绪的公民中间是颇有声望的。在这个圈子里,他们熟悉的译成俄语的唯一的一本书,是《新阶级》,而且这本书还是节译的。

译 后 记

本书所涉及的是苏南关系史中的一段重要的记载，它有着文献性的性质，对研究苏南关系、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以及苏联和它以前的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有参考价值。书中描述的生动事实，作家当时的感受，非亲临其境和参与这一事件的人，是很难写出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颇有些象阿里卢耶娃（斯大林的女儿）写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本书只谈了苏南关系，作者未涉及南共的党内问题。作者在本书中所持的某些观点，是不能同意的，这些问题我们相信读者会作出判断，我们认为本书的价值在于作者提供的史料。

本书译自1970年西德《播种》出版社出版的俄译本。这个译本和英译本比较，内容上有些出入的地方（1963年中文译本是根
据英译本转译的），我们想这可能因为塞语和俄语更接近些，也因为俄译本出版时，曾经过作者亲自校阅过（作者是精通俄语的），他自己对原文有所增减之故。所以我们想俄译本更接近原著。此外，俄译本中，作者增加了一章《大概，我是最后一次谈斯大林》，后面还加了一个《作者小传》，小传未说明是谁写的，估计是出自俄文版译者之笔，当然，它代表了撰写者的观点。其中一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重译此书是考虑到1963年出的中文译本仅出了几百本，经过十年动乱，已所余无几，许多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人都没有见过此书。为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故译了这个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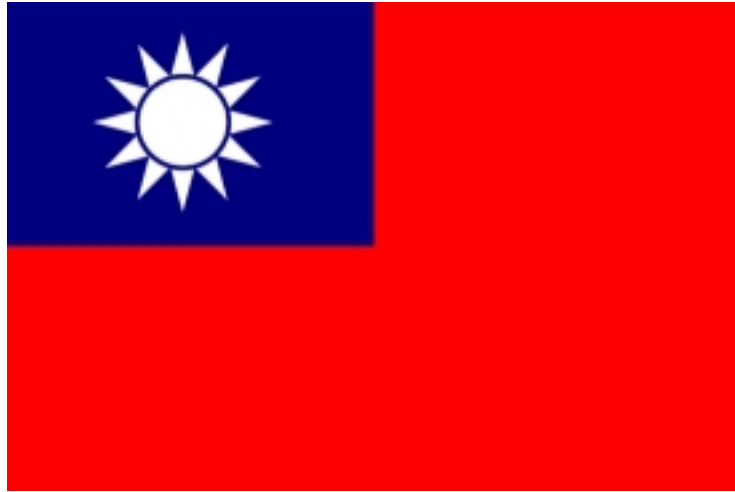
本书这次翻译时有所删节。

本书在译制过程中参考了司徒协同志的译本，特向司徒协同志表示感谢。译者为本书作注释时，参考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和英译本的《人名选注》。

我期待着我的朋友和读者指正译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

赵 洵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于北戴河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